

- 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工作报告
- 刘萨诃入冥图像与文本
- 刘萨诃文化研究是吕梁文化繁荣的重要工程
- 圣僧与圣像



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 主办
吕梁祥和传统文化教育中心

LIVLIANG CHUANTONG WENHUA YANJIU

吕梁传统文化研究

1

2018年第1期
总第001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刘萨诃学术研讨座谈会暨《圣僧慧达行迹研究》首发式 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第一次会员大会



吕梁市政府原市长助理、刘萨诃分会顾问薛平讲话



吕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照兴讲话



吕梁学院历史文化系原主任、市古代文化研究会会长赵元主持会议



吕梁市宗教局局长王香宝到会祝贺



吕梁市文化局局长王成军讲话



吕梁市重点办主任、学者王书平发言



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揭牌仪式



刘萨诃学术研讨座谈会暨《圣僧慧达行迹研究》首发式会场

吕梁传统文化研究

2018年

第1期

(总第1期)

编委会

主任：薛平

副主任：白礼昌 赵元

编委：王乐东 白礼昌 宋毅 赵元
高迎新 薛平 薛虎林

主管：中共吕梁市委宣传部
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

主办：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
吕梁祥和传统文化教育中心

编辑出版：《吕梁传统文化研究》编辑部

主编：宋毅

副主编：高迎新

编辑部主任：高迎新(兼)

印刷：吕梁市离石区开源印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年2月10日

发行：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
各县、市、区党委、人大、政府、
政协、宣传、文化、文物、旅游、
宗教、市直各单位、各会员单位、
各学术顾问。

编辑部地址：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滨河南路鑫田写字楼810

电话：0358-3361049 13935868057

邮箱：1456797500@qq.com

邮政编码：033000

学术研究

- 刘萨诃文化研究是吕梁文化繁荣的重要工程 宋毅 (6)
- 刘萨诃入冥图像与文本
——以日本极乐寺《六道绘》为中心 张善庆 吕德廷 (10)
- 《对莫高窟五代61窟，维摩诘经变，北壁药师经变初探》
..... 李康敏 高志鹏 (17)
- 略说慧达大师(刘萨诃)的历史功绩 王裕喜 (20)
- 圣僧与圣像
——又论刘萨诃 尚丽新 (21)
- 我和圣僧刘萨诃一段奇特的千古因缘 高耀峰 (28)
- 《圣僧慧达行迹研究》一书简介 白礼昌 (37)

学术动态

- 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第一次会员大会
工作报告 薛平 (2)
- 刘萨诃学术研讨会暨吕梁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
第一次会员大会圆满召开 高迎新 薛超时 (1)
- 刘萨诃学术交流座谈会发言选登
- 刘照兴 (49)
- 王成军 (49)
- 王香宝 (50)
- 解艾兰 (51)
- 徐华龙 (63)
- 释德圆 (52)
- 丁得天 (59)
- 尚丽新 (60)
- 王书平 (61)
- 吴浩军 (62)

资料汇编

- 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组织机构 (65)
- 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章程 (66)

刊名题字 赵玉生

封面图片 刘萨诃(慧达法师)塑像

刘萨诃学术研讨会暨吕梁古代文化研究会 刘萨诃分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圆满召开

□ 高迎新 薛超时

2017年10月28—29日，由山西省吕梁市委宣传部、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主办的刘萨诃学术研讨座谈会在临县义居寺召开，该会邀请到北京、上海、兰州、敦煌、永昌、武威等省、市以及当地的专家、学者和爱好者，共计10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吕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照兴、市文化局局长王成军、市宗教局局长王香宝、市文物局局长高候平、碛口风景区管理局常务副局长、临县政府副县长张犬照、民政局社团科长刘五平等同志高度重视此次会议，在百忙之中莅临并讲话。会议期间，该会聘请了49位专家、学者为分会学术顾问，由原吕梁市政府市长助理薛平先生颁发了聘书。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一是刘萨诃学术研讨座谈会，各地专家学者就刘萨诃研究领域的观点、论文、新的发现等内容进行了广泛交流和热烈讨论。进一步理清思路，深入挖掘、整理史料文献，保护和完善历史遗存；二是召开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代表大会，选举组织机构；三是举行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白礼昌主编的《圣僧慧达形迹研究》一书首发式，该书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全面记载了刘萨诃的生平、经历和杰出贡献。

刘萨诃，法名慧达，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高僧，出生于公元360年，并州西河郡离石人（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远赴印度取经人之一，约在公元399年至公元409年完成了此项交流活动，比唐代玄奘西域取经还早了230余年。得法回国后，他创建寺院，开凿石窟，绘制壁画，

讲经释法，是佛教中国化的奠基人物，被尊为中国历史上功德卓著的大德高僧之一。

临县义居寺是慧达西域取经后最早传经讲佛、开凿石窟的寺院，为了缅怀这位传奇式的早期佛教界领军人物，在当地政府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先后投资6000万元维修扩建了义居寺、新建了“慧达舍利塔”，塔身中供养释迦牟尼真身舍利、慧达舍利、五谷金刚砖。恭请全球限量100套的黄花梨木刻制《清敕修乾隆版大藏经》一套，作为镇寺之宝。

近年来，吕梁一批有识志士多次往返山西、甘肃、陕西、新疆及江南各市县进行实地考察，寻访刘萨诃足迹，收集历史资料，历时三年多，做了大量的扎实有效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特别是《圣僧慧达形迹研究》的出版发行，将进一步推动刘萨诃研究的深入开展。

研讨座谈会上，吕梁市政府原市长助理薛平先生介绍了历年来吕梁市开展刘萨诃研究的过程和义居寺、刘萨诃舍利塔的建设成果。《圣僧慧达行迹研究》主编白礼昌先生介绍了图书的采访、收集、编纂、出版等情况。来自北京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品牌推进委员会主任解艾兰女士、光明日报社常大林先生、上海文化出版社编审徐华龙教授、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丁得天先生、敦煌学院孟子为教授、山西大学文学院尚丽新教授、甘肃永昌圣容寺主持德圆法师、甘肃省公安厅高耀峰先生、山西电视台原编导王裕喜先生、武威日报李林山先生、吕梁学院历史文化系主任赵元教授、副主任张小萍女士、李婷婷女士、吕梁文化学者王书平（下转9页）

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 第一次会员大会工作报告

□ 薛 平

2017年10月29日

各位代表，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代表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筹备组，向大会做工作报告，请予审议。

一、四年来刘萨诃文化研究工作的回顾

刘萨诃，法名慧达，魏晋时期人，出生于西河郡（吕梁）离石，是中国历史上著名高僧，在实现佛教中国化及石窟开凿、壁画创作等古代文明创建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吕梁市作为刘萨诃的家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有责任和义务把刘萨诃文化作为古代文化研究的一个重点，予以深入研究挖掘和系统整理，完整还原刘萨诃的伟大功绩和历史性贡献，以此作为吕梁为重现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份努力，打造吕梁历史文化名人中一张十分珍贵的名片。

2013年10月起，我们吕梁市几位有志于刘萨诃文化研究的同志开始了刘萨诃文化研究活动及筹划建立刘萨诃文化研究群众团体的工作，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组织了刘萨诃行迹考察活动

从2013年11月起，我们开展了对刘萨诃行迹的考察活动。

2013年11月10日至23日，白礼昌等五位同志带一台汽车，行程4700多公里，对陕西和甘肃省内据历史记载留有刘萨诃足迹的14个景点进行实地考察，包括武威、敦煌、酒泉、张掖、永昌、天水、兰州、延安、子长、绥德、米脂等。

2013年12月11日至20日，白礼昌等

四位同志带一台汽车，行程5000多公里，对史书中刘萨诃曾在江南弘扬佛法记载较多的南京、丹阳、常州、苏州、宁波等地的多个景点进行实地考察。

2014年4月23日至25日，白礼昌等四位同志带一台汽车，对刘萨诃当年曾经活动过的陕西省子长、宜川、山西省吉县等地进行了考察。

2014年6月5日至8日，薛平、白礼昌等六名同志带一台汽车，对刘萨诃当年曾经活动过的甘肃省永昌、武威等地进行了考察。

2014年8月10日至22日，白礼昌、渠珍宝二位同志乘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对新疆刘萨诃西方取经曾经活动过的乌鲁木齐、和田、策勒、拜城、鄯善、吐鲁番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

通过这些考察活动，我们了解掌握了刘萨诃当年活动的大量史料，为编辑有关专著和创作电影剧本打下了基础。

2、组建了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

2013年10月，我们开始了组建刘萨诃文化研究社会团体的筹备工作。经过半年多的积极努力，2014年7月，吕梁市民政局以吕民社字第013-1号文颁发了《社会团体分支机构登记证书》，正式批准组建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同时吕梁市质监局向研究会颁发了社会团体代码证，至此，吕梁市刘萨诃学术研究工作者和刘萨诃业余研究爱好者的群众性文化类学术团体开始组建并开展了工作。

3、建立了刘萨诃网站

2014年7月，我们经申请，《山西 吕梁刘萨诃研究会》的中文网站正式上线。网站设有《研究会简介》、《最新公告》、《慧达踪迹》、《学术探讨》、《遗址寻访》、《研究会资讯》、《研究会图库》、《动态信息》等栏目，为扩大刘萨诃文化的宣传，开展学术交流，增进与各地刘萨诃研究专家学者及业余爱好者的联络与友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次应邀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中，就有几位是通过我们的网站建立起联系的。

4、组织编写电影文学剧本摄制专题片

拍摄一部反映刘萨诃的电影，将他不凡的历程和主要伟绩用直观生动的视频形象表现出来，进而影响观众，是扩大刘萨诃这位历史名人的社会知名度，以他的精神教育启发观众的有效途径。为此，我们在2013年就开始组织剧本创作。一是邀请电影剧本的编剧参加刘萨诃行迹考察组，先后去西北和江南进行了考察，二是讨论确定了故事大纲，三是筹措了稿酬等费用支持创作。

剧本初稿创作完成后，经多次研讨修改，报请电影摄制管理部门审批，未获通过。之后，我们又委托我市青年电影编剧刘潇珂重新创作。刘潇珂为创作好这部电影剧本，先后两次赴新疆、甘肃等地考察，查阅了大量史料，通过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建议，三易其稿，最终定名为《丝路佛光》。剧本最终于2016年11月14日获得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的审查，取得了摄制电影许可证。目前正在筹集资金，拟于2018年开始摄制。

2016年秋冬至2017年春，我们还摄制了一部反映千年古刹义居寺的电影记录片，以扩大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打造新的旅游目的地，促进我市旅游业的发展。

5、策划并协助筹资修建慧达纪念堂及塔院

筹建慧达舍利塔，对于缅怀这位传奇式的早期佛教界领袖人物，纪念他对中国佛教法理传播、石窟壁画艺术、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历史性贡献，促进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市、县政府和各地佛教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慧达舍利塔的筹建工作于2013年底展开。临县成立了由原县人大副主任林建强和碛口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副主任张犬照牵头的筹建处，经过数月努力，完成了资金筹集、规划设计、建筑队伍招标、原材料采购等一系列准备工作。

2014年4月5日，慧达舍利塔奠基仪式隆重举行。慧达舍利塔为实心八角砖塔，13层，高29.8米，直径6米。周围为舍利塔附属建筑群，包括慧达纪念堂东西配殿等，总建筑面积1900平方米，塔院总面积达到5000多平方米。

在舍利塔正面，安放了高2米的慧达鎏金铜像一尊，在塔基地宫中，安放了释迦牟尼真身舍利、慧达真身舍利、来自释迦牟尼荼毗处的五谷金刚砖等镇塔宝物。

经过半年的建设，舍利塔顺利竣工。2014年10月12日，塔院举行了盛大的开工仪式。

在塔院附属建筑法堂中，恭请了限量印刷仅百套的乾隆年间刻制梨花木原版120卷大藏经一部，成为镇院之宝。

在舍利塔下院，修建了可以安排近百人的住宿和就餐的场所，为开展弘法和培训创造了条件。

塔院的建设及恭请乾隆大藏经投资总额达到1200多万元，除少量政府资助外，多数是企业家募捐的。

舍利塔及塔院已成为我们吕梁纪念慧达大师的标志性建筑，对于我们继承和弘扬他的精神，教育子孙后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了吕梁发展旅游观光的新地标。

6、组织编写出版了画册和学术专著

2014年至2015年，我们在刘萨诃舍利塔及塔院建筑期间，就开始了《慧达法师 & 千年古刹》画册的编辑制作工作。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画册于2015年10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本画册150多页，选用了我们精心拍摄的150多幅照片，再现了慧达舍利塔及塔院的雄姿和千年古刹义居

寺的风采。画册采用优质铜版纸印刷，前言和说明均配有中英文对照，精美而不失古朴韵味。该画册出版后，我们分送各有关部门及吕梁市几个重要的宾馆酒店客房，为扩大刘萨诃文化的宣传发挥了积极作用。

《圣僧慧达行迹研究》专著的编撰是从2013年开始的。该书的主编白礼昌老师从事刘萨诃文化研究多年，特别是通过亲自参加几次西北和江南的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详实的史料和采访纪实，为这部专著的撰写提供了翔实的素材。经过2年的努力，该书的初稿问世，后经多次修改完善，最终定稿。从2015年开始，《圣僧慧达行迹研究》专著进入选择出版社、主管部门审稿和排版印刷阶段。2017年9月，该书完成了印刷，正式出版发行。

《圣僧慧达行迹研究》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专著全书约40万字，近400页，其中图片近200幅，图文并茂，印刷精美，成为我们纪念刘萨诃诞辰1767年的一份厚礼。

综上所述，经过几年来的努力，我们的吕梁市刘萨诃文化研究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几项重点工作都取得明显进展，为进一步开展刘萨诃文化研究、学术交流和宣传造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几点做法和体会

1、以慧达精神统领刘萨诃文化研究活动

刘萨诃为传播佛教文化和改善民众生活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受到了民众广泛的拥护和赞誉，他的精神和故事、传说在历史得到了长久的传播。慧达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坚守信念，不畏艰难，心系民众，造福万代”。

在刘萨诃诞生一千七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开展刘萨诃文化研究，必须要以慧达的这种精神来统领。

我们的信念是，在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旗帜下，收集整理、深入研究涉及刘萨诃的有关珍贵史料，力争将他的生平、功绩和贡献比较完整系统地挖掘和还原出来，公之于众，使刘萨诃成为一个社会各界认可的

丝绸之路的先行者、中国佛教文化的奠基者、石窟雕塑艺术的开拓者、关心民众生活的施善者，使慧达的精神成为吕梁精神的一个来源，成为吕梁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推动力量。

2、着力打造慧达故里这个吕梁历史文化新名片

通过全力挖掘、整理、收集、抢救、研究解读刘萨诃文化，塑立起一个史料详实、业绩伟大、遗产丰富、民众爱戴的历史文化名人，不仅便于让世人重新认识中国辉煌的历史文化，而且有助于打造一张吕梁新的名片，从而有效地提高吕梁的知名度，促进当地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如果说《吕梁英雄传》是让世人认知吕梁的第一张现代名片，那么，《慧达故里，英雄吕梁》就应该成为反映吕梁悠久灿烂历史文化的新名片。

3、使刘萨诃文化研究成为吕梁文化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刘萨诃的精神，他不平凡的业绩和他在石窟开凿中的艺术创造是我们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当前，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开展对刘萨诃文化研究，无疑是这个进程中文化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应该从促进吕梁文化繁荣的高度，来理解和认识刘萨诃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实际行动促进这一过程。

4、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我们几年来的工作业绩，都是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帮助下取得的。有不少企业在经济形势不好、利润下行严重的状况下，挤出资金来赞助我们，使我们很受感动。如义居寺新建的舍利塔、塔院，迎请的乾隆大藏经、编印相关书籍、画册的经费等，都是关注支持刘萨诃研究事业的企业家赞助解决的。

三、今后开展刘萨诃文化研究活动的初步设想

我们这次会议，既是对2013年以来吕梁

市刘萨诃文化研究的回顾总结，也是对今后几年开展刘萨诃文化研究工作的愿景展望和初步的安排部署。随着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的正式成立，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作为刘萨诃分会第一届会员，我们肩负着挖掘刘萨诃文化、开展学术交流、打造刘萨诃文化品牌的历史重任。我们要站在为中华文化复兴和吕梁文化繁荣而作出贡献的高度，坚定信心，勇于担当，拼搏奉献，力争取得比过去5年更大的成绩。今后5年刘萨诃文化研究的主要目标和设想是：

1、搞好专题研究

在继续广泛开展对刘萨诃的生平、经历、主要事迹、佛学思想、历史贡献等各方面史料挖掘整理的基础上，要重点挖掘其主持开凿莫高窟早期洞窟、为百姓兴修水利驱除灾害、在雕塑及壁画等佛教艺术领域的历史性贡献，同时也要特别注意挖掘刘萨诃在家乡弘法传教和兴建寺院开凿石窟的史料记载，对载有其行迹的文物图籍、金石碑刻开展阐释考证，对有关轶事传闻进行进一步的收集整理。

2、开展学术交流

这次研讨会我们邀请了20多位国内研究刘萨诃文化的专家学者出席，这将对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刘萨诃文化研究成果的一次检阅和深层次交流。会后，我们将认真梳理这次研讨会学术讨论发言，并将各位专家学者提供的论文资料以内部资料的形式汇订成册，方便大家交流参考。同时，我们还准备将这些论文发到我们的网站上，以广泛传播。

为了提高我们研究会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我们拟将应邀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聘为我们研究会的特邀顾问，以便于随时指导我们的工作。随着我们研究会同各位专家学者的联络进一步加强和学术交流机制的建立，我相信研究会学术交流和文化研究的水平和层次一定会得到明显提高。

3、提高网站质量

网站是我们研究会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阵地，也是各位会员和特邀顾问互相联络交流的窗口，同时还是宣传刘萨诃文化

不可或缺的平台。今后我们要充实网站技术和管理人员，确实抓好网站的建设和维护，不断扩充内容，提高质量，发挥好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4、办好研究会刊

研究会准备办一份不定期的会刊，主要内容是刊登国内外、省内外和市内外刘萨诃文化研究的动态、信息、学术成果、重要论文等，为各位会员和顾问提供参考，扩大刘萨诃文化的传播范围。

5、拍摄《丝路佛光》

在已完成讲述慧达传奇故事的《丝路佛光》电影文学剧本并获得拍摄许可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学者对剧本进行研讨，征求多方意见，使其更加尽善尽美，并要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募捐落实所需资金，选好导演及主要演员，力争在2018年开机拍摄，2019年获得公映许可证并在国内外公开放映。

6、加强自身建设

研究分会的正式成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我市刘萨诃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认真落实这次会议的精神，建立健全研究分会的领导体制和内设机构，制定完善工作制度，落实工作责任，筹措必要的工作经费，扎扎实实的把各项工作开展起来。

同志们，我们刘萨诃分会和各位会员，肩负着弘扬慧达精神，挖掘刘萨诃文化底蕴，打造地方文化品牌，促进吕梁历史文化复兴的重任。我们一定要振作精神，团结协作，以“坚守信念，不畏艰难，心系民众，造福万代”的慧达精神为楷模，投入到刘萨诃文化研究和交流传播的进程中去，这项工作无论是对社会，对吕梁，对后代，还是对我们自己，都是一份非常有意义，有价值，前景广阔的事业，我们一定要以踏踏实实的工作成绩来告慰刘萨诃这位吕梁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名人，为打造慧达这张吕梁历史文化名人新名片做出应用的贡献！



刘萨诃文化研究是吕梁文化繁荣的重要工程

□ 宋 毅

(原吕梁市扶贫办调研员)

刘萨诃，吕梁离石（古西河郡）人，法名慧达，魏晋时期著名高僧，历史记载最早到西域取经的僧人，古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和早期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使者。

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偏少，导致目前对刘萨诃文化的研究考证工作不够深入，远远不如同时代的法显和晚于他230年去西域取经的玄奘，以致他的社会知名度比较低。

根据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界的共识可以认定，刘萨诃是一位在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历史上业绩伟大，遗产丰富，民众爱戴，功德卓著的大德高僧。

一、刘萨诃的业绩和贡献

据史料记载，刘萨诃从一个“围绕凶顽，勇健多力、乐行猎射”的稽胡族武将，立地成佛，出家成为僧人。之后，他持钵杖锡，遍礼中原和江南，在宁波（古会稽）和南京（古建业）拜出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宝塔，创建阿育王寺，为建寺祖师，他还对苏州（古吴郡）通玄寺等寺庙的建造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了江南传播佛教的先驱。

公元309年，他孤身徒步去古印度、阿富汗等西方佛圣之地取经，时间长达十年之久。他历经磨难，周游列国，通读佛典，熟谙佛礼，带回大量宝贵的佛经，是历史最早去西域取经的僧人，实现了佛教文化东传汉地的宏伟目标。

归国后，他先是在故乡离石县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龙兴寺及岚县天宁寺等寺院，又在黄河东岸的义居寺等地凿建石窟石像，后赴河西走廊，甘肃，投身于敦煌莫高窟等地的

石窟开凿、佛祖塑像、佛教壁画绘制等，为敦煌石窟艺术的创建与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河西弘扬佛教期间，刘萨诃还担任了北凉国的国师，他十分关注民众疾苦，在劝阻战争，民族和解，兴修水利，治理水患等方面都有不凡的业绩。据史书记载，公元436年，肃州遭受洪水，刘萨诃正居武威，“忽一日云：酒泉人有水厄，吾当往救。寅时发，巳时至郡，正见讨来河侵城，以手挥之，水退。随圆寂，瘞骨于此。”刘萨诃为退水患，救助百姓，牺牲了自我。

史书记载，刘萨诃最奇幻之处就是他非凡的预测灵验功力，如预测了建业长干寺阿育王佛塔、金佛像的出现，吴郡河漂石佛像的迎奉，凉州番禾郡石佛像的现身等，被后人捧为神奇，膜拜崇信，流传千年。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的专家学者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进一步肯定了慧达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正如《敦煌全集·佛教东传故事画卷》第12卷146页《预言灭佛的刘萨诃》中所说：刘萨诃“不仅被神化为观世音菩萨假形化俗，更与佛陀释迦牟尼并比齐肩，被尊称为刘师佛、刘摩诃、佛教第二十二代宗师等，河西走廊对他信仰尤甚，可视为佛教彻底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刘萨诃生前就广受时人崇仰，他圆寂后声誉更加深远而广泛，在敦煌隋唐时期开凿的多座石窟中均有大量反映刘萨诃佛事活动的壁画和文字记载。

刘萨诃为传播佛教文化和造福民众，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受到了民众广泛的拥护和

赞誉，他的精神和故事、传说得到了长久的传播。

综上所述，刘萨诃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最早出现的佛教界著名领袖型人物，对佛教及其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在佛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重要的标志性人物，被誉为中国的观世音菩萨，也被称为观世音菩萨转世的利宾菩萨。他是古代最早从事中西方文化传播交流的使者，是中外往来和文化交融的开拓者之一。他在闻名世界的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壁画艺术等古代文明创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领域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成为我国一位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

二、提高对刘萨诃文化研究重要意义的认识

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开展刘萨诃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

1、刘萨诃文化研究符合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故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当前，我们国家已经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启了新纪元。文化复兴是社会全面复兴的基础和根基，而古代文明的挖掘就是实现文化复兴一个重要方面。

在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旗帜下，通过开展刘萨诃文化研究，深入挖掘史料文献记载，对他的生平、经历、主要业迹、历史文化贡献等各方面进行系统收集、整理、还原并广泛传播，有利于世人增加对刘萨诃及其功绩的了解，可以树立起一个丝绸之路的先行者、中国佛教文化的奠基者、石窟雕塑艺术的开拓者、关心民众生活的施善者的新

形象，使刘萨诃这个历史人物的伟大贡献为中华古代文明增添新的异彩，让他的精神鼓舞我们开拓新的征程，让他的事迹进一步丰富和充实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古代文明宝库，使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

2、刘萨诃文化研究是吕梁文化繁荣的一项重要工程

吕梁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大禹治水的重点工程遗迹就留在在吕梁境内。要全面向世人展现吕梁深厚的历史底蕴，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灿烂的古代文明，就必须把文化繁荣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大力气认真抓好。

塑造悠久吕梁，文明吕梁的新形象，要依靠艰苦细致的工作，用大量具体的人和事来作为支撑。重视文化建设，深入挖掘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途径。刘萨诃作为吕梁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名人，刘萨诃文化作为一座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宝库，为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把刘萨诃文化研究作为为吕梁实现文化繁荣道路上的一项重要工程来对待，下大力气扎扎实实不断推进。

吕梁作为刘萨诃的故乡，开展刘萨诃文化研究具有独特的优势，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也有决心有能力把刘萨诃文化研究的事情做好。刘萨诃文化研究的深入进行，也必将有力地推动吕梁文化繁荣的历史进程。

3、刘萨诃文化研究为诠释吕梁精神增添了新的内涵

吕梁是一块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土地，吕梁人民在悠久的历史岁月和艰苦的自然生存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传统和赖以生存的精神状态，这就是“艰苦奋斗、顾全大局、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吕梁精神。“吕梁精神”形成的内涵，从纵向看，涵盖了各个时期吕梁精神的不同特点；从横向看，既体现了文化特征，又体现了地域特征，是对吕梁精神的高度提炼和全面概括，是吕梁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刘萨诃作为从吕梁走出来的大德高僧，他的精神是在吕梁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特定的

历史条件和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孕育形成的，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凭着坚定不移的信念，百折不挠的意志，排除万难的决心，开放包容的胸襟，虚心好学的态度，敢于创新的勇气，实现了他的人生追求，创造了西行取经，弘扬佛法，开凿石窟，造福民众的伟大业绩，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成为民族的脊梁、民众的榜样。刘萨诃的一生，处处演绎了不畏艰险，勇于创新、艰苦奋斗、造福人类的奉献精神。他的精神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也反映了其深深扎根于养育他成长的黄河文化和吕梁特质，成为吕梁精神的一个来源，一种内涵。

4、深入开展刘萨诃文化研究打造吕梁新的文化品牌

通过全力挖掘、整理、收集、抢救、研究和解读刘萨诃文化，塑立起一个史料详实、业绩伟大、遗产丰富、民众爱戴、人人皆知的历史文化名人，不仅便于让世人重新认识中国辉煌的历史文化，而且有助于打造一张吕梁新的文化品牌，从而有效地提高吕梁的知名度，促进当地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

刘萨诃在去西域取经出发的两年后，于公元401年遇到了同是去西域取经的山西襄垣籍的高僧法显等人，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同行。之后慧达走陆路返回中原，法显从海路回到中国山东崂山。法显的故乡襄垣县，为了弘扬法显文化，打造法显文化品牌，早在1990年就开始多方筹资，对法显纪念场所进行抢救性修复扩建。2010年，襄垣县成立了法显研究会，并由企业投资十亿元，打造了法显出家的仙堂山4A级旅游景区。近年来，研究会先后在国内一线城市组织了三次法显文化研讨会，出版了一大片图书资料和影视作品。在他们的推动下，法显文化旅游产品已成为襄垣的第一品牌。山西省法显文化研究会已经成立，法显故里已成为山西东南部文化旅游的新地标。

襄垣的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我们要乘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东风，通过建设刘萨诃纪念场馆、创作刘萨诃文化影视作品、建立刘萨诃文化研究的网站及新

媒体等方式，打造展示和宣传刘萨诃文化的窗口和平台，让刘萨诃这个丝绸之路的先行者的业绩和贡献广为流传。

三、刘萨诃文化研究的重点方向

近年来，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刘萨诃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涌现了相当数量的学术研究和一些专著。为了更好地推动刘萨诃文化研究的深入，我们必须抓住重点，围绕刘萨诃在历史文化方面的突出贡献和爱国行善、为民造福的不凡业绩开展研究活动。

1、坚持刘萨诃文化研究的正确导向

习近平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一指示精神，在刘萨诃文化研究工作中，围绕其爱国、创新的精神，重点放在深入挖掘和阐发刘萨诃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追求和事迹方面，深入剖析刘萨诃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以其不断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2、注重敦煌莫高窟开凿方面的挖掘考证

莫高窟是发现刘萨诃文献资料和绘画记载最多的地方，特别是在藏经洞中发现的文献中，有关刘萨诃的绘画文字占据最大的比例，原因何在？应该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有研究资料称刘萨诃于公元415年到达敦煌，会同法良禅师开凿洞窟近百个，也有资料称，刘萨诃仅主持开凿了几个洞窟，且因为年代久远，洞窟佛像损毁严重，无法进行有价值的挖掘。

根据有关研究资料所述，从刘萨诃取经回国后，在河东河西多地主持开凿了多处佛教文化的洞窟和塑像的情况看，他在敦煌莫高窟开凿洞窟的事实应该是确切的，我们应

该深入挖掘这方面的史实。敦煌洞窟开凿、佛像雕塑、壁画绘制都具有很高的专业技艺和艺术水准，是融合了中外优秀文化特色和传统的时代杰作，刘萨诃作为最早开凿洞窟，雕塑佛像，绘制壁画的组织领导者，在制定规划、匠工动员、艺术创作等方面有什么样的历史性贡献？这是我们进行刘萨诃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应该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还其本来面目。

3、关注劝阻战争救生制恶方面的挖掘考证

有学术研究资料阐述，刘萨诃在河西走廊讲经宣道、弘扬佛法、开凿石窟、募资建寺的12年间，由于佛道造诣高深，常常显圣作法，救生制恶，在当地民众间树立了崇高的威望，为此被北凉国王沮渠蒙逊聘为国师。在此期间，曾以他高僧的独特身份和威望，数次劝阻交战双方，平息了为争夺土地而展开的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实现了民族和解，彰显了他爱和平、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的志向和非凡的说服才能。

在刘萨诃文化研究中，应当重视查阅史书中的有关刘萨诃在担任北凉国师期间为治国理政而出谋划策，劝阻战争和救生制恶的历史记载，以此旁证佛教在推崇和平、抑恶从善、促进社会安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4、挖掘在兴修水利治理水患方面的历史贡献

据记载，刘萨诃在酒泉弘扬佛法、凿洞建寺期间，十分关注民生，他弘法利生的功德在当地妇孺皆知。酒泉严重缺水，威胁到百姓的生存。刘萨诃带领僧俗开挖七里石涧，将祁连山冰雪融水引到酒泉，解决了人畜吃水和饮水灌溉农田的困难。在酒泉河暴发洪水，城池被淹的紧急关头，刘萨诃在七里涧高台上打坐诵经，挥手喝退了洪水，酒泉保住了，刘萨诃却圆寂在此。我们应该深入挖掘整理刘萨诃在关注民生，兴修水利，治理水患方面的史料和传说，以此全面地考证刘萨诃亲民爱民的鲜明立场和救助百姓发展农经的历史功绩。

5、搞好刘萨诃在吕梁遗迹的抢救性挖掘整理

刘萨诃出家前以及从西域取经返回后在家乡弘扬佛教、凿洞建寺期间，在吕梁留下了不少遗迹。在他身后，为纪念其丰功伟绩，吕梁各县也建造了不少的纪念场所。我们要通过查阅资料、查访寺庙碑文遗迹等方式，深入搜集考证，力争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史料，为深化刘萨诃文化研究，建造纪念场所，广泛宣传他的伟绩和贡献，提供更多翔实的文物资料，打造好《慧达故里，英雄吕梁》这一展示吕梁悠久灿烂历史文化的新名片。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作者系原吕梁市扶贫办调研员)

(上接1页)等参会者一致肯定了吕梁市近年来刘萨诃研究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就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做了学术交流。一些因事不能到会的专家、学者也发来论文和发言稿，介绍了自己的观点。

今年是吕梁历史文化名人刘萨诃诞辰1767年，此次座谈会的及时举办，引发了社会各届人士全面了解刘萨诃及其历史功绩，

树立起一个丝绸之路的先行者、中国佛教文化的奠基者、石窟雕塑艺术的开拓者、关心民众生活的施善者的新形象，对于我们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整理、保护文化遗产，增强民族自信，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刘萨诃入冥图像与文本

——以日本极乐寺《六道绘》为中心

□ 张善庆 吕德廷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 刘萨诃与凉州瑞像研究,长期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是由于国内考古资料的缺乏,学界并没有对刘萨诃入冥图像展开集中的研究。此文以日本兵库县极乐寺《六道绘》为中心,探寻刘萨诃入冥图像的图像源头,订正并梳理其文献演变历程。

关键词: 刘萨诃 入冥 极乐寺 地狱绘

大规模的刘萨诃研究至今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主要是刘萨诃生平传记,包括出生籍贯、入冥故事、江南巡礼、授记瑞像等等,所依据的文献既有传世经典,又有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①关于刘萨诃入冥故事,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故事中的“地狱观、观音信仰”。^②也就是说,就这个问题,以往论述主要立足于文献资料,很少涉及图像资料。究其原因,刘萨诃相关图像主要出现在凉州瑞像因缘变相,莫高窟第72窟西壁龕北存有一铺刘萨诃禅定坐像,除此之外,在笔者涉猎的范围内,国内并无刘萨诃入冥题材的图像。然而日本兵库县西肋市极乐寺却收藏有一组三幅《六道绘》,刘萨诃入冥图像赫然绢上。

对此,日本学者菅村亨^③、井上泰^④等先

生刊布了挂图图版,对文字内容进行了释读,这是本文展开的基础。在此,笔者将对这三幅《六道绘》略作介绍,探寻这种题材的图像源头,订正并梳理其文献演变历程,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极乐寺《六道绘》之刘萨诃入冥图像

据菅村亨先生介绍,这三幅《六道绘》在1984年兵库县历史博物馆对兵库县中部西肋市多可郡城文化遗迹调查中被发现;1985年在特别展“西肋 多可的历史和文化”,被公布为重要文化财产。整图由三幅绢本着色挂图组成,每一幅上下长140-141.2厘米,左右宽120.8-124.5厘米,虽有烧损,但基本保持原貌;据风格判断,大概是镰仓中期后期的作品。^⑤

作者简介: 张善庆(1980—),男,山东临沂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佛教图像研究。吕德廷(1986—),男,山东茌平人,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主要从事佛教美术史、历史文献学研究。

①卢秀文《刘萨诃研究综述》,《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第113—115,119页;尚丽新《刘萨诃研究综述》,《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1期,第135—143页。

②尚丽新《刘萨诃研究综述》,《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1期,第139—140页。

③菅村亨「極樂寺本『六道絵』について」,『佛教藝術』第175号,1987年11月,第50-71页。

④井上泰「兵庫縣極樂寺藏『六道絵』の<絵語>」。

⑤菅村亨「極樂寺本『六道絵』について」,『佛教藝術』第175号,1987年11月,第50-71页。

三幅挂图构图大致相同，上栏绘制冥界十王，分别是秦广王、初江王、宋帝王、五官王、阎罗王、变成王、太山王、平正王、都市王和五道转轮王；每位冥王端坐在几案之后，身体左侧配有赞文；左右各有助侍判官一众。下栏绘制六道图像，包括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阿修罗道、人道以及天道，除此之外，还有夹杂着故事画，目连救母故事占据画幅最大。

刘萨诃入冥图像出现在中幅右起第一铺。阎罗王正襟危坐在文案之后，正在审判。一人赤身裸体，跪在案前，旁书“刘萨诃”三字。此人正是中国南朝王琰《冥祥记》和慧皎《高僧传》所记载的刘萨诃。其头发被鬼卒强行后掣，极不情愿地面对业镜；刘萨诃的面前躺着一头小鹿。周围和中下栏画面也都配有榜题，分别有“阿输阁国婆罗门”、“清河□邪见女”、“隋鹰郎将天水姜略”和“高陆秦安义”等。

在这方绢画里，阎罗王、业镜和以刘萨诃为代表的入冥故事画，是重要的图像元素。

阎罗王是冥府十王之一，在中国中古时期取代了原有的土伯、泰山府君等，成为地府的主宰，后来经历了独领冥界到十王分治的过程。^①亡人五七之时要在阎罗王殿接受审

判，生前所做种种善恶，全部都会在业镜中显现。据学者研究，十王信仰经典基础是《佛说十王经》^②和《佛说地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后者是日本僧人根据《观修十王生七经》所撰写，时代为平安末期或者镰仓初期。^③这部经典描绘阎罗王殿和业镜时说：“光明王院，于中殿里，有大镜台，悬光明镜，名净颇梨镜，昔依无遮因，感一大王镜。阎魔法王，向此王镜，鉴自心事，三世诸法，情非情事，皆悉照然。复围八方，每方悬业镜，一切众生，共业增上镜。时阎魔王同生神簿，与人头见，亡人策发，右绕令见，即于镜中，现前生所做善福恶业。一切诸业，各现形象，犹如对人见面。”^④据此，业镜就成为阎罗王殿的标志性图像。

刘萨诃，又名刘萨荷、刘萨何、刘苏荷、刘萨河、刘萨和，事迹见于南朝王琰《冥祥记》、慧皎《高僧传》、唐道宣《续高僧传》《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等、道世《法苑珠林》。他原本是两晋时期今山西地区的稽胡猎人，喜好打猎，终受因果报应，突然猝死，神游冥府，接受审判和惩戒，得以遍览地狱种种恐怖，后来得到观世音菩萨点化，死而复生，游历江南，巡礼忏悔。据《续高僧传》记载，他晚年来到今甘肃永



日本兵库县极乐寺所藏《六道绘》之刘萨诃入冥图像

①阎罗王研究是学界重点研究的课题，成果颇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②杜斗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张总《〈阎罗王授记经〉缀补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③《佛光大辞典》第3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2321—2322页。

④《佛说地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卍续藏经》，150册，第769—776页。

昌，授记凉州瑞像，最后在酒泉圆寂。^①极乐寺本《六道绘》便是刘萨诃神游冥府身受惩戒的再现。

如果梳理刘萨诃与阎罗王相关图像，该图的独特意义赫然可见。

从6世纪开始，中国阎罗王审判的图像就日益丰富，案前接受审判的亡人和畜生都是常见的题材。陕西富平县北魏太昌元年(532)梵奴子造像碑是早期阎罗王审判图像的代表。^②阎罗王坐在殿堂中，面前绘制宰羊的场景，旁书“此是屠仁今/常羊命”，图像左侧描绘五道大神，坐在胡床上，身旁绘五道图像。五道大神发展到后来，演变为五道转轮王。此时，五道转轮王已经开始和阎罗王结合在一起了，这是晚唐五代时期十王系统的雏形。彼时的敦煌乃至大足，亡人的面前多了一方业镜。纵览来看，接受审判的亡人一般都是“群像”，很少具有题名者。极乐寺本却具有明确的榜题，富有特色。

此外，从敦煌石窟、藏经洞出土文物看，刘萨诃通常出现在凉州瑞像因缘变相中，以莫高窟第72窟南壁为代表。此外，该窟西壁龕外北侧绘制了一铺刘萨诃坐像，和龕外南侧的僧伽大师画像相对，从而构成了一个巧

妙的组合。也可以说，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刘萨诃画像，主要得益于凉州瑞像艺术的创造，这些图像描绘的重点并非刘萨诃，而是凉州瑞像。在中国，除了“授记”凉州瑞像，刘萨诃其他生平传记几乎没有入画。极乐寺本刘萨诃入冥故事画恰恰弥补了这一空白。

二、刘萨诃入冥图像之源流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频繁，政府官员、留学人员、朝圣僧人、传法大师，往来期间，络绎不绝，为两国佛教文化特别是佛教艺术的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冥界十王思想此时也传入日本。12世纪开始宋日之间的经济贸易达到巅峰。随着商船的到来，中国大量民间绘画品抵达日本。如果追根溯源，极乐寺《六道绘》刘萨诃入冥图像首先和这批画像存在直接的联系，更早可以和敦煌《十王图》尚有渊源。

(一) 宁波十王挂图之阎罗王图像

宁波等地在当时是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自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艺术输出地。根据学者统计，“东传日本的宁波佛画《十王图》至少有二十二套、一百八十多幅保存于日本各个寺院和博物馆、美术馆中。其中一些作

①关于刘萨诃的生平传记，孙修身先生研究成果显著，比如《刘萨诃和尚事迹考》，《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篇》(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孙修身、党寿山：《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考释，《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圣者刘萨诃的故事》，《敦煌研究》1983年试刊第2期；《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变相》，《敦煌研究》1985年第5期；《从凡夫俗子到一代名僧的刘萨诃》，《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其他专注刘萨诃传记的研究包括：陈祚龙《刘萨诃研究》，《敦煌资料考属》，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年。史苇湘《刘萨诃与敦煌莫高窟》，《文物》1983年第6期；饶宗颐《刘萨诃事迹与瑞像图》，《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篇》(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霍熙亮《莫高窟第72窟及其南壁刘萨诃与凉州圣容佛瑞像史迹变》，《文物》1993年第2期。[法]魏普贤《敦煌写本和石窟中的刘萨诃传说》，《刘萨诃和莫高窟》，[法]谢和耐、苏远鸣等著，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日]肥田路美著，牛源译《凉州番禾县瑞像故事及造型》，《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2期，原载《佛教艺术》第217号，1994年。杜斗城《刘萨诃与凉州番禾望御山瑞像》，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1996年。[美]巫鸿《再论刘萨诃：圣僧的创造与瑞像的发生》，郑岩、王睿编《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原载 Orientations 27, 1996。王国良《刘萨诃和尚因缘记》探究，项楚、郑阿财主编《新世纪敦煌学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尚丽新《“敦煌高僧”刘萨诃的史实与传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4期；《刘萨诃信仰解读——关于中古民间佛教信仰的一点探索》，《东方丛刊》2006年第3期；《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解读》，《文献》2007年第1期。吴浩军《酒泉刘萨诃资料辑释》，《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村上佳浓「劉薩訶伝と劉薩訶信仰について」，《奈良美術研究》第7号，2008年6月。丁得天《甘肃金昌佛教文物遗迹的调查与研究》，兰州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田林啓「敦煌石窟における劉薩訶因縁変の台頭とその背景について」，《大和文華》第125号，2013年。张小刚《敦煌佛教感通画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张善庆、沙武田《刘萨诃与凉州瑞像信仰的末法观》，《敦煌研究》2008年第5期。张善庆《“李师仁”实乃稽胡离石刘萨诃》，《文献》2016年第3期。

②张总《阎罗王授记经》缀补研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品因故又从日本流出，现在分属世界各地博物馆。”^①这些作品多是出自陆信忠、陆仲渊、金处士之手。

作品形式非常固定，通常为—组十幅挂图，组合方式为十王图像，或者—组十一幅，组合方式是地藏菩萨加十王图像。每一幅图只画—身尊像。上栏绘制尊像，下栏绘制审判场景。

现在藏于奈良国立博物馆陆信忠《十王图》之阎罗王图中，阎罗王端坐案后，头戴王冠，身穿王者朝服，虬髯嗔目。右侧侍者，头戴软角幞头，身着朱色大衣，手捧录簿。左侧则是一位童子。案前置—业镜，亡人跪在镜前，衣领被鬼卒抓住，似乎浑身瑟瑟发抖，胆战心惊地看着生前所做种种不端，形象生动传神。画面左上方题写榜题“五七阎罗大王”。

相同的场景又见于奈良国立博物馆藏陆仲渊作品。阎罗王正在审判，双目凝视案前业镜。亡人被牛头鬼卒扭押着极不情愿地看着业镜，其身旁尚有鸡鸭各—只，也许正是亡人生前所屠杀的家禽，此时正在对质诉讼。画面下栏绘制刀山火海。

以上所举两个案例与极乐寺《六道绘》阎罗王部分非常相似，只是《六道绘》十王被分别绘制在了三幅画上，亡人图像也并无题记。如果说《十王图》中的亡人都是“群像”，那么极乐寺本只是根据相关文献，把业镜前受惩的亡人具体化了。

（二）敦煌《十王图》之阎罗王图像

较之宁波《十王图》，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十王图时代更早，属于晚唐五代时期，和宁波《十王图》存在割舍不断的联系。

敦煌十王图像遗存数量可观，语言也涵盖汉文、回鹘文、西夏文等，形式多样，^②大概主要分为经变式和插图式。经变式，通常

以地藏菩萨或者释迦牟尼佛为主尊，冥府十王分列左右两侧，呈对联式；或者对称，分别坐在主尊座前两侧，类似于佛会听法—份子，材质或为纸本，或为绢画，或为壁画。插图式，则主要采用连环画的形式，分别绘制冥府十王，有些图本配有赞词和经文；材质多为纸本；绘制技法粗劣，风格粗犷。有时为了整体布局 and 美观安排，经变式《十王图》阎罗王部分也时常绘制业镜和接受审判的亡人。而插图式十王图，则通常会表现这两种图像要素。

MG.17662 披帽地藏菩萨像并十王图，可称为地藏菩萨与十王经变。地藏菩萨作为主尊，位居中央，头披风帽，身穿山水纳袈裟，左手持锡杖，右手握明珠，游戏坐于山岩之上。道明和尚和金毛狮子立在座前。十王并诸侍者，分列于左右两侧。画面下栏绘供养僧人并世俗人物，题写发愿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阎罗王位于地藏菩萨左下角，案前有一亡人，身披枷锁，面向业镜，镜中显现亡人生前所做杀生恶业。

日本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藏董文员绘卷、P.4523+Ch.cii.015、P.2870、Cft00404+Cft00212+S.3961，属于插图类型。以Cft00404+Cft00212+S.3961为例，地藏菩萨和阎罗王左右相对而坐，共处—堂。业镜高悬。其中赞文曰：“第五七日过阎罗王/赞曰/五七阎罗王悉诤声/罪人心恨未甘情/策发住头看业镜/始知先世罪分明”。地藏菩萨和阎罗王共同治理地狱的思想可见于《佛说地藏菩萨经》，经云：地狱众生深受诸苦，“地藏菩萨不忍见之，即从南方来到地狱中，阎罗王共同—处，别床而坐。”该赞文出自《佛说十王经》^③和《佛说地藏菩萨发信因缘十王经》。

敦煌《十王图》已经非常明确地描绘了阎罗王断案场景，并且绘制了业镜。由下文讨论来看，藏经洞曾经出土《刘萨诃因缘记》，记

①何卯平《东传日本的宁波佛画〈十王图〉》，《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3期，第94—95页。

②张总《〈阎罗王授记经〉缀补研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罗华庆《敦煌地藏图像和“地藏十王厅”研究》，《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党燕妮《晚唐五代敦煌的十王信仰》，郑炳林、花平宁主编《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下册，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王惠民《中唐以后敦煌地藏图像考察》，《敦煌研究》2007年第1期。

③对于《佛说十王经》，杜斗城老师曾经做过全面扎实的校录和研究工作。（《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

叙了刘萨诃由于生前猎鹿，猝死之后，神游冥界，饱受果报之苦。即使如此，同样在敦煌，莫高窟《十王图》却没有刘萨诃题记。

三、刘萨诃入冥故事文本的演进

关于极乐寺本阎罗王部分故事画的文献来源，菅村亨指出“阿输阁国婆罗门”、“隋鹰郎将天水姜略”和“高陆秦安义”来自辽代非浊编《三宝感应略要录》、唐代释道世编《法苑珠林》、日僧住信编《私聚百因缘集》，^①但是并没有介绍刘萨诃故事画的文献依据。井上泰在菅村亨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刘萨诃故事画来自《释门自镜录》卷上^②。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最大的问题在于，唐人《释门自镜录》的记载实际上来自南朝《冥祥记》，其次，文中也没有把审判刘萨诃的地点明确为“阎罗王”处。^③

在此笔者略对刘萨诃入冥故事文本的发展脉络做一个梳理。

1. 《冥祥记》类文献记载

南朝王琰《冥祥记》最早记载了刘萨诃入冥故事。刘萨诃年轻之时喜好打猎，猝死之后，神游冥界，因为生前曾经杀鹿，受到冥界审判，具体记载如下：

晋沙门慧达，姓刘，名萨荷，西河离石人也。未出家时，长于军旅，不闻佛法，尚气武，好畋猎。年三十一，暴病而死，体尚温柔。家未殓，至七日而苏。说云：……荷作礼而别。出南大道，广百余步，道上行者，不可称计。道边有高座，高数十丈，有沙门坐之。左右僧众，列倚甚多。有人执笔，北

面而立。谓荷曰：在襄阳时，何故杀鹿？跪答曰：他人射鹿，我加创耳。又不噉肉，何缘受报？时即见襄阳杀鹿之地，草树山涧，忽然满目。所乘黑马并皆能言。悉证荷杀鹿年月时日。荷惧然无对。^④

《高僧传》兴福篇刘萨诃传记中吸收了《冥祥记》刘萨诃“好田猎”的记载^⑤，删除了神游地府、襄阳猎鹿等情节，重点记载的是刘萨诃江南巡礼活动，正如巫鸿先生所说，这代表着一种“南方观点”，他所寻访和发现的佛教遗迹和圣像为南方宗教和政治的正统地位提供了重要证据，并把这些遗迹确定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佛教胜地；《续高僧传》中，刘萨诃再次成为线索人物，把凉州瑞像故事展示了出来。^⑥

相比晚期入冥故事记载，《冥祥记》叙述刘萨诃猎鹿所得果报，并没有明确提出审判他的地点和人物——虽然文中提及“有人执笔，北面而立”，但是具体身份不明确。这种记载被收入唐人怀信所编纂《释门自镜录》晋沙门慧达死入地狱并宿世犯戒事条^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阎罗王作为地狱主宰的身份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

2. 敦煌本《刘萨诃和尚因缘记》

刘萨诃虽然已经名列《高僧传》兴福篇，到了唐代，他再次吸引了律宗释道宣的注意，被列入《续高僧传》感应篇^⑧，以及大师的其他编著，比如《释迦方志》^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⑩、《广弘明集》^⑪。但是释道宣似乎更加看重刘萨诃与凉州瑞像因缘故事，对于刘萨诃入冥故事着墨不多。

① [日] 菅村亨「極樂寺本『六道絵』について」，第64—67页。

② 井上泰「兵庫県極樂寺藏『六道絵』の<絵語>」，第9页。

③ [唐] 怀信《释门自镜录》，《大正藏》，第51册，第803—804页。

④ [唐] 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第2483—2485页。

⑤ [梁]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第178页。

⑥ [美] 巫鸿《再论刘萨诃：圣僧的创造与瑞像的发生》，郑岩、王睿编《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⑦ [唐] 怀信《释门自镜录》，《大正藏》，第51册，第803—804页。

⑧ [唐] 道宣《续高僧传》，《大正藏》第50册，第644—645页。

⑨ [唐] 释道宣《释迦方志》，《大正藏》第51册，第972页。

⑩ [唐] 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大正藏》第52册，第417页。

⑪ [唐] 释道宣《广弘明集》，《大正藏》第52册，第202页。

这个故事再次大放异彩，是在古代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曾经出土《刘萨诃因缘记》，共计4个写本：P.2680、P.3570、P.3727以及杏雨书屋羽698R^①。陈祚龙先生认为，这个因缘记的年代“最早也只是在初唐，而且它的‘蓝本’，谅必仍是释道宣的续高僧传。”^②尚丽新先生赞同初唐说，但是对于其材料来源，提出新的看法，通过分析冥游等情节，认为其来源包括民间传说、历史文献与碑刻；和《冥祥记》相比，尚丽新先生认为，“大相径庭”，并指出《因缘记》入冥故事来源于北方和敦煌特有的传说，产生的年代应该是南北朝末期到唐初。^③

深山猎鹿成为这则因缘故事颇具戏剧色彩的部分。今节录P.2680如下：^④

和尚俗姓刘氏，自（字）^⑤萨诃，丹州定阳人也。性好游猎，多曾煞鹿。后忽卒亡，乃被鬼^⑥使擒捉，领至阎罗王所。问萨诃言^⑦：“汝曾煞鹿以否？”萨诃因即诋讳^⑧。须臾乃见怨^⑨家，竞来相证。即便招丞（承）^⑩招。闻

空中唱声：“萨诃为鹿。”当即变身^⑪成鹿，遂被箭射，^⑫下迷闷，无所觉知。实时又复人身。^⑬

在这段中，“阎罗王”出现了，此时他的地位巩固起来，独领冥界。同样在初唐639年初唐齐士员献陵造像碑上，^⑭阎罗王坐在塌上，一名侍者头戴软角幞头，置身阎罗王身后，双手举伞；一名侍者，弯腰俯首，向阎罗王进呈录簿。接受审判的亡人都佩戴枷锁，而僧人却无此遭遇，显得安然自在。此外，所有肉食类飞禽走兽也都被戴上了枷锁，草食类则无。业镜尚未出现。这也是阎罗图像早期代表。

相比南北时期的《冥祥记》，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和日本极乐寺《六道绘》的距离更加缩短了一步。

3.汪向荣所辑《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

汪向荣先生根据流传于日本的《七代记》、《传述一心戒文》、《圣德太子传历》、《平

①2013年3月《敦煌秘笈》影片册第九册出版，公布了羽698R遗书图版，正面定名为《十方千五百佛名经》，背面定名为《和尚说返魂记》。“2013年7月14日松浦典弘氏于‘俄藏会’上释读此文书。‘俄藏会’成员山本孝子氏指出此为《刘萨诃和尚因缘记》”。（参见吕德廷《〈敦煌秘笈〉部分佛教与道教文书定名》，高田时雄主编《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8号，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4年3月，第202—203页）此卷在内容、书写格式等诸多方面存在若干疑点，以下录文暂且不作参考。

②陈祚龙《刘萨诃研究》，《敦煌资料考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47页。

③尚丽新《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解读》，《文献》2007年第1期，第65—71页。

④诸多前辈对《刘萨诃和尚因缘记》进行录文校对研究：陈祚龙《刘萨诃研究——敦煌佛教文献解析之一》，《华冈佛学学报》第3号，1973年5月；魏普贤《刘萨诃与莫高窟》，[法]谢和耐、苏远鸣等著，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65—467页（原载《敦煌学论文集》第2卷，日内瓦，1981年）；王国良《〈刘萨诃和尚因缘记〉探究》，项楚、郑阿财主编《新世纪敦煌学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582—597页；杨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4—89页，第258—268页。

⑤“自”，当作“字”，据P.3570、P.3727本和文义改。

⑥原本“鬼”下有“所”字，P.3570、P.3727皆无。“所”旁有卜字删除符，故删。

⑦“言”，P.3570、P.3727皆无。

⑧“诋讳”，P.3570作“抵讳”，P.3727作“抵毁”。

⑨“怨”，P.3570本作“怒”。

⑩“丞”，P.3570、P.3727同，当作“承”。“丞”为“承”之借字。

⑪“身”，P.3570、P.3727作“身变”。

⑫“斗变”，P.3570、P.3727作“”，即“斗”。《刘萨诃研究》释录为“肚”，《刘萨诃与莫高窟》作“卧”，《〈刘萨诃和尚因缘记〉探究》作“□下”，认为“犹陡下，谓突然间。按，□，即‘斗’字，与‘陡’通用，突然之意，韩愈《答张十一功曹》：‘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第585页）《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认为：“□下：首字不易辨认，似为‘斗’，存疑。”（第264页）

⑬图版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22—223页。

⑭张总《初唐阎罗图像及刻经——以〈齐士员献陵造像碑〉拓本为中心》，《唐研究》第6卷，2000年，第17页。

氏传杂勘文》、《上官太子拾遗记》、《古今目录抄》、《华严两种生死义》纸背文书等，辑逸《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其中涉及到刘萨诃，文云：

彼阿育王塔，乃是晋朝并州刘萨诃寻此塔也。萨诃本是猎师，常骑赤马、青马，青揭苍鹰捕诸禽兽。忽于一时病死，见阎罗王司命录籍，将其罪福，乃见杀鹿子俱来索命。萨诃乃云，私不杀。鹿云，在青山下杀秘；于时将青揭放苍鹰，骑赤马杀我等。当时即有业镜并现，青揭、赤马、青鹰、青揭俱来证，受不得云。大王引入地狱，但命未尽，欲放还南阎浮提。前件生命告不杀，大王乃云：汝若能出家修道，于越州东有鄞县鄞山，中有阿育王塔，在彼汝可往寻之，便于彼所修道者，乃放生汝还南阎浮提。萨诃乃言，阎罗王乃放，诸生乃言，放生须命报，何得直被还乡。王云令有出家行进，生命等乃放之。^①

尚丽新先生认为，思讬所记录的冥游故事大约流行于李唐武德八年到开元二十六年之间。笔者以为，对于这些材料的产生年代，还需要进一步考订，在日本国方才加入也未可知。

根据汪向荣先生的辑逸，刘萨诃见到阎罗王，面对质问，最初想要隐瞒抵赖，但生

前所做的种种杀生劣行，终究被业镜一一映照出来。这个版本和前两者也有所不同。《冥祥记》和《刘萨诃因缘记》中，在地狱点化刘萨诃的导师是观世音菩萨，但是《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却写成阎罗大王。“业镜”是这个故事里前所未有的元素。

至此，极乐寺《六道绘》刘萨诃入冥图像中两个关键性图像要素——阎罗王、业镜，全部出现。可以说，这应该是最近接极乐寺本的文献资料。

余论：本文仅仅是笔者针对刘萨诃入冥图像初步考察的试论稿，尚有许多值得继续探索的问题。正如巫鸿先生所言，文献和艺术中的刘萨诃更多地是一个传奇式的虚构，而非真实的历史人物。为什么他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文献和艺术作品中？对于从5世纪到10世纪精心编制刘萨诃故事的作家和艺术家来说，他的身世和灵迹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应该需要解决的问题。^②那么针对极乐寺本，刘萨诃入冥图像被选择的原因，则是尚需考察的问题之一。

附记：2016年本文提交甘肃永昌举行的“丝绸之路与圣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笔者在此感谢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王蕾和名古屋大学赵欢所提供的日语翻译和研究资料。

① [唐] 思讬著，汪向荣辑《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日] 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06页。

② [美] 巫鸿《再论刘萨诃：圣僧的创造与瑞像的发生》，郑岩、王睿编《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31—432页。



甘肃省永昌县圣容寺全貌

《对莫高窟五代 61 窟, 维摩诘经变, 北壁药师经变初探》

□ 李康敏 高志鹏

单位: 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

作者: 李康敏, 研究方向: 佛教美术 高志鹏, 研究方向: 佛教美术

摘要: 61窟是五代曹氏画院(曹议金)所造的莫高窟最大的洞窟之一,窟名“文殊堂”,此窟不仅规模宏大,形制典型,内容丰富,壁画保存良好;艺术水平高,而且是瓜、沙曹氏官府画院的代表洞窟。该洞窟不仅有闻名的《五台山全景图》及联屏佛传故事画,还有规模宏大的经变画和数量众多的供养人像等,内容完备,字迹清晰的经变题榜,为敦煌文化的研究,提供大量形象资料。

关键词: 莫高窟 壁画艺术 艺术价值

一、《维摩诘经变》探析

曹氏画院绘制的壁画,基本上承袭了晚唐的规范,但内容上大大地丰富了。与晚唐一样,经变画是石窟艺术的主要题材,61窟的《维摩诘经变》和《北壁药师经变》图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官府画院的作品。

位于东壁南侧的《维摩诘经变图》,其工整严谨的构图和造型,和谐统一的色彩调子,清晰具体的人物形象,技艺纯熟的工笔重彩,都已到极其完善的地步。

与初唐 335 窟的同样题材相比较,在构图上形式十分相似,然而在色调处理与画风特点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是以深褐色浓重色调把人物群概括在一个整体之中,以明亮的背景衬托出人群的整体效果;后者则以装饰性的手法,“随类赋彩”、“归纳法”处理色彩的“平面构成”。这是壁画最常见的一种色彩形式,也就是装饰色彩法,它以突的鲜明对比为主要特征,讲究色块之间大小位置的穿插和疏密对比,通过鲜明的色块来突出画面的中心,靠“色彩的穿插和并置”来获得

色调的和谐统一。我们从两幅同样的经变图中可以明鉴其两种赋色方法所产生的不同效果。就效果而言应该说是各有千秋,各具特色。前者色彩沉着浓重、和谐统一;后者色彩明亮清新、艳丽统一。前者体现了“文人画家”清、素、高、雅的艺术的情趣;后者体现出广大民众和“官府画院”的审美口味。两种不同的色彩方法反映出两种不同类型的画风。这两种不同画风自隋朝以来就已逐渐分明,形成两大流派。一派是以中原传来的文人画风;另一派为各地画匠高手的装饰性画风。两大派不仅在绘画形式和方法上有各自的特点,更明显的差异是在色彩结构上的不同处理手法,反映出两种不同的色彩观念和审美趣味。两种流派虽然在石窟艺术的共同事业中各显身手,相互影响,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长,然而却保持着各自风格的差异性。延续到五代时期,两种画风仍保留着明显的特色。

二、《维摩诘经变图》和《药师经变图》 艺术并探

以中原文人画家为主的画风,是以突出线

描勾勒与墨色渲染方法，以传统的工笔重彩的技法，追求并讲究壁画的“绘画性”与“观赏性”。追求色调的和谐与丰富，色彩的清淡高雅，及渲染着色的细致微妙见长。这类作品在本书的优秀图例中占据多数，其经典作品大都集中于隋唐早期。五代时期文人画风又再度兴盛，显示出“主导”画风的辉煌。如100窟北壁的《回鹘公主出行图》和98窟《于阗国王供养像》，36窟《普贤变》等都是五代文人画风之代表作品。

另一类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匠高手和名师巧匠的住作。它以突出壁画的装饰性和工艺性的风格。这一流派之画风自中唐以来一直占有数最上的绝对优势，自然占据了敦煌壁画画风的“主流”地位。61窟的《维摩诘经变图》和《药师经变图》正是这种装饰性和工艺性画风的代表作品。

装饰性风格的壁画以鲜艳的色彩和工整细致的绘画技术博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尤其符合于官府画院统治者的口味。技术上力求工整细致，色彩上鲜艳明快，是这一流派的两大特点。官府画院自然以此作为敦煌艺术施工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

三、壁画色彩分析

来自于民间的画匠高手无不深谙此道，审美观念的一致性，使画匠们无须再费心思去探索新的路子。造型上自有师傅留下的“蓝本”，赋色上有师傅传下的“口诀”和“秘方”。施工操作有师徒承袭的规矩，一切都可按照师徒传统的既定方针进行。观念的保守使画匠们难以真正吸收文人画风的艺术真谛，官府画院的严格管理和“质量”标准，限制了画匠们的创造性自由发挥。无论是壁画的行家高手还是技艺高超的文人画家，都必须遵循官府衙门的意志和口味，否则不能获得应有的物质待遇。我们从图例中可以看出两种流派在五代时期表现出较多的“共性”和“一致性”，这就是“规范化”、“标准化”、“模式化”倾向。尽管画师们都多少保持住自己的风格特点，但又融进了一致性的趋势。

以追求色彩鲜明美为第一要求的装饰性

壁画，袭用了师傅传下的色彩口诀，例如“红间绿、花簇簇；红间黄，喜煞娘；白间黄，胜增光；黑间紫，不如死”。如今看来不过是赋色经验之“只鳞片甲”实不足以揭示色彩之奥秘。然而却可能被工匠视为祖传秘方。

观念上以“鲜明美”为第一追求，就会自然会轻视“和谐美”，并淡化“丰富美”。这势必导致壁画在色彩上出现病态的发展趋势。所以在中唐以后，这类装饰性的壁画就显示出与隋唐早期的不同变化：其一是色彩的鲜明度及“纯度”加强了，对比度加强了；其二是色种增多了，色相环中的各种颜色近乎齐全；其三是黑、灰、白等调和色的逐渐减少。“墨色”、“复色”及“中间色”的相应减少，形成了“重色轻墨”的赋色倾向。五代时期这种倾向已走到极端之地步。大量地使用石青石绿，过多地使用红绿对比，似乎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色，造成了色彩调子的单一化和色彩层次的单调化。其色彩效果是：艳丽之中掺和着“甜俗”；鲜明之中显露出“轻浮”，过强的对比显得生硬，色种的多样则难免花哨。

颜料品种的增多和颜料纯度的增高，本应该有利于壁画色调的多样化，其实则不然。颜料的多样齐全反而造成了壁画色调的单一化模式。自中唐以来壁画所用色种大致都在十二种以上。在隋朝以前的壁画用色只有七、八种，如除去“墨色”之外鲜明颜料只用三四种，其色调变化则多样无穷，这似乎不合常理的现象却是事实，北魏时期的优秀图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色调是一幅画的色彩相貌，反映出一幅画的特有个性，色彩单纯的画面其色调个性也强；各种色相都齐全的画面其色调个性必弱。这与烹调做菜的道理一样，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配料可以做成不同味道的菜来，而色种齐全的画面就好比是“炒什锦”和“大杂烩”。如果一桌子全是“大杂烩”之类，也就不成其为丰富的宴席。“程式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质量要求”是壁画艺术逐渐衰败的重要原因。

敦煌石窟艺术之所以能够兴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官府衙门的支持，如果没有当

朝统治者的支持和重视，如此宏大的石窟艺术工程就难以实行。自隋唐以来官府画院对石窟艺术的开凿与筹建，起着绝对重要作用，无论从资金投入到人材调集、工程管理等各方面做出了大量工作，实在是“功德无量”，对佛教艺术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然而官府衙门又同时限制了石窟艺术的艺术发展。既然是官府的画院，就必须服从官府的意志，迎合官府的口味。在内容题材上有既定的佛教宣传提纲，在绘画技术上有严格的“质量要求”，造型上也有具体的佛教规定，一切须按佛教的规范来进行，不允许“粗制滥造”、“偷工减料”。36窟的《药师经变》图就是在“规范化”的质量标准要求下，出现的壁画风格模式。其特点工细无比，面面俱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工细者不厌其烦！重复者不厌其多！菩萨造型如印章刻出，上下内外同样清楚，“一视同仁”地坚持“质量”标准。就技术质量而言，可谓绝对“达标”，壁画的每一局部均可分割成独立的画面。图中数百个菩萨佛像均照实画出，无一虚漏。亭台楼阁，一砖一瓦，清楚可见。风景人物充满画面，作为“密体面”来看，可谓“密集到家”。画师着实“用心良苦”，为观众着想，能看清楚更多的东西，以增加作品的“观赏性”。

然而“技术质量”并不等于“艺术质量”，“工艺性”替代不了“绘画性”，面面俱到的“工整性”也不等于“观赏性”。千篇一律的色调，繁琐细腻的刻划，面面俱到的“平均主义”，使壁画显露出过度劳累的痕迹，观众在叹服之余难免产生“腻味”过度的繁杂反而使观者不耐烦！“平均主义”的处理，使观者难以集中视线，同样清楚的物像令观者一览无余，不必再去细细观赏，也无须回味与联想。画匠们未能预料的效果是“事与愿违”。

四、结语

总之壁画艺术在“程式化”、“规范化”、“标准化”的统一要求下，逐渐减弱了“绘画性”而失去“观赏性”。如果与隋唐早期的壁画相对照就可发现它缺少“虚实感”、“含蓄感”、“朦胧感”、“神秘感”。这些体现出艺术趣味性的东西，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更难为一般画匠所理

解，这些似乎与“技术水平”无关的东西，其实正是“文人画风”中所蕴含的“美学”真谛。说白了就是我们传统绘画中所讲究的“精、气、神、韵”中之“气韵”是也。这些讲究并非仅仅是对“骨法用笔”而言，也是包括对画面的色彩结构及整体效果而言，所谓“气韵生动”也并非“水墨画”才应讲究的东西。壁画、工笔画、“密体画”同样要讲究这些东西，西洋油画和水彩、水粉画也同样包含有这些讲究。它是绘画艺术“绘画性”、“观赏性”和“趣味性”之所在，也是绘画艺术之所以能“百看不厌”要“细细品味”的道理。

在绘画艺术的处理手法中就有讲究“取舍”、“隐藏”、“遮挡”、“虚实”、“减弱”等等。所谓“虚实相间”、“意到笔不到”、“以一当十”在绘画中的内在含义，其中包含着许多美学哲理。这些已不是“技术”所能包括的东西，所以定名为“艺术技巧”。

因此“技术质量”的好坏不能等同于“艺术技巧”的高低。

本文实在无意去贬低工匠画派的艺术成果。仅仅是为了通过图例的分析研究，弄清楚敦煌艺术何以会在盛唐的“高峰期”之后就逐渐衰落的原因。色彩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如何从“强项”的优势地位逐渐转变为“弱项”的原因，以便正确评价和认识敦煌艺术的价值。

参考文献：

- [1] 俞旅葵，王雄飞. 矿物色使用手册 [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35.
- [2] [唐]玄奘. 大唐西域记 [M]. 周国林，译. 长沙：岳麓书社，2002: 14.
- [3] 李最雄. 敦煌莫高窟壁画彩塑颜料分析研究 [J]. 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2002: 4.
- [4] 张小鹭. 现代日本重彩画表现 [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 [5] 李进发. 日据时期台湾东洋画发展之研究 [M]. 台北：台北市立美术馆，1993.
- [6] 张大千. 《张大千画语录图释》 [M]，西泠印社，1999年

单位：甘肃省敦煌市古城区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李康敏 邮编：736200 电话：18393298304

略说慧达大师(刘萨诃)的历史功绩

□ 王裕喜(妙觉)

我们知道，佛教诞生于印度（古天竺）。公元前 982 年，净饭王太子悉达多有感于人生老病死之根本痛苦无法解决于十九岁出家访道，历十二年苦修，于三十一岁菩提树下悟道成佛，顿悟宇宙人生真相，说法利生四十九年，从此佛法传遍了全世界。而在整个佛法法运的流传过程中，有过几次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在佛陀灭度后不久，公元前 273-232 年间，古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阿育王出世。这是一位雄才大略，虔诚信佛的君王，他不但统一了全印度，而且将佛陀舍利分赠普天之下的各国，使佛法普及到了全世界有佛缘的地方。当时中国据说有二十多粒。这些佛舍利均装在宝塔之中而分散在世界各地。这也是佛法日后遇缘而兴的佛门玄机。那么这些佛舍利在中国的江南一带，如建康（今南京）宁波等地的佛舍利的重现就与我们今天要说的慧达大师（刘萨诃）密不可分。而且南京重现的是佛陀顶骨舍利，是佛陀智慧的象征，这不能不说是意义非常的事件，而慧达大师（刘萨诃）在佛法东传史上的影响与贡献不能不说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位高僧了！

慧达大师（刘萨诃）史籍记载他出生于今山西离石，于同时代西天取经求法的法显大师，东游传法的昙始大师都是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历史时期：东西二晋十六国，五胡乱华，南北割据，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在这一时期，国家处于大乱之中，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何解救民众之苦，佛法担当起了这个历史重任。西域来华传法的有：佛图澄，鸠摩罗什，佛伏巴陀罗等大师。东土西天取经的有法显、慧达及同

行的十五位僧众。当然，在他们之前也有先驱者，但均成功者很少。法显及慧达等僧众西行求法，成功奠定了佛法东传的基础。而慧达大师（刘萨诃）在返回途中对今日影响遍及全世界的敦煌石窟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功不可没。而他在西行之前江南拜佛舍利在历史上有特殊的贡献。我们应该明白，佛法是不可思议之法，是无实无虚之法。不可思，就是说用思想想不出来；不可议，用语言说不明白。无实你看不到；无虚他确实存在。而且它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世间万法的究竟归属之处，被称为无上正等正觉！当时公元三至四世纪之时期，佛法虽说已传进中国，但官方并不认可，民间传播也是难以普及。一种信仰一个真理想要让民众接受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慧达大师江南拜出佛舍利，创建了阿育王寺，感化了赵国国君刘渊休兵罢战，减轻了民众饱受战乱之苦，其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慧达大师（刘萨诃）还有之前的康僧会等高僧的努力，当时的统治者开始信奉佛法，弃恶向善，使国运渐好战事平息。这正是这些高僧的历史功绩。也由于这些高僧们的努力与佛法的普及，使得饱受战乱之苦的民众有了精神上的正道信仰，在苦痛中看到了人生希望。

慧达大师（刘萨诃）生于离石，显化于江南，功在于西行求法，敦煌留名，圆寂于河西走廊。这样一位有功于中华民族的高僧过去未曾被人发现，今天大家在一起研讨他的事迹，这要感谢白礼昌老师的多年的考古努力，感谢薛平等老领导的大力发心支持，更要感谢吕梁政府的各位领导高度重视，用佛家一句话来表达，大家功德无量，祝愿大家吉祥如意，事业兴旺发达。

圣僧与圣像

——又论刘萨诃

□ 尚丽新

(山西大学 国学研究院,太原 030006)

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刘萨诃与番禾瑞像的关系来揭示刘萨诃民间佛教信仰的本质。刘萨诃信仰典型地展现了佛教入华后在民间传播的原始状况和传播方式;同时,刘萨诃信仰还细致地展现了下层社会践履型的民间佛教信仰进入上层社会,被上层社会利用、改造和崇奉的全过程,典型地体现了佛教在上、下层社会的传播和发展变迁。

关键词: 刘萨诃,番禾瑞像,民间社会,上层社会

中国佛教在接受和传播过程中,民众的信仰实践活动是推动佛教发展的主要动力,宗教一旦脱离了广土众民的信仰与实践,其生命力就会枯竭。所以民众的信仰实践活动是全部宗教文化的基础,也是民众精神史的生动反映。而历代对佛教的研究,重在教义和宗派,对民间的佛教信仰很少涉及。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一般民众的佛教信仰,于是把视线投向民众对佛教教义的认识和理解,祈愿和追求,信仰实践的内容、方式、特点,以及民众佛教信仰对社会的影响等等。但与宋以后在这方面取得的较大进展相比,宋前、尤其是唐前的研究成果简直是屈指可数。侯旭东在总结了国内外学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说魏晋南北朝时民众思想,包括佛教信仰史研究基本属于空白并非妄语。学者或为研究思路所限,或囿于资料匮乏,难以开展。”^①而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大发展的时期,也是民众佛教信仰最为真挚、最为热忱的时期。一般来说,事物的初始形态中往往孕育着这

一事物最本质的东西,所以要想在研究时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就应该注意该对象的初始形态。因此,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民众的佛教信仰就显得格外重要。

恰如侯旭东在四至五世纪的造像记上发现“反映这一时期民众精神世界的资料实非空白”,^②四世纪起不断产生的高僧刘萨诃的传说也是反映佛教信仰在民间传播的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性的个案。正因为如此,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刘萨诃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诸多优秀的学者如陈祚龙、孙修身、史苇湘、饶宗颐、霍熙亮、肥田路美、巫鸿等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与刘萨诃相关的问题作了十分深入的探索,显示了专家学者们独到的见识和开阔的视野。但作为中国宗教史上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刘萨诃研究尚未结束。这突出地表现在虽然对刘萨诃信仰的本质——民间的佛教信仰——逐步达成共识,但多停留在感性的表层,缺乏具体而深刻的论证。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刘萨诃与番禾瑞像的关系来揭示刘萨诃

^①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的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页。

^②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的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页。

民间佛教信仰的本质。

一、被遮蔽的历史

刘萨诃确有其人。他是一位活动在四世纪下半叶到五世纪初的游方僧人。出家前是个目不识丁的稽胡族下级军吏，因为三十岁时巡游地狱的偶发事件出家为僧。^①随后去江东寻觅礼拜阿育王塔、阿育王像。此后，主要在稽胡人聚居地（今天晋陕交界的黄河两岸）和河西走廊传教，受到西北民众的崇拜。六世纪二十年代，在河西走廊的番禾（今甘肃永昌）出现了著名的能预测兴衰治乱的番禾瑞像，而刘萨诃正是番禾瑞像的预言人。此后，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刘萨诃和番禾瑞像在西北地区发生着持续的、强烈的影响。在史实与传说交织的各种史料构建的迷宫中，首先需要引起重视的就是刘萨诃的身份，可以说这是解读刘萨诃的民间佛教信仰本质的一把钥匙。从各种史料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刘萨诃的两种身份：一是“名僧”、“高僧”、“和尚”、“圣者”、“上人”等。二是“胡师佛”、“刘师佛”、“观音菩萨”、“苏合圣”。显而易见，前一种身份是经过权力阶层和知识僧侣认可的，而后一种身份则是刘萨诃的民间身份。刘萨诃的民间身份，是我们判定刘萨诃信仰的本质——民间的佛教信仰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道宣在刘萨诃辞世大约二百年后，经过实地调查，以客观严谨的态度记录了今山陕交界黄河两岸稽胡居地刘萨诃信仰的状况。据道宣的记载，刘萨诃在稽胡人中有三种身份——佛、观音菩萨和苏合圣。将刘萨诃称为“苏合圣”，是稽胡人的特权。在关于刘萨诃所有神异传说中，最有趣的莫过于“苏合圣”了。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载：“昼在高塔，为众说法；夜入茧中，以自沉隐；旦从茧出，初不宁舍。故俗名为苏

何圣。‘苏何’者，稽胡名茧也。以从茧宿，故以名焉。”“然今诸原皆立土塔，上施柏刹，系以蚕茧，拟达之止也。”^②道宣的这番记载显然表明刘萨诃在稽胡八州之地是备受供奉的蚕神。为什么能在稽胡居地较早地产生出“苏合圣”这么一个独特的佛教化的蚕神？五胡十六国时期，活动在中原历史舞台上的是北方少数民族，他们一般都是不谙耕织的游牧民族，元魏入主中原之后，为解决衣食问题、将农桑政策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也许就是在那一时期，稽胡充分认识到耕织的重要性，其农业和纺织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大约在五世纪末的时候，稽胡这个以山居射猎为主的民族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之后，就产生了他们自己的蚕神——苏合圣。也许只是历史的一个偶然——“萨诃”恰恰是“蚕茧”的意思。稽胡居地的自然环境根本不适合种桑养蚕，除了在纬度较低的高原地区可以养蚕之外，大面积的山区是根本不可能养蚕的。那么，苏合圣为什么会得到八州稽胡的共同供奉呢？我猜想苏合圣不仅是蚕神，恐怕也是农神。稽胡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创造出他们复杂的神佛谱系，就以蚕神来代替农神，苏合圣在实际上扮演着耕织之神的角色，护佑着稽胡人的农业经济。对于居于深山、劫掠为生的稽胡来说，“苏合圣”之创造，传达出发展民族经济文化以求生存发展的深层的一种民族愿望。

从稽胡居地至河西走廊，刘萨诃同样具有佛和观音菩萨两种身份。道宣亲眼看到刘萨诃被稽胡人当做“佛”来供奉。《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载“何遂出家，法名慧达。百姓仰之，敬如日月。然表异迹，生信愈隆。……故今彼俗，村村佛堂无不立像，名‘胡师佛’也。今安仁寺庙立像极严，土俗乞愿，萃者不一。”^③道宣在《续高僧传》和《释迦方志》中又提到了一种名叫“刘师佛”的形

^①现存最早、最详细记录刘萨诃地狱巡游事件的是南齐王琰的《冥祥记》。[唐]道世《法苑珠林》卷八六引，载《大正藏》，东京：日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32年，第53册，第919—920页。

^②《大正藏》，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32年，第52册，第434—435页。

^③《大正藏》，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32年，第52册，第434页。

象。我认为“刘师佛”就是“胡师佛”。^①胡(刘)师佛最主要的功能是预测吉凶,《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载:“每年正月,輿巡村落。去住自在,不惟人功。欲往彼村两人可举,额文则开,颜色和悦,其村一岁死衰则少;不欲去者十人不移,额文则合,色貌忧惨,其村一岁必有灾障。故俗至今常以为候。”^②刘萨诃被作为佛来供奉,不限于稽胡居地,也不是随着稽胡族的汉化而消失的。直至明代,在河西的酒泉,刘萨诃的仙逝之地,他仍被当地人作为“佛”来供奉。万历四十四年(1617)修成的《肃镇华夷志》卷二《古迹》载:“手迹崖:城西二里周家寺后沙崖上有手印,人以为古迹奇异。俗妄言乃佛见讨来河水盛,恐没其城,以手推崖,脚登河崖,故水不能淹城。”^③这位“佛”是谁呢?正是刘萨诃。据《肃镇华夷志》卷二《祠祀》目载:“西峰宝寺:城西三里。据《神僧传》云:昔蒙逊时,有僧人名慧远,游居武威,一旦云,肃州人有水难,吾当速救。于是,寅时起身,巳时至肃,正见讨来河水势侵城,用手一指,水即回波,后圆寂于此,遂建浮屠,以藏其骨,人遂以手助崖为右迹,后人因此遂充拓为寺。而西峰今将平矣。有重修碑记云。”^④此碑立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现藏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碑文记载:“肃城之西,旧有浮屠刹宇,古传慧达神僧飞锡至此,知其地可作宝林。”^⑤可见“慧远”为“慧达”之误。而“俗妄言”三字恰恰透露出

这条传说源出民间,民间是一直将刘萨诃称为“佛”的。

刘萨诃除了“佛”的身份之外,还有一个观音菩萨的身份。在稽胡居地,刘萨诃被认为是观音菩萨“假形化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亦以为观世音者,假形化俗。故名惠达。”^⑥同样,在河西走廊,他亦被视为观音。据《太平寰宇记》记载,酒泉有刘萨诃的门人为他所立的庙。^⑦此庙的主尊毫无疑问应该是刘萨诃像,值得注意的是主尊左侧有观音像,刘萨诃的灵骨正放在观音像的手上。《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载:“行出肃州酒泉郭西沙砾而卒。形骨小细,状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绳连。故今彼俗有灾障者,就砾觅之,得之凶亡,不得吉丧。有人觅既不得,就左侧观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寻之,还在像手。”^⑧无疑暗示了刘萨诃与观音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敦煌,刘萨诃亦被视为观音化身,作于曹氏政权时期的S.3929V《董保德佛事功德颂》中有云:“疑是观音菩萨,易体经行;萨诃圣人,改行化现。”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出现了观音被俗化为普通人这一现象,诸如杯度为闻声而至的观音示现,天台宗第二代祖师慧思(515—577)被礼敬为观音化身,梁代异僧宝志被认为是十一面菩萨之化身,梁高祖亦被称为观音等等。这是外来佛教本土化、民俗化的一个典型表现。刘萨诃从冥游故事中那个被观音训导的罪人摇身变为观音的化身,由一个

①关于道宣所记载的“胡师佛”形象是刘萨诃的造像还是番禾瑞像的造像,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刘萨诃的造像,但也有争议。史苇湘认为“胡师佛”和“刘师佛”是两个形象,前者是刘萨诃的像,后者是番禾瑞像的像。(史苇湘:《刘萨诃与敦煌莫高窟》,《文物》1983年第6期,第8—9页)而巫鸿却将二者均视为番禾瑞像的像。(巫鸿:《再论刘萨诃——圣僧的创造与瑞像的发生》,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35页)其实,通过细读道宣的相关记述,可以肯定“胡师佛”是刘萨诃的造像。

②《大正藏》,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32年,第52册,第434页。

③[明]李应魁撰,高启安、邵惠莉校注:《肃镇华夷志校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0—161页。

④[明]李应魁撰,高启安、邵惠莉校注:《肃镇华夷志校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

⑤吴浩军:《酒泉刘萨诃资料辑释》,《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第102页。

⑥《大正藏》,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32年,第52册,第434页。

⑦《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二《陇右道·肃州·酒泉县》载:“刘师祠,在县南。姓刘,字萨河。沮渠西求仙,回至此死,骨化为珠,血为丹。门人因立庙于此,今人致心者,谒之往往获珠丹焉。”[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946—2947页。

⑧《大正藏》,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32年,第52册,第435页。

消极的接受神谕者变为一个能够发出命令的积极的神，他承担着为所有信众祈福禳灾的神圣而功利的使命。

我们还可以推知当时北方民间的刘萨诃信仰非常隆兴、非常久远，否则的话，番禾瑞像是不会选择他来做预言者的，著名的道宣也不会花费精力去研究刘萨诃了，明代的方志中也不会为他记上一笔。不过，关于民间的刘萨诃信仰的资料毕竟十分有限，除了道宣的记载就是一些方志。道宣花了两年的时间在稽胡聚居的关表一带做调查，态度非常客观。在他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详细记载了稽胡人对刘萨诃的崇奉状况，正是得益于道宣的这一记载，我们才得以考见唐初刘萨诃信仰的民间状态。但在刘萨诃的“正传”《续高僧传》中真正的角色是番禾瑞像而不是刘萨诃，这说明道宣是在关注番禾瑞像之余才附带地记录了刘萨诃信仰的民间状态。在权力阶层和知识僧侣的评价和定位中，刘萨诃在佛教史上的身份是“高僧”，道宣也不例外。至于方志中出现的刘萨诃的相关资料，更容易解释，方志专记天下四方之事，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最小，反而倒是客观的。显然，上层社会是不会对民间信仰倾注太多的关注的。作为佛、观音的刘萨诃是作为高僧的刘萨诃的附庸，刘萨诃隐藏在番禾瑞像的光芒之下，圣僧与圣像的真正关系被长久地遮蔽起来了。

二、圣僧与圣像

520年，番禾瑞像诞生，这是刘萨诃得到上层社会重视的标志性事件。在著名的番禾瑞像诞生之前，上层社会并未注意到刘萨诃。虽然萧梁时刘萨诃就已经名列宝唱的《名僧传》和慧皎的《高僧传》。不可否认的是，这两篇传记的真正主人是那些来历非凡的阿育王塔、阿育王像，而不是刘萨诃。南

朝的知识僧侣之所以会将刘萨诃载入史册，是为了用这些南方的圣物来确立南方佛教的正统地位，诚如巫鸿所言：“大约形成于东晋时期的南方观点符合了慧皎的需要。当时南北之间的争斗仍在继续，慧皎在杭州嘉祥寺所写的刘萨诃传记表达了他对确立南方佛教正统地位的努力。”^①而且，南方佛教界完全忽视了刘萨诃的预言和法术。奇异的预言和法术是北方民众信仰刘萨诃的最重要的原因。宝唱将之置于“苦节”，不入“神力”；慧皎将之置“兴福”，不入“神异”。《名僧传》和《高僧传》中所记载的神异僧无一不是与权力阶层有近距离的接触、得到社会上层的重视的。可以说，刘萨诃在北方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系列的神异事件并没有引起南方上层社会的重视。

番禾瑞像的最早记录出自北周的道安的《制像碑》，原文今已不存。从道宣和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的引述来看，《制像碑》讲述的是番禾瑞像诞生这一中心事件。唐初道宣的《续高僧传》也是以番禾瑞像为中心的，诚如巫鸿所言：“道宣将刘萨诃惟——一个生活事件加以记录，而把其余的笔墨尽量用在渲染刘萨诃死后番和瑞像的种种灵异。换言之，这篇传记的本身主角已经不再是刘萨诃，而是这身神奇的佛像。”^②也就是说，他们是先注意到瑞像，然后才注意到瑞像的预言者刘萨诃。而且，那些关于瑞像灵异的记载都是以权力阶层与瑞像的关系为中心的。道宣《续高僧传》主要记载了无首瑞像的出现与“魏道陵迟”，北周的“相好还备，太平斯在”，像首又落与“周灭佛法”、“邻国殄丧”，隋代经像大弘“炀帝躬往礼敬厚施”。1979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天宝年间的石碑记录了隋至唐天宝年间番禾瑞像的各种灵异事件：开皇九年（590）凉州总管燕国公宇文庆诣寺礼拜，唐兵部尚书郭元振诣寺画像，唐中宗令御史霍嗣光持幡花袈裟诣寺敬礼，开元年间鄯州都督郭知运、陇右诸军节度

①巫鸿：《再论刘萨诃——圣僧的创造与瑞像的发生》，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35页。

②巫鸿：《再论刘萨诃——圣僧的创造与瑞像的发生》，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37页。

《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35页。

《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37页。

使河西节度使萧萋副将杜宾客诣寺礼拜。^①权力阶层对番禾瑞像的信仰，更表现在践履之上。据肥田路美统计，能够确认的从唐至宋、西夏时期的表现番禾瑞像的图例有五十例左右，^②这些图像大多出现在敦煌莫高窟、敦煌西千佛洞、酒泉文殊山石窟、安西榆林窟。可以肯定，这些洞窟是河西贵族为了宗教信仰开凿的。番禾瑞像如此频繁地出现在这些洞窟中，这表明它是河西上层社会普遍信奉的神灵。番禾瑞像得到上层社会的普遍崇奉的原因非常明显。它与政治的关系尤为密切：一方面它以像首的“安”或“落”昭示政治的“治”或“乱”，另一方面又对率直、强悍、充满叛逆精神的西北民族起着“革惩胡性，奉行戒约”的作用。番禾瑞像不仅是政治的晴雨表，也是佛教兴衰的晴雨表，它能够将国运与法运结合在一起。相好还备则太平斯在，像首落去则法难与国亡同时降临。

正是因为对番禾瑞像的重视，上层社会才会注意到瑞像背后的刘萨诃，圣像的出现^③是刘萨诃由民间社会进入上层社会的契机。不过，进入上层社会的刘萨诃的地位下降了。在番禾瑞像的地位不断上升的同时，刘萨诃却由民间的“胡师佛”、“观音菩萨”、“苏合圣”而下降为佛教史上一位普通“高僧”。

从番禾瑞像产生之后直到归义军时期，人们一直在努力确定圣像与圣僧的身份地位。对此，道宣可谓功不可没。在确定圣僧和圣像的身份和地位上，道宣尽了最大的努力。在《道宣律师感通录》和《律相感通》中，他为刘萨诃找到了前身——利宾菩萨。在迦叶佛时，番禾民众不信佛法，以杀害为事，大梵天王造了一尊佛像，利宾菩萨以神力使这尊佛像如真佛一样巡化四方、教导人民。三百年之后，番禾被邪恶控制，利宾菩萨在世界毁灭之前将佛像藏到山神寺中，直至他转世为刘萨诃，才将佛像感应出来。这个利宾菩萨的故事不是道宣记录的民间传说，而

是道宣思考的结果（道宣声称《道宣律师感通录》和《律相感通》记录的是他与“天人”的对话）。“利宾菩萨”的故事，有效地将刘萨诃与番禾瑞像区分开来，刘萨诃的身份不再是“佛”，而是一个番禾本土的一位菩萨（印度的佛教神灵谱系中没有这么一位“利宾菩萨”）。而且，道宣暗示了大梵天王所造的这尊佛像可能是迦叶佛或释迦佛的像。道宣的这种解释为后来的标准的圣像为主圣僧为辅的模式打下了基础。大约到了武周时代，番禾瑞像为释迦佛之像，这一点就十分明确了。大英博物馆藏敦煌 17 窟石室出土的武周时代的番禾瑞像刺绣幡画中，主像的两旁绣有阿难、迦叶二弟子和文殊、普贤二菩萨。

关于刘萨诃与番禾瑞像的关系，图像比文字更容易说明问题。在莫高窟 72 窟南壁的壁画上看得最为清楚。在这幅壁画上，共有十四尊番禾瑞像出现在画面的中部和上部（一般来说，壁画上部的位置多属神灵，中部多属帝王贵族和僧侣，下部属普通人），其中最大的两尊占据了画面的中心位置。番禾瑞像在榜题中被称为“圣容像”。刘萨诃在整幅壁画中出现了五次，分别出现在壁画的上、中、下三个部分。刘萨诃的高度不足画面中部圣容像高度的四分之一，榜题称之为“刘萨诃和尚”或“圣者刘萨诃”。出现在画面中心位置两尊圣容像旁边的刘萨诃最能说明问题，其一榜题为“刘萨诃和尚赴会思发修僧时”，其二榜题为“刘萨诃和尚焚香启愿时”，表明刘萨诃是参加释迦说法大会的众神之一，他要对他授记的圣容像顶礼膜拜。除了南壁的壁画，72 窟西壁龛外帐门上的画像也很能说明问题，帐门南侧上段画泗州和尚，榜题为“圣者泗州和尚”，帐门北侧上段画刘萨诃，榜题“圣者刘萨诃和尚”。从二者对等的位置可以看出刘萨诃的地位与另一位神异僧泗州和尚相当。此外，刘萨诃的图像还出现在第 98 窟、第 61 窟中心佛坛背屏后，这些

^①孙修身，党寿山：《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考释，《敦煌研究》1983 年创刊号，第 102—107 页。

^②不过肥田路美的统计有一定的主观性，例如山西省博物馆所藏佛像的右臂已被毁，肥田推测可能是与愿印，证据不足，此像是否为番禾瑞像应该存疑。[日]肥田路美撰、牛源译《凉州番禾县瑞像故事及造型》，《敦煌学辑刊》2006 年第 2 期，第 165—180 页。

画面仍以高大的番禾瑞像为主，在瑞像脚下、很小的空间里画着刘萨诃劝戒猎师李师仁的场面。总之，各种相关图像表明，番禾瑞像是释迦牟尼佛的瑞像，而刘萨诃是辅助瑞像的圣僧。在权力阶层的眼中，圣像远比圣僧重要得多——圣像有权对时政作出或积极、或消极的评价，而圣僧刘萨诃只是辅助政教而已。这是石窟中大量复制瑞像的原因，瑞像是佛教谱系中的正神，它与其它瑞像共同组合成“瑞像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标示着不同的仪式功能的位置上。圣僧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在一个“戒杀”的榜样上：刘萨诃劝戒猎师李师仁情节也经常出现在中心佛坛的背屏后，且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的重心放在地狱巡游上、相关篇幅占了全文的一半多。敦煌遗书中的相关文献还表明，刘萨诃以其奉行戒约、福佑一邦成为僧人的典范。归义军时期的名僧道真曾造刘萨诃像施入三界寺，^①道真晚年在莫高窟中修行时被时人比作刘萨诃。^②归义军时期的另一位名僧法宗作《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S.4654A)呈献给敦煌王曹元忠，在盛赞刘萨诃的同时又旌美曹元忠的奉佛之举，非常自然将传法与辅政结合起来。由此可见上层僧侣对权力的敬畏尊崇，他们的理想多了几分“王者师”的色彩。

在经过权力阶层和知识阶层一番功利的和理性的净化之后，刘萨诃的民间性被遮蔽起来。人们看到的只是权力阶层与上层僧团结合在一起的信仰现象，却往往忽略了番禾瑞像的民间源头。让我们再回到番禾瑞像诞生之初，刘萨诃之所以被选中作为番禾瑞像的受记者，是因为他在河西民间强大的影响力，既然稽胡人称他为“佛”，明代酒泉民间仍称之为“佛”，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

在南北朝至唐宋的河西民众也称之为“佛”。公元520年诞生于河西番禾山崖中的瑞像只是一尊佛像，具体是哪位佛，太延元年刘萨诃受记时亦未明言是释迦牟尼佛。鉴于刘萨诃在河西巨大的影响力，民众会很自然地把他与瑞像的主人等同起来，番禾瑞像即是刘师佛或胡师佛的像是顺理成章的。民间信仰不会像正统宗教那样秩序井然，他们的神灵谱系是变化无常的，能取得民众信仰的最充足的理由就是灵应，所谓灵则信。刘萨诃仙逝之后，他的灵骨在二百年之后仍然具有预测吉凶的功能，番禾瑞像的出现距离刘萨诃去逝不足百年，河西民众不会舍弃他们非常熟悉的、法术无边、灵应无限的本地神而另择他神。番禾瑞像出现其实是民众刘萨诃信仰的延续。在唐五代时的河西走廊，番禾瑞像和刘萨诃的神职功能是一样的——天宝年间在武威出土的石碑记载了番禾瑞像不仅能够阻止各种破坏性的灾难，而且将远近民众的各种乞愿一一应验：“至今无恙，事俱验□。若乃乡曲贱微之人，远方羁旅之士，或飘□独往叩地申冤，或子尔孤游瞻颜乞愿……”^③产生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遗书里又有刘萨诃成功地预言了莫高窟，以锡杖划出宕泉、为敦煌带来涓涓流水的传说。^④可见，这位“高僧”又是地方神，保佑着敦煌的佛法兴隆、生活安定。总之，在民间，刘萨诃即番禾瑞像，民众将之笼统地称为“佛”。在民间的意识里，圣僧与圣像应该是同一的。刘萨诃与番禾瑞像的分离是知识阶层和权力阶层的规约民间信仰的结果。

三、结语

中国佛教史上并不缺乏具有各种神异功能的高僧（最典型的莫过于与刘萨诃具有相同时代背景的佛图澄），能预示治乱兴衰的瑞像也

①约作于935年S.5663A《中论》卷第二道真题记云：“道真造刘萨诃和尚（像）……已上施入经藏供养。”

②S.3929V《董保德佛事功德颂》：“疑是观音菩萨，易体经行；萨诃圣人，改行化现。”

③孙修身，党寿山《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考释（《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号，第103页）一文对武威石碑有整理，但有讹误之处。笔者目睹碑文拓片之后，又重做辨识。

④P. 3570、P. 2680、P. 3727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莫高窟亦和尚受记，因成千龕者也。”S. 3929V《乾宁三年（896年）沙州龙兴寺上座沙门俗姓马氏香号德胜宕泉创修功德记》：“奇哉宕谷，石化红莲。萨诃受记，引锡成泉。千佛淨土，瑞气盘旋。后尔镌窟，数满百年。”

不止番禾瑞像(南朝陈时长干寺阿育王像^①、南朝宋时荆州北的一尊瑞像^②、襄州岷山华严寺卢舍那瑞像^③)，但像刘萨诃和番禾瑞像那样长久地在西北中国发生影响的圣僧和圣像却是绝无仅有的。这恰恰说明在对待刘萨诃的问题上无法像处理其他的神异僧和瑞像那样简单。那些神异僧和瑞像只属于一个时代，依托于一个政权而盛极一时，随着政权的消亡这些圣僧和圣像也就成为历史。只有刘萨诃能发生那样强烈而又久远的影响，因为它一直有一个强大的民间信仰的基础，既可以得益于某种机缘与上层社会的国运佛法紧密相关，又能在权力阶层的规约改造消弥之后，继续在民间发生影响。恰恰是因为他不仅仅

属于一个时代、一个政权，而是属于大西北的广土众民。

综上所述，刘萨诃在宗教史上的意义至少有两个：第一，刘萨诃信仰是民间形态的佛教信仰。刘萨诃信仰不是知识阶层的哲学形态的佛教信仰，它典型地展现了佛教入华后在民间传播的一个侧面，折射出民间佛教信仰的原始状况和传播方式。第二，刘萨诃信仰表现出民间佛教信仰与哲学形态的正统佛教和上层权力社会的互动。它详细地展现了下层的粗俗的、践履型民间佛教信仰进入上层社会，被上层社会利用、改造和崇奉的全过程。典型地体现了佛教在上、下层社会的传播和发展变迁。

A Buddhist Saint and a Miraculous Image: Rethinking Liu Sahe

Shang li-xin

The academy of Chinese Learning,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u Sahe and the miraculous image of Fanhe, the thesis reveals the nature of folk beliefs. The Liu Sahe belief has exhibited the original situation and spread ways of Buddhism in the folks after its being passed in China. In the meantime, it has comprehensively demonstrated the whole progress of practical-type folk beliefs, including the Buddhism's being passed, used, reformed and worshiped. Thus, The Liu Sahe belief has typically reflected the spreading and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the folks and upper-classes society.

Keys word: Liu Sahe; Miraculous Image; civil society; upper-classes society

作者简介：尚丽新，1974年生，女，山西大同人，文学博士，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副教授。

邮箱：shangstar@163.com 电话：15536837009

①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大正藏》，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32年，第52册，第414页。

② [唐]道世：《法苑珠林》，《大正藏》，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32年，第53册，第385页。

③ [唐]道宣：《广弘明集》，《大正藏》，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32年，第52册，第203页。

我和圣僧刘萨诃一段奇特的千古因缘

□ 高耀峰

写下这个题目，连我自己都完全说服不了自己，一个当代的警察作家，怎么会和一位名满山西、名满江南而且生活在1500年前的一代圣僧刘萨诃会有联系呢？河西走廊的百姓至今盛传着他的名字和他的许许多多神奇的故事。而且在英法等国，也有不少学者知道他的名字。甚至还有英国学者以他为题材写过毕业论文。

我今天发言的四个小题目是：

一、刘萨诃圣僧至今还活在河西走廊人民的心里；

二、河西走廊的皇家寺院圣容寺和刘萨诃的割不断的深厚渊源；

三、唐玄奘当年拜谒皇家寺院圣容寺的经过；

四、我和刘萨诃结缘的来龙去脉。

一、刘萨诃圣僧至今还活在河西走廊人民的心里

十六国至北魏时期，公元436年，圣僧慧达俗名刘萨诃在甘肃酒泉涅槃。至今，已过去1500余年了，而他当年的许多故事还在河西走廊流传。传得最多的是他的预言故事。他预言过的事，在以后的几十年或几百年里都一一得到验证。一则最神奇的预言就是关于永昌县御容山86年后将出现一座石佛和寺庙的预言。

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公元435年）他带众多弟子从武威郡往张掖郡走的半路上，走到武威郡所辖番和县城时，指着县城北面约三四十里远的御容山崇山峻岭对随行的弟子们说：“此山87年以后会现一尊石佛像，宝像出现时，若身首完备，预示着天下是太

平盛世。世乐时康；若宝像残缺时，预示着天下离乱，黎民饥馑”。弟子们遥望着远处一片苍苍茫茫若隐若显的一片山岭，看不出任何的奇特迹象，可师父又说的那么肯定，而且时间也很具体。但时间又是这么远，到那时，恐怕随行的这些弟子们和大富长者没有一个人能活到那个时候了。何以为证？因为刘萨诃在河西四郡生活了二十多年，在这东西长也三千里的地面上名气很大，妇孺皆知。老百姓都把他奉为大活佛，大神仙。人们都把能见他一面当做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能见到这么本事大的神仙一面，离成佛做仙就不远了。这么大的神仙去到那儿都是前呼后拥，从者如云。当即就有人记载下来有意识地做了正式授记。87年后的公元520年，果然这里的石崖上雷震山裂，出现了圣容瑞像，唯缺头。僧俗多次制作佛头，安装复落。当时北魏苛政失道、百姓疾苦，正好应验了他的预言。这一情节，在五代修建的敦煌莫高窟第72窟南壁通壁都绘得非常详细。并题名《刘萨诃因缘经变》。到公元557年，在凉州城东七里润夜有祥光，有人发现是一佛首，军民抬来安放，“飞而暗合，无复差殊”，于是官民“悲欣千里”。从此，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后来又几次发生佛头掉落反复安不上，天下出现饥荒、兵乱和北周焚寺灭佛的事。以上这些情节在莫高窟几个朝代开凿的第55、61、72、82、98、203、323、300、231、237窟中都有大量的壁画记载和榜题。由于刘萨诃的预言屡屡得到证实，因此到隋唐时，“他被推向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佛教文献中，他不仅被记载为观音菩萨的假形化俗，更与佛陀释迦牟尼比肩，被尊为刘师佛、刘大菩萨、佛教第二十二代尊师。河

西走廊三千里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信仰尤甚。这都说明“刘萨诃所享有的社会地位和名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远远在许多高僧之上，可谓影响大而深远”。所以在敦煌莫高窟里与其他高僧相比，关于他的故事壁画最多，藏经洞里有关他的资料也最丰富，他是继公元四世纪乐尊、法良之后，是和修建敦煌莫高窟最有关系的大和尚之一。刘萨诃从江南到河西走廊后，在这个地区宣教二十二年，一段时间曾在今永昌县南祁连山的云庄山石窟寺修道，宣扬佛法。由此可见，云庄石窟的开凿和寺院的修建，与这位高僧有着很重要的联系。仅以五代末年开凿的第72窟为例，该窟南壁通壁绘有《刘萨诃和尚因缘变相》的壁画和榜题，画面庞大，情节繁多，它的下部分遭受自然损坏，模糊不清，上部分保存完好，仅上部分的画像和榜题就有30多幅。

除壁画外，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绢画、绣画中也有不少有关番和县圣容瑞像和刘萨诃的画面。这些众多壁画中，还有被英国斯坦因和法国伯希和盗走的几幅，如《刘萨诃和尚》、《刘萨诃与凉州瑞像变》、《凉州瑞像图》等多幅。

据敦煌研究院出版的《敦煌研究》书籍介绍，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大量的遗书文献中，被法国伯希和盗走的《刘萨诃因缘记》和《高僧传赞 刘萨诃》，现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被英国斯坦因盗走（编号5663）。《刘萨诃和尚故事变》存于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除被帝国主义分子盗走的外，现存的佛教文献中，如《冥祥记》、《佛记》、《高僧传》、《续高僧传》、《神僧传》、《法苑珠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道宣律师感通录》、《佛祖通纪》、《释氏稽古略》、《释迦方志》等均有这一内容的大量记载。这也正是我在前边讲的在欧洲有学者不断研究刘萨诃的一个主要依据。据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意大利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刘继华博士介绍，他们这几年已接待了好几位研究刘萨诃的欧洲学者。

二、圣容寺和刘萨诃的奇特渊源

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西部，东起兰州市

西郊永登县，西止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南以延绵一千五百公里祁连山为邻，北边是连在一起的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在大漠戈壁里，由祁连山流出的十七条大大小小的千年雪山融化的河流，把这些戈壁沙漠和绿洲隔成大大小小的板块，形成了许许多多的绿洲。绿洲和沙漠戈壁间夹而存。绿洲板块有大有小，大的有汉武帝于公元前121年同时建立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等大大小小的板块。祁连山冰雪水长年不干涸，即是冬天，也有终年不结冻的泉水补充。所以河西人不指望下雨，全靠祁连山比较稳定的雪山水浇灌。绿洲里百姓很富庶。只是绿洲面积太小，和被绿洲隔断的不毛之地的沙漠戈壁的板块比起来，太不成比例了。如果把戈壁沙漠比作大海，那这些绿洲就只是几个岛屿和礁石。一片绿洲也仅方圆百十里，几里，甚至二三个村子。最大的、号称金张掖、银武威板块，也仅方圆百里之遥，而被它切割的大漠戈壁板块却动辄五六十公里、二三百公里甚至四五百公里。上无飞鸟下无爬虫。这个很特殊的狭长地带，后来被近代西方学者起了个美丽而浪漫的名字叫河西走廊。也叫做丝绸之路。全走廊行政区是全省的三分之一，人口五分之一，面积却占甘肃省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圣僧刘萨诃在这么一片广大土地上名声显赫。除过丰富的壁画、浩如烟海的藏书、绢画、非物质文化的传奇故事、民间说唱艺术，在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在敦煌正式设立了国家级研究机构以来，至今出版的涉及政治、宗教、历史、地理、经济、军事、美术、艺术、书法、文学、诗歌、俚语、地理、舞蹈、民族、石窟艺术、民间故事等等研究成果里的书籍里，刘萨诃的名字和事迹也被屡屡涉及。这是吕梁人民的骄傲，山西人民的骄傲，也是敦煌的骄傲，中国佛教的骄傲。

我在这里重点想介绍的是刘萨自诃圣僧和今天永昌县的圣容寺的一段最为奇特的历史渊源。

佛教自印度传来。走的路线主要是经新疆到河西走廊，才传遍全中国的大江南北。

东汉汉明帝九年，皇帝夜梦金人，次日早请大臣断梦。有大臣介绍了在西域有佛出世，教化天下，一定是佛的显示。把佛请到中原，一定会对大汉江山有所帮助。于是，汉平帝接受了臣子建议，派出强大的使团去西域请法师来中原讲经。他们穿过三千里河西走廊，穿过罗布泊，到了今天的新疆南疆和田，迎到了印度早已在这里传法的两位法师摩腾和竺法兰，把他们迎到东都洛阳。他们传的佛法深受皇帝喜爱，为他们专门建立了白马寺。由于有皇帝的大力支持，很快，佛法就在中国扎下了根。从汉明帝到隋朝建立的公元581年这四五百年的时间里，是中国社会历经最混乱的三国、晋、南朝、北朝，史称的五胡十六国走马灯轮流统治的时期，然而，却是中国佛教生根发展，和儒释道三教融合最快的好时期。今天，在一般人们印象中，属于不发达的落后地方，然而在这段明间里由于一大批一大批印度高僧的持续传法，带来人类异域先进的思想、文化、哲学，教育方式等等，却是中华民族文化、思想、习俗、人文、政治、军事大碰撞、大融合的快速发展时期。这对以后的中华民族大一统，以佛道儒三教合一为代表的中华优秀文传文化的形成、凝固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圣容寺始建于北周武帝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先有石佛瑞像后有寺院。初敕名瑞像寺，后经隋唐和历代重修、增修，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到隋炀帝西巡时，谒寺礼拜，亲笔把瑞像寺改名为感通寺，到中唐吐蕃统治河西时，又改名圣容寺至今。由于风雨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这座存在了1500年的佛教寺院的部分余建至1953年被当地农民彻底毁坏。

寺院虽毁，但是，寺内的核心文物——通高一丈八尺的浮雕石佛瑞像身躯却完整地挺立于石壁之阳；该石壁瑞像之首，为国家二级文物，是1973年全省文物普查时，由时任永昌县文化馆长的黄兴玉与干部李化民在圣容寺遗址农户的牛圈墙角上拆下来的，像首高约58厘米，头顶有较为低平的螺髻，面相方颐，鼻梁隆起（稍残），上眼皮微垂，下

方有曲线一条，据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等考证，属早期的造像，呈现出浓厚的印度造像影响的风格。黄先生在发现瑞像佛首的同时，还在旁边的石坑中发现了另一尊“石雕立佛像”，佛龕残高120厘米，宽61厘米，佛像高94厘米，宽38厘米，面部稍残，专家鉴定也属北魏时期造像，还同时发现了一个小石佛佛头，取名“圣容寺石佛头像”，通高13厘米，头顶有高耸的发髻，发髻高4.6厘米，面相圆润，神志端庄，发纹及五官雕刻精细，专家鉴定为唐代石雕艺术。这三尊石佛头、像均保存于永昌县博物馆。

寺后和寺前两边的山顶上屹立着一大一小的佛塔两座，遥遥相峙，保存完整，为圣容寺建筑之一。大塔位于圣容寺背后山顶上，通高16.2米，塔基每边长10.8米，为七级方形、空心砖结构，基层较高，向南置门，可供出入。该两塔于2001年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寺院外小河对面悬崖上现在完整存在的用汉、藏、西夏等文字石刻的“唵吗尼呗弥吽”都是罕见的历史文化瑰宝。说明了这座距今1500多年的古代佛教寺院，在历史上，在中国佛教史里，有着多么巨大的影响力和多么辉煌的历史地位。

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公元435年），刘萨诃带了几个弟子准备西去印度欢迎佛迹。行至凉州（今武威）西一百七十里的番和县（番禾故城在今永昌县城西二十里的水磨关一带），刘萨诃止步拄锡，向东北望御谷山，（即圣容寺前的高山）若有所思。弟子们不解其意，就问：“师父凝望此山，有何祥兆？”刘萨诃指着御谷山奇峰说：“此山有奇灵祥光，将来会有宝像出现。宝像出现时，如残缺，预示着天下离乱，黎民饥馑；如宝像肢首俱全，预示着天下太平，民生安乐”。授记之后，刘萨诃率弟子继续西行。他们经过甘州（今张掖），又经肃州（今酒泉），行至肃州城郊时刘萨诃无病而逝，骨头立时化为小碎块，如葵籽大，并能串在一起。当地佛僧大为惊愕，都认为是刘萨诃显圣成佛的象征，就在酒泉建了一座骨塔和寺院，纪念刘萨诃。

时过 86 年，到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 520 年），一日，猎人李师仁赶鹿到御山峡里，忽见一寺，整齐宏伟，还有僧人走动，师仁惊奇，他想：平日常打猎此地，根本没有这个寺，于是他赶忙跪拜，待抬头一看，什么也没有了。他认为这是佛祖显灵，就垒石为记。过了不长时间凉州番禾郡御谷山一带，忽然大风骤起，祥云密布，雷电交加，山摇地动。只听轰隆隆一阵巨响，御谷山崩裂，绝壁断崖上，现出一尊石佛瑞像，其余俱全，唯没有头。当地官民十分震惊，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雕成佛头，然后举行了隆重的安首仪式。可是，白天将佛首安放上去，夜晚就跌落了下来，经多次安放都是如此。此后的约 40 年时间里，天灾人祸连连发生，北魏皇帝苛政失道，百姓痛苦，正好应验了刘萨诃和尚生前授记之言。

北周明帝宇文毓元年（公元 557 年），在距此山二百里的武威城东七里涧，夜现祥光，照耀几十里外的地方，人们都去观看，是一尊石佛像头。有人说，这必定是番和县灵像的头。于是，就把它迎送到御谷山，举行了祈祷仪式，当众僧侣敬捧佛首放戴于肩的时候，佛首“相去数尺，飞而暗合，无复差殊”。于是官民“悲欣千里”，礼佛庆贺。从此以后，天下天平，人民安居乐业。

到建德初年（约公元 572 年），一天夜间，瑞像佛首自行落地，僧侣官府惊愕，马上把此情况报告了朝廷，皇帝派大冢（音史）。宰和齐王亲临察验，并举行仪式重新安放，但是，还是白天安好，夜晚脱落，后复十余次，仍然如此。不久，长安僧人因隐藏刀矛等武器，被嫌疑造反，封寺治罪，随之，天下寺僧受到了牵连，遭到武帝焚寺灭法的严厉打击，瑞像寺无例外遭受了被梦厄运。寺被烧毁了，但石雕的佛身、佛首依然完好。因此，人们更信仰神僧刘萨诃的预言都得到了应验的传说。

唐朝，由于佛教在中国更加兴盛，地处丝绸之路要津的古番郡感通寺，成了与西方佛教文化融汇的中心寺院，因此，历代皇帝非常重视这座寺院，贞观十年（公元 636

年），感通寺象山出现凤鸟蔽日祥兆，太宗李世民派使供养；唐中宗时，中国佛教更加兴盛，古番和县感通寺也发展成了蜚声海内外的名寺，中宗多次派特使到寺敬物。大约就在这段时间或前或后，朝廷敕令在寺后山顶上和寺前隔河半山腰间修建了大小佛塔各一座，至今雄伟壮观，相峙伫立。神龙初（公元 705 年），兵部尚书郭元振往任安西都护，诣寺礼谒，并画像赐物。后中宗令御史霍嗣光，持幡花、绣袈裟等到寺礼敬，时有僧人 1500 人。到中唐，即广德二年（公元 764 年）以后，吐蕃统治河西时，该寺由感通寺改为圣容寺。（据敦煌莫高窟壁画）。

到宋朝中后期，西夏党项族李元昊占据河西时，对该寺院进行过维修或重修。在寺院外小河对面的石崖上留下了用六种文字阴刻的文字石刻。唯“唵麻呢呗弭吽”可辨。石刻文共两方，从上到下为八思巴文、蒙文、西夏文、汉文，右一方两行，从上到下为梵文、藏文。

现在今圣容寺遗址御山峡里，还有齐家文化遗址；有花大门石刻；有高昌王纽林的墓葬；东西横穿永昌的汉、明长城约有 10 公里，保存完好，烽燧突起，气势磅礴，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寺的附近，金川西村修建学校时，还发现了大量的夹砂红陶片等新石器时期文物。

1979 年 5 月，在武威城东北角陆军医院施工时，出土了一块石碑，残，共存一千多字，由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和武威党寿山先生作了考释，拟名《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这通石碑的内容，记的就是今敦煌莫高窟大量的壁画和绢画所反映的古番和县（今永昌县）北御谷山的圣容寺，圣容瑞像和尚刘萨诃的佛迹活动以及隋炀帝到寺礼拜，三藏法师、唐朝大员谒寺敬物、画像等内容。孙修身等敦煌专家，对照碑文，对照敦煌壁画、榜题和敦煌遗书，证实了古番和县就是今永昌县的史实。然后，亲自来到永昌县，在县城北御山谷找到了圣容寺遗址（唐塔内有“圣容寺”题记），并在遗址石壁上发现了敦煌壁画里的“盘和都督府望谷山番和县北

圣容瑞像”这尊浮雕石佛瑞像以及其他遗存。从此，彻底解决了敦煌“壁画”、“榜题”、“遗书”的源流和根据这一悬案。

北魏正光元年石佛瑞像出现后和北周明帝元年石佛头像出现后，北周皇帝宇文邕派重臣宇文俭亲临现场察验，随之下令凉州、甘州、肃州三州力役三千人造寺。三年功毕，敕名瑞像寺。

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到张掖主持27国贸易博览会。会后，隋炀帝又与西域27国国主和特使向东行四百多里亲临瑞像寺礼佛。并在寺里住了数日，亲自御笔该瑞像寺为感通寺。并下令增修寺院，大业九年，朝廷统令天下寺院一律改为道场，因此感通寺也叫感通道场），从此，瑞象寺即为河西走廊上的皇家寺院，声名大振，誉满西域。唐李政权主政中国后，对佛教道教尊崇有加。太宗李世民派特使到寺供养。他立下规矩，新任皇帝都派特使礼拜，直至唐肃宗以后河西走廊被吐蕃占据。吐蕃政权又改感通寺为圣容寺至今。

后来，历朝历代皇帝，都对这座寺院非常重视。在它的兴盛时期，僧侣达到一千五百之众。

三、唐玄奘归途拜谒感通寺道场

唐朝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也就是唐朝建立后的第27个年头的春天，中国著名高僧唐玄奘从五天竺取经归来，越过了终年冰雪的葱岭，踏上了祖国的领土。玄奘本想去时的原路，经高昌国向结拜的异姓兄弟高昌王还了十多年前离别时互约的夙愿，但当他到达舒佉（音qu去）沙国后，得知高昌王由于袭击焉耆、伊吾，唐太宗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派军队平定了高昌国，在高昌国国都交河城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实行了对西域的有效管理。高昌国是当时吐鲁番地区以汉人为主体的割据政权。国王麴（音去qu）文泰祖籍是金城郡榆中人。从先祖麴嘉到麴文泰已是第9代历130多年了。在北魏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年）被拥立为高昌王的。这时，本人已死，去也没必要了，

玄奘很悲伤，于是，只有向东行五百余里，过斫句迦国（今叶城），又东行约800里，进入了于阗国境。

唐玄奘踏上了国土，心情虽好，但也还心有余悸。因为他去西天取经时是违背朝廷禁令而偷着走的，现在回来，还是太宗当政，李世民究竟是什么态度，还能原谅他吗？所以他到于阗国的第一件要事就是赶快给李世民写信，把一切苦衷和取得的成就告诉太宗，以期得到太宗的谅解和支持。同时，玄奘还计划在归途的路上要办三件要紧的事：一是在西域抄补过信渡河（即印度河）时失落的50夹经本的内容；二是要到敦煌莫高窟礼拜；三是要到河西名寺感通寺讲经宣法。而这些事情也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况且，回国时，印度戒日王送给他驮经文的大象在过葱岭时淹死，缺少驮经畜力，都需一一向李世民奏明。这封信写的情真意切，把他出去的求学目的，路上的艰辛，得到的成就、见识，违背不准出国的禁令的忏悔、回国后的打算、请求皇帝帮助解决一路的驮经畜力等等详细做了奏报。最后说“谨遣高昌俗人马玄智，随商侣奉表先闻。”

玄奘送走马玄智后，就抓紧时间游历于阗各寺院，与当地高僧进行佛学术交流，并在众寺院高僧的帮助下，一面寻抄在渡信渡河时失落的50夹经本的内容，一面等候太宗皇帝的回音。在西域各国国主和众高僧的帮助下，把过渡信河时失落的50夹经本的内容基本寻抄齐全，了却了他在归途中要办的三件要事的第一件事，心里很是高兴。但是，派去送信的任，已六七个月了还不见回来，他心里不免有些不安，无日不寝食俱废，于阗国王和众高僧也都坐卧不宁，为他犯愁。一日，玄奘正在讲经宣道，忽然，有人来报说：“送信人回来了”。玄奘赶忙走出寺院迎接，拉住送信人的手说：“见到皇上了吗？”“见到了，见到了”送信人说着掏出了太宗的亲笔书信。唐玄奘兴奋不已，也来不及进屋拆阅，就站在庭院里树荫下读了起来，信上说：“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其国僧解梵语及经义者，亦可同来。朕已敕于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敦煌官

司与流沙迎接，鄯善于且末迎接。”玄奘看完信，兴奋无比，立即向于阗国王传达了皇帝旨意，并提出辞行。于是，于阗国王选派了驮经畜力，又派了一支部队护送，于阗国王亲自相送了二三十里，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有了太宗的御旨，一路上官兵迎送，不长时间，就来到了沙洲（今敦煌）。

玄奘在离开于阗前，就写信给敦煌石窟和番禾郡感通寺的主持，说明要到敦煌石窟礼佛，还要在感通寺讲经。同时，太宗御旨早已到达沿途各州郡县，各地的官府和寺院都在认真准备迎接。

玄奘到达敦煌，是贞观十八年七八月，受到了佛祖般的礼拜和欢迎。又经过肃州、甘州时，都受到了地方官员和僧众的热烈欢迎，作了短暂的停留，就径直取道往番禾郡感通寺而来。

感通寺，玄奘原先早就听说过他的威名，去西天取经路过河西时，只因朝廷下旨严加盘查，不敢露面，所以没敢去礼佛。这次回来，就有人向他说起了番禾感通寺和石佛瑞像的神奇传说，他到敦煌千佛洞礼佛时，又看到了隋末唐初开凿的洞窟里已绘有凉州番禾郡御容山石佛瑞像和刘萨河和尚的画像，所以他对这座寺院产生了更加崇仰的敬意。同时，这次取经回来的情况与去时大不一样，再不用偷偷摸摸，独自一人在沙漠里艰难跋涉，多次险些丧命。现在有了皇帝的旨意，一路上官兵迎送，前呼后拥。什么事情都不让他操心，他心情十分愉快。他已作好了精神准备，打算在感通寺住上十几日，给当地的僧侣们，把他在五天竺学到的真经宣讲给他们，用佛的教化统一西部佛教界的经论，为大唐的更加繁荣昌盛做出贡献。凉州府和番禾郡在接到皇上御旨后，在一个月前就开始做迎接玄奘的准备工作。紧接着又收到玄奘法师要在感通寺讲经的书信，所以，凉州总管府组织河西各郡县抽调大批人马，准备大量物资，并拨出专银全力筹划接待工作。并推荐番禾郡感通寺主持慧敏大师为总主持，凉州副总管一人及番禾郡副吏一人共往协同。要求一定要办好玄奘法师的讲经大

会，迎接仪式一定要隆重而热烈。客僧们的食宿诸事均要妥善安排。要尽量体现出凉州和番禾之盛。玄奘大师在番禾感通寺原计划在这里讲经十几日，可每天听经者三四千人。加上和地方官员、各大小寺院的主持叙谈，一共住了半个多月，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感通寺。

玄奘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农历8月，不顾朝廷禁令，偷偷地与一个在长安学经后回家的秦州和尚去了秦州（今天水），正巧又碰着一个旅伴经兰州，又随商队到了河西走廊第一重镇——凉州。后到达高昌国，在高昌王的大力帮助下，一路西行经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一带），屈支国（今新疆库车一带），跋禄迦（今新疆阿克苏），从丝路中道翻越天山的重要孔道凌山（即别迭里山口），以七天七夜的艰难跋涉，翻过了天山。后来又到了大清池（今伊塞克湖），沿湖北行到西突厥管辖的碎叶城等地。

从天山南麓继续西行，又经过中亚地区的许多邦国，越过了终年冰雪覆盖的茫茫葱岭，终于到达了阿富汗，后来又到了被世人称为“北天竺”的巴基斯坦，再后来又游历了印度全境。

玄奘自到阿富汗和印度后，潜心学习、参观、讲经，研究佛学长达十多个年头。在达到了学经目的之后，与公元643年，满载着佛经经典和五天竺人民的友谊，从印度的今阿拉哈巴德动身回国，于公元644年翻越葱岭，踏上了祖国的大地。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终于顺利回到了西京长安。这时太宗李世民正在东都洛阳。太宗为了向全国人民表明自己尊佛爱民的诚意，下旨给西京留守房玄龄率百官出城迎接，当场宣读了皇上圣旨。二月，玄奘奉诏前往东都洛阳参见皇上。

玄奘赴五天竺取经，共经历了十七个年头，跋涉五万余里，九死一生，带回梵本657部，还有大量的舍利、佛像、佛器等。之后，在太宗的支持下，组织佛学界学识渊博的名僧20多人，协助他翻译佛经。首先，他用了一年多时间，于贞观二十年（公元

646年)七月,整理撰写了一本记载西域、中亚、五天竺(包括今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138个国家的地理、山川、气候、河流、面积、物产、风土人情、历史、宗教文化、佛界盛事、寺院僧众及民间传说共十二卷、十万零三千余字的《大唐西域记》。这部著作内容丰富,它涉及的学术领域也非常广泛。农业、商业、民俗、文艺、语言、文字、音乐、舞蹈、货币、服装等无所不包,至今,世界各国的学者都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玄奘更大的贡献是佛经的翻译。从公元645年春到664年2月5日逝世,玄奘共翻译出大乘、小乘经、律、论等共75部,总计1335卷。与鸠摩罗什、真谛并成为中国佛教的三大翻译家。他还应东印度童子王的请求,把中国的《老子》等翻译成梵文。对中国文化中国道教走出去立下不朽的功劳。

四、我和刘萨诃圣僧结缘的来龙去脉

1974年,在甘肃永昌县城里,出现了一位年轻的女疯子李金兰。她是县办亚麻厂的职工。年仅20岁。文盲。有一天发烧昏迷,救活,从此就疯了。她说一种谁也听不懂的语言,卷舌音特别多,很流利。一天到晚不间断地说。光说也就罢了,可是,她又哭又闹。一闹几天几夜不睡觉,骂所有的家人。可她胃口特别好,别人吃二碗,她是三碗四碗。不但如此,而且顿顿离不开酒。而且白酒不喝,只喝葡萄酒。别人喝酒,当然是酒杯,而她,不用酒杯,用碗。她顿顿吃饭要有肉,吃肉还不是咱们普通家庭的在菜里和一点,而全是肉,而把肉炒上,却不吃,说他们过去不是这样的吃法,是放在火上烧烤的。她有时说些谁也听不懂的嗝哩骨鲁的话,问的人急,她也急,急了就发生更大的矛盾。被家人多次送往神经病院,越治越坏。又住不起,只能任其自然了。父亲还曾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士,四川人,在永昌和马步芳军队作战时受伤,在一个坟墓里躺了三天后被当地一位善良的地主救下。解放后被收归县商业后当售货员1962年饿死。李金兰疯了后,

母整日以泪洗面,带上她到东边的武威、西边的张掖到处去看。往东往西都三四百公里。有时也说汉语。她说他不是中国人而是罗马的人,而且不是罗马普通人,而是皇族的公主。他爸是恺撒大帝。恺撒派他带十万大军征服中国,他到了这里,可没战胜中国,结果全死了。如果他能一次系统地清清楚楚地讲下来,讲多了也许有人听有人信,可不是这么讲的,而是今天这么讲,明天又那么说。故事凌乱,头绪太多,语言也不连贯。她在炕上躺着说胡话,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什么时候死,一说一个准。还说毛主席死了一个姓华的上台,华在台上坐不稳,最后是个姓邓的上台,才能稳住。当时这么说是杀头坐监狱的,把妈吓坏了,逢人就说女儿疯了,让大家别当真。这样的日子断断续续持续了三十年。全县城的人公认她是疯子。到后来,也有人说这些话不是她自己说的,而是有鬼魂附在她身上。于是家人一心要把这鬼从身上赶出去。于是他们陪她到金昌武威到处找会驱鬼的人。他们给她灌大粪,在指甲缝扎竹签,喝尿、吃符咒。可仍然不解决问题,反而越严重。去一次严重一次。有一次,李金兰早上一起床上完厕所,就去自己跪在搓板上。一连整整跪了四十五天。真正是附体在捉弄他。后来附体在圣容寺刘萨诃的化身,露天天然石佛前又附到另一个女人身上借她的口说:我明明是正经人,才附到你身上,而你们偏偏把我当鬼,要赶我走。凭你们的这点水平能把我赶走吗?所以我故意叫你跪,叫你吃吃苦头。看谁厉害。”这次他们全家信了,又到武威鸠摩罗寺去求佛,一个法师说:“你们以后再别这么干了,你身上附的不是一般的人,他很有来头,你们找谁也整不过他。他不是来害你们的,是和你们有大因缘,人家才来找你的,是要让你为他办事的。回去后你们要好好念经,把功德回向给他,听他的话,慢慢自然就好了。”李金兰说:“我们错了,以后再不敢赶他了,你们这里说的好。我们常来这里拜佛。”法师说:天下佛是一个佛,一样的。圣容寺离你们很近,刘萨诃佛位也很高,很有名,你们常去

那里。不用舍近求远，辛苦又费钱费时。”

圣容寺早被农民拆光了，鸠摩罗什师父一说，他们回来去御山峡打问，才知不久前从北京来了两位师父德元德光师父住到这里发心恢复圣容寺，因为早成残壁断垣了，连师父来也没住的地方，还住在居士家里。两位师父功力高深，给李金兰准确地看出了她和被附体的幽冥众生的因果。从此，李金兰找到了家，按师父的指点修行，精神有了依靠归宿，逐步好转。李金兰明理了，附体的鬼魂也明理了，他们都开始接触佛法。不过，鬼魂还是经常说他的话。

从此以后，圣容寺的两位师父开始开导教育三王和李金兰。这个教育开示引导持续了整整三年多。她们母女在另两位女居士热情的慷慨资助下，他们雷打不动地每周去一次寺里，听他现在一切正常了。正在这时，即2005年夏天，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大学陈正义教授来永昌干别的事听说了李金兰的事，出于好奇，他去见识了一下。人家到底是大学教授，专业又是研究中西亚历史的。他敏锐地说：这个女人不疯，她讲的不是疯话，全是真话，是很有来头的话。于是，他回兰州马上到我家，我们是莫逆之交的朋友。他非常兴奋地并且胸有成竹地告诉他的重大发现：这可是震撼世界的研究课题，很希望你参与进来咱们一起搞。我这时已加入中国作协，还是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的理事，已出版了八本书了，在全国公安系统也有了点小影响。陈教授好交学人，所以把我也当块料了。他说，欧洲一直有人怀疑恺撒当时没死，死的是替身，真人逃跑了，不过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前不久中央台一档学术节目中又谈到此事。因为欧洲早期历史其实就是希腊罗马的历史。希腊罗马是欧洲的代名词。现在好了，李金兰说的这些话正好为这一怀疑派历史学家的观点做了个强有力的佐证。他很振奋，他说要是把这个观点在李金兰这儿做实了，可是会颠覆欧洲恺撒时代这一段历史的。肯定会在全世界产生很大的轰动。

我完全不懂历史，无权妄言。他的发现也许没错。可我是共产党员啊，最初一听此

话，首先条件反射地给他扣上几顶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他说，这么说你肯定是唯物论者了？

这时我在甘肃省公安厅政治部宣传处工作。无论在我的潜意识还是显意识里我都是从骨头到皮肤都是当然的红透了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世界上没有神没有鬼，那里有这事！再说，作家的确是被人们习惯性归入学者行列，可其实是隔行如隔山，有本质区别的。历史不是文学。编故事写小说是作家名正言顺的真本事，叫创作。造“假”天经地义。编的故事越离奇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越大，而真实是历史学家的灵魂。写的文章中一个人名字、时间、地点、事件稍有出入、对不上都不行。我哪里有资格干这事！我虽然也叫作家，不过全是纪实的，严格说，那不是作家，就是个会议记录者。我当然不会跟他去。于是他又独自跑了几趟永昌去见李金兰，于2006年8月，又在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召开了一个“学术成果发布会”，邀请有关方面专家学者及一些媒体参加，正式公布了他的这一研究成果！我虽没有参与他的课题研究，但这个会我还是为朋友捧场去混了一顿饭。他的研究成果的发布方式完全合乎学术规范。已经算是向全世界正式发布了。但是学术争论就是如此，你发布了，反方还可以继续不承认并提出新的质疑。相信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我自豪出说：“当然啦，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我象个好斗的公鸡，随时准备为维护自己的“主义”而战。还教导他：“我们警察的基本信条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警察不承认事实，是会办错案的。”

他揶揄到：“听你这口气，还真象个警察的小头目似的。我现在就是报案，可你不调查，不去现场，不见物证，甚至不听涉案人陈述，你凭什么一口就否定？”

我自知理亏。于是答应跟他考察一次。不过也找借口推延了不少日子，于是他才独自又去了几次，回来才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了他的学术成果。不过他还是继续诱我“上钩”，主动提出了包我全部差旅费的优惠条件，我也不客

气，反正有人掏钱，于是又煽动了二名省报的女记者和金昌市公安局宣传科的二位同志一同前往，全当看热闹，免费旅游一趟而已。

听说陈教授带公安厅的警察和省报的记者开天劈地地采访李金兰，附体的这个自称是恺撒大帝三王子的鬼魂当然有他心通，肯定知道他们三十年鬼不鬼、神不神、人不人的日子因我们的到来会从此改变，所以使尽浑身解术全力配合。采访不到一个小时，“三王子”就把我和两个女记者、金昌的两位警察全征服了。我虽然无知，可不是那种为了维护面子维护教条而死不承认事实的人。我当场发誓：一定要把你们十万大军侵略中国而全军覆灭的这一千古事件写出来。我斩钉截铁地发了个毒誓：即是丢了党票丢了饭碗坐监狱也在所不惜！可二位漂亮的女记者千分地感叹，万分的惊奇，更百分之百地相信，还陪附在李金兰身上的二王妃抹了几把眼泪。可最后还是十分温柔地拒绝了和我的合作：“哎呀，你是大作家，我们是小女人，写个小文章还凑合，哪有写书的水平。再说我俩的孩子才二三岁，应付工作都疲于奔命，那有多余的精力啊。你一个人写吧，到时候我们给你连载。不过我们是党报记者，对党的政策还是把握得住的，你赌咒发誓宁可坐监狱打饭碗丢党票的担心大可不必有，那个极端年代已过去三十多年了。当然让你吃点小苦头的可能性也不敢完全排除，充其量降个职受个处分而已。可你皮厚肉老，政治光环多。若要处理，也才一层层剥嘛。从正处剥到副处，正科剥到副科，从党内警告到开除党籍，台阶多着呢，让一层层剥去吧。可我们肉嫩皮薄衣服单，又没有多少保护层，还没剥，就光屁股啦”。二位宣传警察也找了几条理由拒绝了。我说：“你们都不干。那我一个人就干了”。我做了最坏的精神准备。

也许三王子他们在祁连山的冰天雪地和漠戈壁的酷暑干旱中煎熬了整整二千年的苦难日子该熬到了头了，也许是诸佛菩萨的加持，也许是三王子的神通发挥了威力，我历时三年写出来后，没有任何的挡挂，政治

形势继续在向好的方面转变，虽大陆没人敢出版，可在台湾出版后，流通到大陆的书却也不少。两边海关都没有找过任何麻烦。我预想的后果成为杞人忧天，自作多情了。尤其幸运地被全世界的佛教领袖净空法师看到，2010年4月22日在他讲经时一说，顿时惊爆全球。因为早在十年前他的讲经就由台湾大居士陈彩琼伉俪出资搬上了卫星，七颗卫星全覆盖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南极洲也是24小时不间断可以收到。老法师的讲经全世界每天约有上亿听众在听。据我的一位远在马来西亚的粉丝刘金兰居士来信介绍，从2010年4月22日首播至2016年6月，先后74次讲到三王子的事情。

2010年5月6日，浙江临安市东天目山的主持电话找到我，因为为了体现我对这件事情的负责任作风，我把我身份、办公室、家庭电话号码、手机号码、电子信箱全在书后边公布了。表示敢做敢当，随时准备应对不信者的质疑电话。我陪她和县政府直接联系，年底就动了工，于2014年占地500亩的庙宇已经修起了。政府出地皮，齐素萍出钱。这次来这里开会的前一周，我陪我们省轻工厅一位虔诚的佛教徒退休老厅长去参观这个罗马城，见到了齐素萍后居士，一起吃了一顿饭，韩厅长问她共投资了多少钱，她说11亿人民币。现已完全修起。

完全可以这么说，没有1500年前的刘萨诃圣僧当年的预言，就没有圣容寺，没有圣容寺的两位德元德光北京的高僧，就没有圣容寺的重建恢复，也就没有李金兰今天的健康人生，李金兰也不可能走上信佛之路，当然也就没有我的《恺撒军团东征中国之谜》这本书了，当然也就没有我的所谓文学的成就了。三王子积在心头的三个千年愿望也不可能为世人所知所承认，也就没有浙江东天目山主持齐素萍千里迢迢在永昌投资十多亿人民币为三王子建纪念祠这么一说了。这是一条贯通上下一千五百年的完整的因果链条。所以，我有一千条理由写文章纪念至今还活在世界上的圣僧刘萨诃活佛。

《圣僧慧达行迹研究》一书简介

□ 白礼昌

遵照中国佛教协会延藏副秘书长的意见，吕梁市鑫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筹备拍摄以圣僧刘萨诃为主人翁的电影《丝路佛光》，汇同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组成以吕梁市原市长助理薛平大德和王乐东总经理为首的《吕梁佛教研究丛书》编委会，从2013年11月10日开始，沿着圣僧刘萨诃的行迹进行实地考察，参加山西、陕西、甘肃省考察的有：薛平、王乐东、白礼昌、宋毅、高迎新、渠珍宝、王玉喜、李小明和高建军、卫勇等，参加考察浙江、江苏省的有白礼昌、渠珍宝、王玉喜和高建军，参加考察新疆的是白礼昌和渠珍宝。由于条件所限，没有到印度（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实地考察是一个缺憾。迄至2017年6月，经过3年8个月的考察研究工作，终于编撰成《圣僧慧达行迹研究》一书，全书40万字的版面（其中文字27.5万字，图片200多幅），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部书，可谓新疆、甘肃、陕西、山西、江苏、浙江等省（区）的诸多学者呕心沥血费尽毕生的精力考察、研究、编著出版的书籍所载有关文章的彙录汇编而已。在此我们对这些学者、专家深表诚挚敬意和感谢！张春霞女士审阅书稿并作了亲笔修改；新疆和田地区文体局党组书记王昆旭先生和新疆山西企业联合会副会长赵兴柱先生，对我们考察慧达大师西域行迹给予极大支持；特别是宁波鄞县阿育王寺释印山住持馈赠《明州阿育王山志》、永昌县博物馆常静主任赠送《永昌县圣容瑞像寺》、永昌县志办公室主任祝巍山先生赠送《祝巍山文史论稿》，为我们研究慧达大师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还有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孟金霞主任，对本书

稿字斟句酌，调整结构，规范版式，做了很多工作，在此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本讲稿按照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6月版书的内容，讲四个问题：一、慧达大师的简历；二、慧达大师的历史功绩；三、慧达大师是修成正果的活菩萨；四、宣传慧达大师弘扬佛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现实意义。

一、慧达大师的简历

慧达大师刘萨诃是山西离石人，公元250年生于稽胡族富豪之家，从小潜心博学能文善武，曾任梁城突骑戍守襄阳。31岁饮酒过量暴亡而心下犹暖其家未敢便殓，经十日更苏备睹地狱众苦之相，见观世音菩萨说其缘未尽，若得活可作沙门，赴江南礼拜阿育王造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宝塔寿终不堕地狱，醒后觉悟出家法号慧达。

282-397年，刘萨诃在宁波、南京拜出阿育王造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宝塔，苏州拜浮江石佛，创建阿育王寺和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宝塔。他修成金刚不坏的身，有来去自由的神通力，397年圆寂宁波阿育王寺安葬。399-409年，孤身徒步赴印度拜佛取经。409-414年，在家乡宣教，创建离石龙兴寺、北禅院和临县义居寺石窟、岚县石佛寺石窟、兴县黑茶山玉泉寺、吉县佛阁寺、宜川县可野寺、米脂县王沙沟万佛洞石窟、延安万佛寺石窟。415-434年，在甘肃开凿永昌县云转寺石窟、酒泉七里涧讨赖河水利工程，在敦煌开凿莫高窟近百洞，洞中有他的行迹壁画30多组，藏经洞他的文史资料最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435年，他预言永昌县御山“必有佛像

现，身首完备世乐时康，残缺天下离乱黎民饥馑”。86年后的一天，雷震山裂瑞像挺出举身丈八高唯缺头，僧俗制作佛头安装复落，应验了北魏苛政百姓饥苦。436年他在酒泉七里涧圆寂，全身风化成舍利，享年187岁。僧俗为他在酒泉县城修西峰宝刹塑像建舍利塔，世代隆敬。

561年刘萨诃行迹石、隰、慈、丹、延、绥、威、岚八州僧俗，在离石县马茂庄龙兴寺图写其形雕刻举身丈八高的观世音菩萨石像建舍利塔，所在供养号为刘师佛焉。

刘萨诃何许人也？追溯古代佛教史，过去劫迦叶佛时代，释迦牟尼为护明菩萨；刘萨诃是利宾菩萨，二者同为迦叶佛的左右辅助大菩萨。当时迦叶佛指定下一位候补佛位的为护明菩萨，成佛后称释迦牟尼佛。现在劫释迦牟尼成佛后，利宾菩萨转世为慧达菩萨，辅助释迦牟尼佛在东土大兴佛法，预言法运，非同一般。

二、慧达大师的历史功绩

(一) 慧达大师江南巡礼佛教圣迹

慧达出家不久，持钵杖锡，遍礼中原，游览佛法胜地，瞻仰佛祖真容，游化说法，颇受僧侣敬仰。随后，他遵从观世音菩萨的指点，离开中原，从西晋太康二年（281）始，先后前往江南京师建业（今南京丹阳）、会稽（今宁波）、吴郡（今苏州），觅寻阿育王塔像，礼拜悔过，以忏先罪。

佛教的典籍说他是“广寻圣迹，但是如来诸处，悉已到之。皆起塔供养，乃获圣瑞。所到之处，无不钦仰”（敦煌遗书卷子P2680、2757、3727）。“精勤福业，唯以礼忏为先”（慧皎撰《高僧传 兴福篇》卷13，《大正藏》卷50，第409页）。这就是说，慧达大师是按照观世音菩萨的训诲行事的，以参谒佛教圣迹为己任。也就是他从事佛教活动的开始。

1. 会稽鄞山拜出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宝塔

浙江省宁波市鄞县阿育王寺，确切可考的是慧达大师始创建于西晋太康三年（282），迄今已有一千七百三十多年的历史，是天下禅宗名山之一。它之所以远近闻名，不仅因

为山光秀丽，殿宇巍峨，更由于它有一座举世瞩目的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宝塔。

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慧达大师（开山祖师）遵照观世音菩萨点化，来到会稽“在海畔山泽遍求舍利宝塔，行至鄞县鄞山涌见岩，夜间忽闻地下有钟磬之声，他即精诚祈祷，越三日，果见宝塔从地下涌出，光明腾耀，色青如石，高一尺四寸，广七寸，五层露盘，四角挺然，四面窗虚，中悬宝磬，周以天王及诸佛、菩萨、善神、圣僧、天神绕塔”。像极精巧，瞬目注睛见八千像状咸悉具焉，可谓神功圣绩非人智之所及也。慧达大师既见塔悲喜无量，昼夜精勤礼拜忏悔瑞应颇多。

按传记，“刘萨诃者乃利宾菩萨示现”岂偶然也。他遂于其地结庐守护为是寺之创始，亦为佛教流入鄞县之先河。

《明州阿育王山续志》卷第十六载：“晋开山利宾菩萨，并州离石人，姓刘名萨诃法号慧达，西晋太康三年（282）鄞阴求塔出现开山，历宋齐梁陈隋唐五代皆律居讲席其住持俱莫可考。”

据史籍记载推论，慧达大师于三国魏齐王嘉平二年（250）出生，西晋太康二年（281）即31岁出家“即往会稽”在海畔山泽遍求舍利宝塔，于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行至会稽鄞县鄞山乌石涌见岩，夜间忽闻地下有钟磬之声，他即精诚祈祷，越三日，果见宝塔从地下涌出，他遂于其地结庐守护，是为寺之创始，即为开山祖师，历西东晋十六国皆律居讲席住持，遂于东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卒于会稽鄞山乌石岙，享年148岁。今有浙江省宁波市鄞县鄞山阿育王寺慧达祖师殿和瘞冢坟茔，墓塔铭文：西晋开山利宾菩萨之塔。墓志铭：离石发祥，长干显瑞。碑文：西晋利宾菩萨之墓。

2. 建业长干寺掘得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宝塔

慧达大师于东晋孝武帝宁康元年（373）从会稽郊鄞县鄞山阿育王寺出发游化到江南京师建业，故城在今江苏省南京市郊江宁县东南五里之地。

南京古长干里历史悠久，早在三国孙吴时期，长干里地区就有了佛教精舍和阿育王

造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宝塔。有学者认为，它就是江南第一座佛教寺院——建初寺的所在地，实为江南佛教的发祥地。

慧达大师游化到建业长干里，未知塔处，乃登越城四望，见长干寺有异气色，因就礼拜，果有阿育王塔所，屡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

慧达见过了寺内住持，报了自己的法名，请求入寺见证佛塔和金佛像。寺内住持愉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住持领他拜谒了佛祖，带他观瞻寺内最高最大的一座佛塔。慧达说这座塔并非一般塔，它是天竺国阿育王第四女所造。阿育王为了弘扬佛法，在天下大造佛塔，共造八万四千座，每座塔下面都瘞藏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子，如佛祖指甲、头发、骨等。长干寺僧人后来真的在塔下挖出了佛齿。慧达看到塔基四周发出金光，说这座塔下面就有佛祖遗物。而那位住持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塔基四周的佛光。他从未在他师辈那里听到这些，因而对慧达高深莫测的佛法感应功力、对他渊博精通的佛学造诣佩服得五体投地。住持感动得不得了，心中动了拜慧达为师的念头。

慧达和长干寺僧人及四众弟子，就地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并长六尺。一碑有铁函，铁函中有银函，银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发各一枚，发长数尺。即迁舍利，近北对简文帝（371-372）所造塔，西造一层塔，藏佛祖圣物。

3. 东游吴郡通玄寺礼拜沪渎口浮江石佛

慧达大师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至太元三年（378），巡礼江南佛教圣迹的第三站，就是今天的江苏省苏州市及其附近，瞻仰的主要对象就是通玄寺浮江的惟卫佛和迦叶佛二石像。

（1）礼拜浮江石佛

慧达在建业的长干寺掘得了阿育王所造佛塔，又拜谒了金佛像，三年后，他离开建业，来到吴郡（今苏州市）通玄寺，拜谒从江中浮出的两尊石佛像。

相传，西晋建兴元年（313），一日，在吴淞江沪渎口，远处江心现出两尊石像，像

两座小山，又像两个巨人，巍峨壁立，浮于江面。江边立刻招来三教九流各行人等，大家都看到了江中石像，但不知道是石佛像，尽皆唏嘘。石像在江中原地浮游，并不浮过来，众人急切地想看清石像的真面目。有人想摇舟前去探看，却被年长者拦住，说那是神，凡人万不可贸然靠近。否则，神会迁怒于岸上所有的人。

有一伙渔夫，他们平日在江中打鱼，从未见过江中石像，他们认为那是海神。他们立刻请来巫祝，在江边支案，备了三牲，焚香化表，迎请海神。不料，他们不但没有请来海神，反而使刚刚还是风和日丽、水波不惊的江面这会儿突然变得风起云涌，波浪滔天，巨浪差点把渔船抛上岸来。渔夫们大惊失色，他们晓得是拜错了神灵。

他们正在束手无策之时，又有人请来了一位老道，他们认为江中二神是道家拜的张天师。老道也不识江中之佛，也把二佛错当自家门派的始祖张天师，在江边设醮恭迎。谁料刚刚平静下来的天气这时复又乱云飞滚，刚刚平静下来的江面这时再次江水汹涌。

渔夫和道徒们纷纷后退，双股战栗。有个名叫吴膺的佛教徒斋戒沐浴，就近请来东林寺僧人，在沪渎口设台诵经。渐渐地，天上红日复出，江面上风平浪静，两尊石佛向岸边缓缓浮游而来。两尊石佛浮到江边，人们从两尊石佛背上分别看到“惟卫”“迦叶”的刻文。两尊石佛被安置在了附近最著名的通玄寺。请佛的时候，众僧俗料定石佛沉重，可是，众人还未使全力，石佛就飘然而起，众人肩上轻若鸿羽，令人惊奇不已。

慧达在通玄寺日夜敬奉石佛，前后达三年之久。在他的影响下，当时，吴中一带百姓信佛之人很多。

（2）通玄寺的历史变迁

通玄寺是吴郡（今苏州）最古老的一座佛寺，始建于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1），相传是吴大帝孙权为乳母陈氏而建，还有一种说法是孙权之母吴夫人舍宅为寺，始称“通玄寺”。南朝梁中大通年间（529-534），寺僧正慧募建十一层宝塔于寺中；唐开元二

十六年（738）易名“开元寺”，大顺二年（891）寺、塔均毁于兵火。五代后周显德二年（955）吴越王钱弘俶重建，名“报恩寺”，因位于城北又俗称“北寺”。北宋元丰七年（1084）重建宝塔，改为九层八面。诗人苏轼舍铜龟盛放舍利供奉塔中；南宋建炎四年（1130），金兵南侵苏州，寺、塔又同毁。

至南宋绍兴年间，政局相对稳定，行者金大圆于二十三年（1153）开始募化重建九级宝塔，之后又陆续建成不染尘观音殿、卧佛殿等，至绍熙年间渐复旧观。当时寺有5个子院，分别是文殊、法华、泗州、水陆、普贤，规模宏伟，为吴中名刹之一。

综观江南巡礼，特别是我们这次会稽阿育王寺考察有重大发现：首先是慧达大师的年龄问题，原根据《敦煌石窟全集》12卷《佛教东传故事画卷》说慧达是公元360-436年人，享年76岁。现依据明万历壬子年（1612）《明州阿育王山志》记载：西晋太康三年（282），慧达大师就在会稽鄞县鄞山乌石岙拜出阿育王造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宝塔，创建了阿育王寺，始至东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在这116年中均有慧达大师行迹的记载。按诸家之说，慧达大师31岁出家，即西晋太康二年（281）四月初八日出家，那他最晚是三国魏嘉平二年（250）出生，至公元436年在肃州酒泉七里石涧圆寂，享年187岁。其次，按《敦煌石窟全集》记载，慧达大师公元436年圆寂于肃州酒泉七里石涧。他曾于公元397年卒于阿育王寺。这就说明慧达大师修成金刚不坏的佛身，有来去自由的神通力。慧达大师在过去劫迦叶佛时期是利宾菩萨，现在劫释迦牟尼时代是慧达菩萨。我们在会稽阿育王寺见到了慧达大师的真容瑞像，如获至宝啊！

（二）赴印度拜佛取经

根据法显著《佛国记》《敦煌石窟全集》记载，慧达大师于东晋隆安三年（399）至义熙五年（409）孤身徒步赴印度拜佛取经，隆安五年（401）在于阗与法显等人相遇，义熙五年（409）与宝云、僧景回到中国秦地。按史籍记载，慧达大师从浙江省鄞县鄞山乌石

岙神飞，途经家乡山西石州离石，渡过黄河经陕西省三边地区，过宁夏走甘肃省武威、张掖、酒泉，西出嘉峪关，穿越天无飞鸟、地不生草木的戈壁滩到瓜州，出马连井进西域新疆哈密地区，入鄯善即高昌古城，经焉耆到库车，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来和田（于阗），去叶城往喀什，由喀什翻越葱岭进入北印度即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域。

为了解慧达大师赴印求法，我们必须到新疆，沿着慧达大师的足迹去考察。这次是我（白礼昌）和渠珍宝两人去的新疆。慧达途经西域诸地区石窟寺院：鄯善地区吐峪沟千佛洞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乌夷地区七个星千佛洞、乌夷地区克孜尔石窟、于阗地区的牛头山石窟、子合地区棋盘千佛洞、竭叉地区阿图什三仙洞石窟、于摩地区莫尔佛塔、陀历地区图木舒克与托库孜萨来佛寺遗址。

考察感悟：

慧达大师孤身徒步赴印度拜佛取经，路途遥远，没有地图，不知路线，道路怎样，有无艰难险阻，气候环境一无所知，严寒酷暑能否适应，衣食无所依，荒野路宿，洪水猛兽，贼寇穷兵，天灾人祸，穷途莫测。人地生疏，文字不同，语言不通，长途跋涉，身体衰弱，生病缺少医药，也是难免之事。可是，他为了弘法利生，不顾个人安危，走上了西天取经路。他曾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徒步天无飞鸟、地不生草木的戈壁滩到达敦煌。西出阳关，走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白龙堆沙漠地带，路中无居民没行人，极目四望，无边无际，流沙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只有以往死人枯骨可作为行路的标记。孤身行走十七日，计有一千五百里路，来到鄯善地区（今若羌县东米兰）。翻越葱岭，常年大雪压地，狂风席卷，飞沙走石，行人难得保全性命。道路十分艰难，悬崖惊险之绝，山上只有石头，壁立千仞，到跟前头眩眼花，想前进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有一段路，从前有人在悬崖上凿石磴作梯，以通道路，共有七百多级。爬过石梯后，踏着悬空的绳索过新头河，河两岸相距将近八十步。就这样的艰难险阻，真是九死一生，慧

达历经十个春秋，终于到印度拜佛取经后回到祖国，这真是人间奇迹啊！值得大书特书，万世传颂！尤其是当代人更要学习他的这种“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执著追求真理的精神，学习他的无我忘我为众生的精神。

（三）中原弘法 家乡宣教

慧达大师于东晋安帝义熙五年（409）至义熙十年（414），在中原依照印度伽蓝创建佛教寺院。首先，在离石县城西二里而近的马茂庄创建了龙兴寺，在骨脊山麓千年里创建了北禅院。兴县黑茶山创建了玉泉寺。就开凿石窟而言，临县义居寺石窟群应属首例。岚县城东20里曲立村，现存有两个石窟，还有石窟遗迹。曾在慈州吉昌县创建了卦甲山佛阁寺，没有浩大的石窟工程，佛教造像主要是将卦甲山下的岩石山崖稍加修整就雕刻造像，其造像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岩崖上阴刻造像，一种是在岩崖上阳雕造像，后人统称为摩崖岩画。这是佛教东传中国汉地弘法的一种建筑艺术形式。

据陕西省《宜川县志》（清乾隆本）记载；……《陕西通志》云：“泽泾水即渭牙川也。”延长县有可野村，宜川云岩镇境内原有可野寺。“废可野寺在（云岩）县北一十五里，故老相传慧达（为稽胡人）坐禅处。稽胡呼堡为‘可野’。四面悬绝，唯北面一路通入也。”《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五说“云岩县……废可野寺，在县北一十五里，故老相传刘萨诃坐禅处。稽胡呼堡为可野，四面悬绝，唯北面一面通入焉。”

在家乡宣教时期，开凿了延州清凉山万佛寺石窟、绥德州米脂县万佛洞石窟、延州安定县钟山万佛岩寺石窟。

综观慧达中原弘法、家乡宣教，应有五方面的认识：首先，从佛学理论讲，经、律、论，佛学经典是认识论，石窟寺院瑞像是本体论，佛学经典是从思想意识伦理道德上提高僧俗的精神文化素质；石窟寺院瑞像是佛学经典示现，是僧俗崇拜的具体对象。

其次，慧达大师赴印度拜佛取经的重点，是取得石窟寺院瑞像雕塑的建筑艺术图谱。他回到中原及家乡，创建的第一座砖木结构

寺院是离石县马茂庄龙兴寺；开凿的第一个石窟洞是临县义居寺石窟群。其“天马行空莲花八卦石窟”，是佛道结合的标志性石窟，是佛教中国化的标志。“七佛小石窟”，是典型的印度佛像原形艺术作品。“万佛洞石窟”，是慧达将印度佛教石窟原形传到中国后，创造了中心塔柱的石窟窟形的典范。在山西省吉县卦甲山佛阁寺，创造了摩崖石刻瑞像的范例。

从佛学理论示现石雕瑞像看，山西省临县义居寺是佛陀过去、现世、未来的纵三世佛；陕西省米脂县王沙沟万佛洞石窟的石雕瑞像是佛陀三种佛身：应身佛、报身佛、法身佛；陕西省安定县（今长子县）万佛岩寺的三号主窟，是释迦如来佛青年出家时、中年成道时、老年讲经时的横三世佛石雕瑞像。这些都是慧达大师在中国创建的印度伽蓝和石窟模式，以供选用发展。

第三，舍利是佛家的传世之宝，是大德高僧圆寂后生命的延续形式。慧达大师的真身舍利塔被毁后，其舍利神飞到18公里远的大山中；同一颗舍利，按观察摄像者的德行和目的随缘变化；能和虔诚信徒显灵对话。释迦如来的七颗真身舍利，经百有二十三日，新生舍利五颗。这是佛教“不生不灭”“不可思议微妙法门”，谓实相真如之理只可证得而不能用语说明之意。

第四，按北魏（386—534）《僧统赞宁传》记载：“刘萨诃者利宾菩萨示现也。”西晋太康二年（281），刘萨诃31岁时有一次饮酒过量暴亡而心下犹暖，其家未敢使殡，经十日更苏，备睹地狱众苦之相，见观世音菩萨说其缘未尽，若得活可作沙门，赴江南“洛下齐城丹阳会稽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是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礼忏得免此苦。”既苏改业出家更名慧达，如言南行也。他在江南巡礼吴越诸阿育王佛塔后，于东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卒于会稽鄞山乌石岙，今有古籍记载和坟茔为证。南北朝元嘉十三年（436）酒泉七里石涧坐化，僧俗为其在酒泉城西修建西峰宝刹，塑其像，建舍利骨塔，世代隆敬。可见，慧达大师修成金刚不坏的佛身，有来去自由的神通力。

第五，佛教是人类传统文化之一。它的研究对象是宇宙人生的实相。用人类社会科学不能完全解决佛教提出的问题，也不能完全解释社会发生的一些现象。佛教徒只有按佛学理论，刻苦修行积德，普度众生，方可成佛成圣，到西方极乐世界。正如佛教定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四）河西走廊弘法利生

敦煌遗书资料告诉我们说，慧达大师“以正始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却至秦州敷化”。关于这个“正始”年号，就是后燕高云的年号，而“九年”应是北燕冯跋的“太平七年”（415），“十月二十六日，却至秦州敷化”。“敷化”是传播、教化众生，令人善道，给与利益。说法教导众生，使其成佛。这就是说，慧达大师在家乡宣教后，于北燕太平七年（415）西进时途经秦州，在麦积山石窟讲经说法教化众生。

东晋安帝义熙十一年（415），慧达大师到达敦煌莫高窟，厥初只有智勤、乐傅于东晋秦建元二年（366）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禅师在傅师窟侧更建伽蓝。《敦煌石窟全集 预言灭佛的刘萨诃》12卷说：“他预言莫高窟当建石窟二百九十洞。”继智勤、乐傅和法良之后，刘萨诃开凿洞窟已有近百个。因此，他是“与修建莫高窟洞窟最有关系的大和尚之一”。后来，他又在凉州永昌县云庄山开凿了云转寺石窟。

慧达在河西走廊各地弘教二十二年，泽被远近，比起其他高僧，莫高窟关于慧达的故事画最多，藏经洞所出文献资料最多。如五代莫高窟第72窟的大型《刘萨诃和尚因缘变相》图，组合30多个内容，描述了西晋至南北朝慧达一生的神异事迹。

（五）坐化七里涧 芳名千古传

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慧达大师带了几个弟子行至凉州番禾县御容山预言说：“此山有奇灵祥光，将来会有宝像出现。金像出现时，若身首完备，预示着世乐时康；若宝像残缺，预示着天下离乱，黎民饥馑。”86年后，也就是北魏孝明帝正光初年（520），应验了这一预言。慧达授记之后，又率弟子

来到凉州居罗什寺。北魏太武帝太延二年（436）慧达大师居武威时，忽一日云：酒泉人有水厄，吾当往救，寅时发，巳时至郡，正见讨赖河水侵城，他到城西七里石涧，结跏趺坐土台墩诵经。以手挥之，水退，遂圆寂于此，骨头自动破碎成葵花籽大小的碎块舍利，有孔可绳穿之，粒粒圆润，晶莹透明，洁白如玉。这是慧达大师虔心事佛苦心修炼而达到的最高境界。

当地僧俗，为了纪念慧达大师，在酒泉城西1公里，即今西峰寺村八组居民点北500米之道路西侧，修建了西峰宝刹，后称西台寺，塑慧达大师像，建一座宝塔瘞葬慧达舍利，以供养慧达大师。寺中有碑，碑文载：“吾非大圣，游化为业，文不具矣。”相传此短文先为慧达手书于沙崖上，后由名士刻写碑上。

三、慧达大师是修成正果的活菩萨

（一）观世音菩萨点化

西晋太康二年（281），刘萨诃31岁。一日，刘萨诃大会亲朋，饮酒过量，昏倒在地，四肢直伸，双目紧闭，牙关咬紧，人事不省，如同死人一般。但是鼻中尚留一丝余息，心口还有一丝温意，家人才没有把他收殓埋葬。传说过了十天，刘萨诃死而复活，他向人们讲说了死后十天的经过：……阎君又命役从引我遍游阴曹地府形形色色的地狱。观世音菩萨迎面走来，一见面，就对我说：“刘萨诃，你在阳世是个凶恶的人，犯有杀牲之大罪。你能离俗出家，也能不受地狱之苦。你愿意出家为僧吗？”我表示愿意。观世音菩萨还告诫我出家后应该做的许多事情。我都记在心里。告别菩萨，我向前走。身边的引路小鬼也无踪影了，我有点儿纳闷，不知什么东西把我绊倒；我摔了一跤，忽然醒悟，我回到人间。这就是刘萨诃死后十天的经历。据《刘萨诃和尚因缘记》载：“刘萨诃师庙者，昔西晋之末，此乡本名文成郡，即晋文公避地之所也”又曰：“每年四月八日……诃遂出家，法名慧达。”这就是说，死而复活的刘萨诃不再游猎杀牲，也不沾荤食肉了，从此，他叩拜父母，辞别兄嫂，割爱妻室儿女，于四

月初八日直奔隰州文成郡温阳县蒲子城（今山西省吕梁市交口县蒲依村）兴教禅寺出家皈依佛门，落发为僧，由高僧希真子为其授戒，取法名竺慧达。

（二）修成金刚不坏的佛身，有来去自由的神通力

《朔州阿育王山续志》卷第十六载：“晋开山利宾菩萨，并州离石人，姓刘名萨诃法号慧达，西晋太康三年（282）鄠阴求塔出现开山，历宋齐梁陈隋唐五代皆律居讲席其住持俱莫可考。”

据史籍记载推论，慧达大师于三国魏齐王嘉平二年（250）出生，西晋太康二年（281）即31岁出家“即往会稽”在海畔山泽遍求舍利宝塔，于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行至会稽鄠县鄠山乌石岙，夜间忽闻地下有钟磬之声，他即精诚祈祷，越三日，果见宝塔从地下涌出，他遂于其地结庐守护，是为寺之创始，即为开山祖师，历西东晋十六国皆律居讲席住持，遂于东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卒于会稽鄠山乌石岙，享年148岁。今有浙江省宁波市鄞县鄠山阿育王寺慧达祖师殿和瘞冢坟茔为证。慧达大师脱离会稽阿育王寺后，即到印度拜佛取经去了……。

（三）释迦牟尼佛点化

东晋义熙十年，即北凉沮渠蒙逊玄始三年（414），慧达大师西行前，已由释迦牟尼佛给他作了点化。有一天，慧达正在云岩县（今陕西省宜川县）可野寺坐禅时，忽然听到一个宏大的声音对他说话：“慧达，你皈依佛门以来，在一百三十多年的敬佛生涯中，悔改罪孽，潜心求佛，佛祖看得很清楚。你江南巡礼虔诚之至；西天礼佛，经受了长途跋涉之罪；家乡传教，历经中原战机之苦；河西弘法，更能宣扬大道之理，拯救生灵于水火之中。你的每个言行，佛祖皆知。你的功德就要圆满，我安排你继续西行巡礼，你可去否？”慧达听得心静入神，忙说：“去、去、去，请佛祖指点……。”“吾乃释迦牟尼佛。”随即声息。慧达静了静神，顿感神清气爽，赶紧沐浴净身后，连续三天三夜坐禅诵经，第四日就同几个弟子启程西行。

（四）慧达大师显圣容瑞像

按照城市建设规划，离石县政府于1999年派人将龙兴寺的地藏王菩萨殿等十三孔窑洞和僧俗四众募化积资重建的念佛堂、饭厅推倒，将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等20多尊石佛像、五百罗汉和盘龙石旗杆、石龙、石马、石羊及部分古代石碑推到深井里掩埋。

在此之前，学校占用龙兴寺时，新修大门铺门道地面、门洞两旁和两个乒乓球台，全部是铺的龙兴寺的古代石碑。后来城关镇在凤山底修水渠，因水泥缺乏就将龙兴寺的古代石碑和长石条拉走，铺在水渠底部和两旁墙上。

尽管龙兴寺成为遗址，但还有北周保定元年（561）山西、陕西、甘肃等省的石、隰、慈、丹、延、绥、威、岚等八州僧俗为慧达大师刘萨诃雕刻的举身丈八高的观世音菩萨石像、刘萨诃碎身舍利塔和少数古代石碑。

2003年3月29日，由于城市建设的原因，搬迁了北周保定元年（561）石、隰、慈、丹、延、绥、威、岚等八州僧俗为圣僧刘萨诃雕刻的举身一丈八尺高的观世音菩萨石像。八州僧俗为圣僧刘萨诃兴建的碎身舍利宝塔也被损坏。

心动神知，在拆迁大石观世音菩萨像之前慧达大师刘萨诃的瑞像凌空显现，还有护法神和天马行空，地上香气四溢，佛光冲天，数百观众，有目共睹，议论纷纷，惊天动地。摄影的，照相的，火速抓取到圣僧刘萨诃的圣容瑞像。

最后，第四次吊起大石观世音菩萨像的莲花座后，铲车在大石观世音菩萨像的莲花座下推出五条蛇，实是“五龙捧圣”也。这五条蛇全是乌黑色，有一条大蛇，四条小蛇。其中一条小蛇被铲车推断成两截。住寺崔居士拿起三条小蛇，让现场观众详细审视无不动心，已注成千古憾事矣……。

2005年2月27日即农历正月十九，龙兴寺新庙开光，正月十六在正殿出现1.6米长的大蛇一条，在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莲花座盘绕后，爬到佛像东侧的供桌抽斗中居住了半月，有时也出来在大殿中爬行。这次出现在北方蛇冬眠季节，龙兴寺开光的时

间和正殿铜佛像供桌上，可谓金蛇拜佛，实属罕事。《现代消费导报》报道题为《正月十六金蛇拜佛》，可谓慧达大师刘萨诃示现也。

（五）慧达大师和四众弟子的直面对话

2005年12月16日，我们从距离龙兴寺18公里远的海拔1420米高的麦局则崮山顶，请回慧达大师的真身舍利。在我家中珍藏8年以后，于2013年11月9日，交代给薛平大德。在迎请交接时，余说这是慧达大师刘萨诃的舍利子，在场的山西电视台王裕喜编导心想：“怎么能证明这是刘萨诃的舍利子？”薛平大德顶礼接舍利子时，余（白礼昌）祈祷说：“你如若刘萨诃的舍利子，请显个灵，在临县义居寺给你修舍利塔和建大殿安置供养。”就在这时，在场的人都突然神奇地听到清脆响亮的三声佛号：“南无阿弥陀佛！”这实是慧达大师刘萨诃给当事人显示灵应，直接对话说“就是他的真身舍利”。王裕喜编导在他的挂包里装一个念佛机，当即从挂包中取出念佛机一看，念佛机的开关还处于关闭状态。这个念佛机是先打开开关，开头鸣钟三声，再奏佛乐，后才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三声。没有打开开关的念佛机是不会发音的，既没有鸣钟三声，又没有奏佛乐，而突然神奇地听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三声，这就显示了二个问题：一是，皈依佛教30多年的王裕喜编导，产生疑问“怎么能证明这是刘萨诃的舍利子？”这是对僧俗四众弟子广大民众普遍都会提出的疑问的回答：“三声佛号”证明这就是慧达刘萨诃的碎身舍利子。二是，余（白礼昌）当着迎请舍利子的薛平大德和在场的省、市电视台编导、记者的面，祈祷说：“你如若刘萨诃的舍利子，请显个灵，在临县义居寺给你修舍利塔和建大殿安置供养。”祈语神通利宾菩萨，“三声佛号”显然是给余祈祷的“显灵”。慧达大师刘萨诃的真身舍利，是他现在人间的佛身，为确认这个舍利就是圣僧刘萨诃的碎身舍利，他诵念“南无阿弥陀佛”三声名号，犹如慧达大师刘萨诃和四众弟子的直面对话。这就为吕梁市鑫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和临县负责重修义居寺的功德主及义居寺的

主持监院同四众弟子广大民众消除了疑虑，诚心为慧达大师刘萨诃修舍利塔和建大殿吧！以便供养流芳百世!!!

（六）预言御山石佛瑞像

甘肃省永昌县圣容寺，这个距今1450多年的古寺，之所以它能够吸引人、震撼人、鼓励人，是因为它有光辉的历史和珍贵的现存。慧达大师于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带了几个弟子，准备西去印度拜佛迹。他们行至凉州（今武威）西一百七十里的番和县（番禾故城在今永昌县城西二十里的水么关一带），慧达止步拄锡，向东北望御容山（即圣容寺前的高山），若有所思。弟子们不解其意，就问：“师佛凝望此山，有何祥兆？”慧达指着御容山奇峰说：“此山有奇灵祥光，将来会有宝像出现。宝像出现时，若身首完备，预示着世乐时康；若宝像残缺，预示着天下离乱，黎民饥馑。”86年后，也就是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前的一年多时间里，番禾县东北方向的御容山上空，不时出现七彩祥云，有时候佛光璀璨，照得大山周围一片光明，引起了当地和附近郡县官府和僧侣百姓的极大注意。有一日，御容山上彩云满天，云层中似有很多人影晃动，消息传开，一时间，番禾郡县官员、僧侣和老少百姓欣喜若狂，涌至山脚翘首观望。众僧侣焚香祝愿，诵经祈祷。谁也说不清这是什么征兆，于是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官府的人说：这是天降瑞气，大概是我们众位大人升官的祥兆；老百姓说：这大概是上天眼开，佛神显灵，要惩治那些贪官污吏了；僧侣们祈祷说：佛啊，大能的释迦牟尼佛啊，赦免了我们的罪吧，保佑天下生灵平安吧……。众人正在议论之间，忽然天降狂风暴雨，雷震山裂。一道耀眼的金光降落在了峡谷中的一座山头上，顿时，人们像潮水一般涌向金光降落的地方，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众人走近山崖时，山崖上端端正正现出了一尊石佛瑞像，金光四射，但佛像缺少头额，于是，人们恐愕惊怕，官府也束手无策。一面诵经祷告，一面派人到张掖、武威请来了几位高僧，诵经七天，祈求佛祖饶恕，赦免人间的罪孽。

一天众僧正在歇息的时候，来了一位牧羊的人，他听众僧谈论佛教界先师的事迹，他插嘴说：“众位师父，我也听我爷爷讲过，他小时候，这里出过一个高僧慧达，为老百姓做过很多好事、善事。”这一说，倒提醒了一位高僧的回忆，他的师父曾经给他讲述过慧达大师弘扬佛法的事迹和预言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了，大家认为，这一定是慧达预言显灵了，但怎么办呢？这位高僧再想问一问牧羊人的看法，回头一看，牧羊人早不见了。众僧更加惊疑。于是，他们把此事的前前后后和慧达预言的传闻向番禾郡县官府作了报告，官府一时也没了主意，决定由官府和广大僧众齐心协力，选找上好石料，选派能工巧匠，雕制佛头，预备安装。佛头雕好后，举行上隆重的安首仪式。这一天，有来自番禾郡县和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和附近郡县的官员，也有来自众多寺院的广大僧侣，老百姓更是无计其数。安首仪式上，僧众进行了一系列拜佛活动，虔诚肃穆；郡县官员和老百姓，也作了一系列的祭佛、献斋、烧香叩拜仪式。场面十分壮观。仪式结束后，天已傍晚，人们皆尽散去，只有少数佛僧敬守佛像。

再说御容山安装佛首仪式顺利进行，相安无事，敬安佛像的众僧也高高兴兴地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第二天早上，佛徒们敬香诵经时，发现佛头坠落地上，众僧怕官府知道了治罪，就悄悄地七手八脚地把佛头请上了佛肩，可过了一夜，佛头又跌落地上，昼安夜落，连续三次，众佛徒非常惊恐，立即把这事向官府作了汇报。于是番禾郡县大人会同寺院住持，又一次进行请首仪式，可是，连续十数次，白天安好，夜晚落地。后来又刻制了木制佛头安放，仍然如此。无奈，只好视之任之。其后，北魏朝廷内讧不洁，政道颓衰，贼役连加，百姓苦楚。正好应验了慧达的预言。

又过了37年，到北周明帝元年（557），在凉州城东的七里涧，有人发现每夜有很强的光亮出现，彻夜通明，遂报告官府，官府差人同众人百姓、僧侣前往观看，发现是一尊石佛头像。有高僧说：“这是佛祖赐福人间的征兆，是给番禾郡御容山送来的真佛头。”于是，通知番禾郡和各郡县，邀集凉州所有高僧，把这尊

佛头用八抬大轿送往御容山。同样举行了隆重的安头仪式。安头时，正当众高僧请起佛头刚刚举到头顶时，佛头忽然飞起，自动地飞到了佛肩上，仔细一看，佛身和佛头宛如整体，毫无差殊。众佛徒欣喜万分。于是，举行了四十九天的沐佛庆祝活动。奇怪的是，在沐佛活动期间，不断传来响亮的钟声，这钟声在御容山周围都能听到，但这声音从何处传来无法测定。于是，这一吉祥的消息很快传遍凉州大地。同时，在慧达创建的云转石窟寺的上空，也出现了大片七彩祥云，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从这一年开始，政治清明，赋税减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下太平。这一年，番禾郡和凉州府，把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详细写了奏文上报北周朝廷，奏请在这里修建一座寺院。皇上宇文毓御览了奏折后，大为吃惊，似信非信。为了慎重起见，派朝廷大员前往番禾作了调查，得到的结论与奏报情况完全相符。皇帝非常高兴，认定这是佛祖的赐福，就从国库里调拨了一大笔银两，下旨在番禾郡佛像出现的御容山上建造一座宏大的寺院，赐名“瑞像寺”。并下旨凉、甘、肃三州，各调派能工巧匠和役力一千人，共三千人参加建寺。为了保证建好寺院，皇上亲点得力御前大臣，带上尚方宝剑前往监造。御前大臣临行时，皇帝宇文毓又口授了一道旨意：“爱卿到得西地后，可视那里的情况，动员各级官员出些银两，可在发现石佛头像的武威东七里涧，建一座规模适当的寺院。对在安装佛首时，出现彩云的番禾县东30里慧达大师开凿的那个石窟寺院进行扩建，这两处寺院都要绘制瑞像寺佛圣的画像供奉，这两处寺院的佛事统由瑞像寺管理。”御前大臣领旨来到西地后，按照皇帝的御旨，精心组织施工，经三年劳辛努力，于北周武帝保定三年（563）建好了肃穆宏伟的瑞像寺和另两处寺院。从此，瑞像寺佛光缭绕，钟磬嘹亮，佛事繁盛，高僧云集，成为辽阔的凉州大地和丝绸之路上一处大寺名寺。

四、编撰《圣僧慧达行迹研究》的目的意义

我们编撰《圣僧慧达行迹研究》一书的

目的，是为了宣传学习慧达大师弘扬佛法，普度众生的精神，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世界大同。它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现实意义：

（一）宣传慧达大师弘扬佛法的深远历史意义

1. 能够提高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的起源，具体内容是道儒佛学文化。山西省吕梁地区武当山，西晋有著名的道士号称涵谷子先生，他在《悟性穷原》一书中，对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内容作了很好的描述，他说：“人人可以为圣贤，人人可以为仙佛，只在有志无志之分耳。”“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惟愿人人忠孝节义，报答天地君亲。”“凡修道者须要知觉性而明觉命，既曰学道，所学何事，莫非儒之存心养性，佛之明心见性，道之修心炼性。”三教的统一思想是：以人为本，修心养性，性命双修，欲求长生不死，以为神仙。“修心”是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问题。“养性”是练气功，强身健体；炼金石，成丹药，采木草，服天地之气，欲求长生不死，达到神仙的境界。

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是“五行之气”即仁义礼智信，和佛教的五戒是统一的。通过五条戒律，才能达到仁义礼智信的目的。涵谷子在《悟性穷原》中说：“五戒者，仁义礼智信：一戒杀，仁也。若不戒杀，有何仁德之心，教人无故不可杀生也。二戒盗，义也。若不戒盗，成何义也，一草一木各有其主，不问清白，由我所取，是无义也。三戒淫，礼也。若不戒淫，无礼极矣。四戒酒肉，智也。若不戒酒除腥，焉得为智，酒乃穿肠毒药，饮之令人乱性、伤神、耗气、炼精，有损无益；肉味阴浊，污秽本性，不戒不能明心见性。五戒妄语，信也。若不戒除妄语，成何信实，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中国古代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毛泽东思想是继承统一关系。涵谷子在《悟性穷原》中写道：若有德者，要把“一切轮回之心除

却。而轮回之心，即人我心、愤高心、执着心、恶毒心、嫉妒心、损人心、利己心、假知心、暴弃心、好杀心，种种不良之心，一刀斩断。”除却这些“轮回之心”后，实质上就是毛泽东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所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也就是古代社会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谓的“圣贤”、“仙佛”。

上述，“三个统一”的思想理论既是宗教问题；又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也是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思想理论基础。

2. 使人们能够正确认识山西省及吕梁地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对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事业做出的贡献。

吕梁山所以成为“中国汉传佛教的发源圣地”、“印度婆罗门教东传中国的发源圣地”，是与东汉明帝永平年代，熟知吕梁山在中国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和宗教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渊源；又是在朝廷掌握国家财务总汇的大司农，吕梁隰城（今柳林县）人王敏有直接的起决定作用的关系。王敏后被东汉明帝钦任为在朝廷共同执政的三公之一的司徒公。《后汉书 百官志》记载：司徒公一人，“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逊顺谦俭养生送死之事，则仪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省牲视濯，大丧则掌奉安梓宫；凡国有大疑大事輿”之掌管操办也。这就是说，凡宗教事宜皆为王敏司徒公掌管定督之例。

佛教自公元前六世纪在印度兴起后，到十三世纪佛教在印度已经衰退，现在佛教徒在印度仅占宗教徒总数的百分之一。世界公认当代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吕梁地区离石县的刘萨诃不仅被神化为观世音菩萨假形化俗，更与佛陀释迦牟尼并比齐肩，被尊称为刘师佛、刘摩诃、佛教第二十二代宗师等，可视为佛教彻底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考察研究慧达大师的现实意义

1. 研究学习佛学文化及刘萨诃显学，能够全面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

素质”。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教团体，对广大信教群众的教育目的是：“惟愿人人忠孝节义，答报天地君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行善积德，普渡众生。修炼的要求是：“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修炼的途径是“三皈五戒”，要做到仁义礼智信，“人人可以为圣贤，人人可以为仙佛。”

中国古代社会对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道家称之为神仙，儒家称之为圣贤，释家称之为佛陀。当代称之为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模范教师等荣誉称号。

所谓佛教，实质是对广大信教群众施行伦理道德、思想品德教育的一种社会团体组织。他的“惟愿人人忠孝节义，报答天地君亲”的思想教育，首先是忠君思想，赋予时代内容即是忠于共产党、忠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其次是孝敬老者，亲爱同辈，关怀幼小；第三是见义勇为，维护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他的行善积德教育，要求“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信教群众如能真正按照这个标准要求自己，就形成了乐于奉献的社会风气。他要求信教群众“把一切轮回之心除却，而轮回之心，即……损人心、利己心”，这就是毛泽东主席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他的不杀生、放生行为和普度众生教育，实质上就是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热爱家乡、热爱祖国教育。

上述佛学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它有助于稳定时局，故得到统治者青睐及支持。在西方国家，历来是伦理道德、思想品德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在当代中国，它也是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一种伦理道德、思想品德教育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宗教团体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广大信教群众，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2. 学习宣传圣僧刘萨诃显学，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可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佛教自公元前六世纪在印度兴

起，到十三世纪在印度衰退，目前佛教徒在印度仅占全国宗教徒总人数的百分之一。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我国有一亿多信教公民”，其中佛教徒居多数，特别是佛学文化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伦理道德、思想理论、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等都包含着佛学文化的元素。

随着世界许多国家的众多学者和机构，对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藏经洞文献的研究，对会稽阿育王寺和金陵长干寺阿育王造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宝塔瞻仰弘扬，特别是在山西省临县义居寺“慧达菩萨舍利塔”的兴建，世界人民对慧达大师“刘萨诃者利宾菩萨示现”的认知已成共识。继阿育王散塔 2280 多年后，尼泊尔的国际友人将释迦如来真身舍利转送来中国临县刘萨诃创建的义居寺，将“刘萨诃者利宾菩萨示现也”推向极致的国际地位。这将无疑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会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推动构建和谐世界的宏伟蓝图。

3. 通过宣传慧达大师的神异事迹，在四众弟子中确立佛、菩萨从来就没有真正灭过的佛教思想。在当代世界中，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佛教彻底中国化的标志性人物是慧达大师。他现正在“微服”度化众生。只是因为我们的善根没有成熟，因缘不具备，以分别心无法直接感见而矣。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周贵华老师在《第一届佛教义学研讨会的总结发言》中说：“有一点必须清楚，现在别指望突然出现阿罗汉或者菩萨或者佛来住持正法。经常我们会想象，某个谁谁是大菩萨转世，或者某个谁谁在山里坐禅苦修，多少年后出来挽救佛教，这些都是虚妄作意。佛从来就没真正灭过，在所有世界恒有无数诸菩萨在度化众生，他们都是大悲具足的，但为什么不在我们眼前显现？为什么他们不直接出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实际他们都在，只是我们的善根没有成熟，因缘不具备，以分别心无法感见，或者视而不见。没有普遍的善根成熟，佛菩萨不会“正装”出场，一般都是“微服”度化。这就是佛教缘起的甚深之处。

所以我们不能消极等待圣者出现来度化，而是要有担当，不断加行努力，勇猛精进，来形成善根平台，结成佛教义学共同体，以弘扬三藏，建立现代的佛教义学规范，建立新的佛教义学表达，建立现代佛教学脉。这是我们能够努力之处。”

4. 通过对慧达大师行迹的考察研究，对佛教学术研究建立了科学的佛法科学方法论。

首先，佛教的学术研究必须建立在佛教的根本思想和信仰的前提之上，佛学研究要遵循佛教的思想、信仰的规范。佛教是智慧之学，解脱之学，需要研究者以智慧、善根与圣教量相应，因此，需要佛学研究者解行相应，把佛学研究建立在信仰、实证修行和智慧经验之上，遵循依智不依识的规范。

其次，佛教的学术研究，必须采用所谓经验的、实证的、历史的研究方式，利用训诂、考据或考古、文献、语言学等多种学科所获取的证据、资料和事实，由文字和经验事实，来寻求对佛教义理的阐释和对佛教思想演变的内在脉络的梳理。尤其是历史学的研究，寻求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类似科学的客观性的历史的客观性知识。

最后，佛教学说研究者自身对现量的证量深广，对于佛教义理研究影响重大。换句话说，佛教学说研究者自身的社会科学知识、宗教知识特别是佛学知识的深广，对于佛教学术研究影响很大。佛教研究者要有无私奉献、虚心治学的精神，对研究对象应用分析判断、逻辑推理和科学论证的研究方法，必然能得出符合历史的正确的科学结论。加之，研究者若有三、四十年的研究经历，自然就可沟通天、地、人的共有信息，为佛教学术研究架起桥梁，可谓是仙佛代言人也。

《圣僧慧达行迹研究》，就是基于对佛教信仰、愿心和亲身的实践经验基础上，采用阅读古籍资料、考古、学术交流、综合研究、分析判断、逻辑推理、科学论证的佛教学术研究的结果。

5. 考察研究弘扬慧达大师刘萨诃显学，可以提高山西省、吕梁地区及离石县和临县的国际知名度，推动山西省及吕梁地区的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圣僧刘萨诃开凿敦煌莫高窟近百洞，莫高窟关于刘萨诃的故事画最多，在203、323、300、231、237、98、61、72、81、55窟中，都有大量的有关刘萨诃的壁画记载和榜题。仅五代莫高窟第72窟中的大型刘萨诃和尚因缘变相图，就组合30多个内容，描述了圣僧刘萨诃一生的神异事迹。藏经洞所出有关圣僧刘萨诃的文献资料最多，内容也最丰富。敦煌莫高窟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我们考察研究宣扬圣僧刘萨诃，自然就把山西省、吕梁市及离石县和临县推向世界，将会推动山西省和吕梁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迄今对考察研究慧达大师刘萨诃的现实意义不论有多少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进入科学文明时代，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成为人类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文化，佛教被当做与基督教同类的宗教，因而被视为科学的对立面，因此遭到接受现代文化的学者和知识阶层的一些质疑和排斥，加之有一些佛教弟子三皈五戒不如法和寺院管理商业化，使中国佛教面临生存危机。造成中国佛教这一现状的原因，在于佛教闻思修证的义学研究缺少丰富的路径和具体可观的成果，因而无力回应来自佛教内外的挑战，换句话说，佛教弟子和佛教学者，往往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体现佛教智慧的回应。截至2017年6月，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圣僧慧达行迹研究》一书，是“具体可观的”全面的佛教义学研究成果。它将实证公元前六世纪释迦牟尼佛（约前565-485）宣说或印可的佛陀圣教是人类社会科学的真智慧，也就是说佛教是人类社会的真实的科学，不是宗教。所以说，《圣僧慧达行迹研究》一书的出版发行，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得到确认。

刘萨诃学术交流座谈会发言选登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中共吕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照兴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学者和新闻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在这金秋送爽的季节，我们迎来了刘萨诃学术交流研讨会，在此，我代表市委宣传部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吕梁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发祥地之一。因吕梁山贯穿全境而得名。人口385万，面积2.1万平方公里。吕梁在古代就有着辉煌的历史，也养育了很多的名人。比如宋代名将狄青，清朝的廉吏于成龙，还有佛家的代表人物刘萨诃都是土生土长的吕梁人。在战争年代，吕梁也涌现了很多革命志士，比如，山西省第一个党支部创建人张叔平同志、革命先驱贺昌同志、以及刘胡兰同志，还有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同志都是吕梁人。

吕梁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到目前为止，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我们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十八处。

由于吕梁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再加上一代代吕梁人民的努力奋斗，吕梁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我初步总结了一下，有风格迥异的黄河文化，绵延流长的佛教文化，开

放诚信的晋商文化，博大精深的廉政文化，光耀千秋的黄河文化，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黄河文化很有代表性，比如黄河岸边最著名的水旱码头碛口，这既是黄河文化的代表，也是晋商文化的代表。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佛教文化，我们的刘萨诃比玄奘早了二百多年到西天取经。

今天我们有幸坐在一起讨论佛教文化，对于刘萨诃，从当前能看到的资料来看，他生在动乱的年代，因梦皈依佛法。在当时那个时代，他对安抚人们的心灵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个时代是战乱的时代，是杀戮的时代，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思想非常有必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胡汉人民共同的心愿。在当今佛教同样起着这样的作用。

习总书记明确提出弘扬民族文化，他说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都需要用传统文化修身养性，并且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做人做事做官的精髓。弘扬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益处。所以我们吕梁召开这个活动非常有必要，也希望通过我们坐在一起交流，把我们吕梁的文化发扬光大，让我们吕梁在不远的将来，以更新的面貌呈现给大家。谢谢大家！

○吕梁市文化局局长 王成军

我很荣幸地参加在义居寺举办的圣僧刘萨诃学术研讨会暨吕梁市刘萨诃研究会会员大会，在这里我代表吕梁市文化局对

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刘萨诃，法名慧达，是吕梁市离石区人，西晋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高僧，是中

国历史上第一代赴古印度取经人之一（公元399—409年，比唐玄奘西域取经早228年）。他创建寺院，开凿石窟，绘制壁画，讲经释法，是佛教中国化的奠基人物，是历史上著名的古代高僧，也是我们吕梁的历史名人。

义居寺是慧达西域取经后最早传经讲佛、开凿石窟的寺院，为了缅怀这位传奇式的早期佛教界领军人物，近年来在当地政府和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先后投资6000万元维修扩建了义居寺、新建了“慧达舍利塔”，塔身中供养释迦牟尼真身舍利、慧

○吕梁市宗教局局长 王香宝

探讨宗教问题，我属于门外汉，我是2015年10月29号来到咱市宗教局担任局长职务，在之前，我和薛平书记一道在市检委从事纪检工作24年，作为一个纪检工作者，到宗教这个领域是一个大跨越，但是，经过二年来的工作，我也爱上了这行工作，对我启迪很大，对我净化心灵的作用也很大。因此，我很高兴参加这个刘萨诃释慧达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各位高僧、专家学者和住持代表从不同侧面，对刘萨诃重要的历史贡献，进行了挖掘和讨论，讨论气氛热烈，成果丰硕，我代表吕梁市宗教局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对大家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祝愿。

白礼昌先生主编了《圣僧慧达行踪研究》，是在实地考察、收集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慧达法师取经弘法的历程，是一部研究慧达法师佛学思想的著作，也是研究吕梁佛学文化和佛学发展的一部著作。我以前没有很细致地研读，但翻阅了若干章节，清楚了编委会的一番心血。薛书记也是我的老领导，我看了这本书也是深受感动。今天大家举行圣僧慧达法师的研讨会，就是将研究的成果运用于生活和实践中，是如何借鉴前人的优秀文化，是如何推动佛教文化的中国化，作为我们宗教局，一直高度重视这些问题。我到任后把讲经说法，甚至把佛教知

达舍利、五谷金刚砖、黄花梨木刻制《清敕修乾隆版大藏经》等珍品；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白礼昌先生主编的《圣僧慧达形迹研究》也正式出版。

这次刘萨诃学术交流研讨会的召开，为进一步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国学文化，建设美丽中国，繁荣和发展吕梁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提高吕梁的知名度有着重要的意义，我祝愿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专家学者和全体与会代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识竞赛都融入我们的佛教培训中，采取多样性的形式来指导、引导佛教文化的传播。今天借此机会，我就如何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入开展佛学思想交流方面提几点建议，不成熟的建议仅供大家参考。

一是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

佛教传入中国后，不断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除道教之外，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都是外来文化。而佛教文化比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民众中的传播更深。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又从中国传出去的也很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会议上，特别是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回答了十五年以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核心要义（从2015年前推算），在社会主义背景下，如何发展宗教，如何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宗教的基本原则，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因此，希望佛教界继续高举爱国、爱教的伟大旗帜，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特别是宗教方面的落实，把握时代主题，弘扬时代精神，把讲经说法融入时代发展的洪流中，引导广大信教群众，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在这里我感触很深，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有

两亿信教群众，吕梁有二十万信教群众，不达十分之一，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可以说宗教界有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来引导信教群众。

二是推进佛教思想建设。佛教思想建设是佛教界安身立命、有关佛教未来发展方向的有力保证，希望佛教界顺应自身发展要求，积极应对世俗化的挑战，通过研究佛教，对教规、教义、教理作出阐述和进行完善和发展。释放正能量，立足于人生，贴近生活并服务生活，引导群众有一个和平、宽容的良好心态，净化心灵、涵育道德、践行公民义务、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这些赋予佛教的涵盖面很广，因此佛教界的责任也很大。

三是继续推动教风建设。教风问题关系到佛教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形象。关于这个教风问题，我想多说一点。刚才介绍的时候，讲到我是从纪检部门出来的，作为共产党执政的纪检监察部门，是讲纪律的，而佛教同样是有戒律和规矩的，实际上，不管是作为一个团体还是一个政党都是有规矩的。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佛教界领域严重的问题就是商业化问题。我党反对四风，其中一条是奢靡之风在佛教界尤为突出，这个问题引起了社会关注和中央重视。希望加强教风建设，大力倡导讲经学经的风气，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身心，努力培养正气、和氣、清气，大力倡导清静和谐之风，维护出家人

淡泊名利、专心休养、慈悲济世、清静和协的良好心理。这样的要求很高，需要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努力增强抵抗不良风气侵蚀的能力，抵制片面追求物质享受，弘扬正能量，不断丰富教风内容，努力培养一批爱国爱教、慈悲济世的高僧。

四是继续加强佛教人才的培养。我从事这项工作二年多来，深感佛教、道教、基督教的基础素质，咱就说学历，是低于天主教的。我们统计了一下教职人员，初中以上文化占到百分之三十不到四十，专科、本科更是寥寥无几，一个教派要发展，离不开人才。这和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人才是一样的道理。人才是佛教建设和传承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会议上说，要坚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这是对宗教人士说的四句话。人才的培养是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一个关键问题，特别是全国宗教会议以后，从全国特别是山西来说，骆惠宁书记说，三年内实现宗教教职人员和工作人员培训全覆盖。今年市里很重视，吕梁在晋城全省宗教会议上，分获二、三等奖。在培训方面，我们基本实现了在2017年全覆盖，希望佛教界和各县的宗教协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加大对佛教学校、佛教人员的日常培训，造就一批爱国爱教的高素质人才。

谢谢大家！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品牌推进委员会主任 解艾兰

非常感谢本次活动的邀请，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一个是我能够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山西，而且参与了在吕梁地区临县义居寺举办的刘萨诃学术教育活动，我倍感有福气，非常的荣幸。听了一上午各位领导的讲话，所有专家学者的发言，深受教育，很受鼓舞。大家非常全面深刻具体，从不同的角度方面阐述和研讨了刘萨诃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所以这次会议我认为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那就是说我们今天

在整个刘萨诃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大家是以实际行动在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我们党的十九大精神。党中央不断的强化和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的形象得到不断的提升，而且做出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对文化自信的提出更加奠定了历史文化的基础。这就是强调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继续前进就是说继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理论的自信、基础的自信。所以现在中国文化产业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尤其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内容的丰

富，次数的频繁，使世界很多国家对中国文化不仅认可，而且重视。前不久我看到一个报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四百多个孔子学院。这个就是为了更好的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我们更要珍惜和保护好我们自己宝贵的文化遗产，这是个黄金名片。而且要更好的弘扬我们传统文化特有的文化价值，今天我们是在临县义居寺举办这个研讨活动。我认为这个活动本身即是对刘萨诃 1767 诞辰一个最好的纪念活动，也是更好的弘扬他对中国传统佛教文化

贡献的伟大精神。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加大宣传力度，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要更好的弘扬，创新不断的发展，为人类的进步和文明不断做出新的贡献，为中华民族复兴之梦早日实现做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最后，再次代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品牌推进委员会和我们参会的几位同志祝贺本次活动圆满成功。感谢大家的关照，感谢大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知识，希望我们今后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向大家学习和大家交流，再次谢谢。

○甘肃省永昌县圣容寺主持 释德圆法师

大家好！我没有什么准备，因为刘萨诃的因缘使圣容寺与吕梁地区刘萨诃的故乡连在了一起，出于这个因缘，我们才能坐在一起。所以感谢刘萨诃这份殊胜的因缘。我本人是因为有一个恢复刘萨诃道场的机会，对我来讲，作为一个出家人，能在恢复这样一个道场，这样一个殊胜的道场，我感觉是非常荣幸的。隋大业年间，隋炀帝在统一中国以后，曾经到河西去过一次，这个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见到河西的小国，大概是有 27 个国家首脑以后。到返回的途中在圣容寺住过，这个传说历史都有记载。隋炀帝命令天下的画工，临摹圣容瑞像。在临摹中出现了一个问题，画工把瑞像量了尺寸，按尺寸把瑞像画下，再量尺寸就发生了变化。就是无论如何都量不准这个瑞像的尺寸。现在一丈六也好、一丈八也好这个说法很多，这就对了。我想用这个例子和大家说明什么呢？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对刘萨诃的理解，阐述刘萨诃的事。每个人的阐述都有他的道理，都是对的。佛陀在《阿含经》讲过这么一件事情，说一头大象牵过来以后，来了几个盲人来摸象。有摸耳朵的，有摸尾巴的，有摸腿的，有摸头的，然后让大家描述摸的是什么。大家都能讲出他摸的那一部分是什么，但是绝对讲不出整体的一个象是什么。从他摸的那部分的描述来讲，

没有人讲错。但是从整体的象来讲，没有人讲的完全对。我们对刘萨诃，我认为也是这样。我们大家讲了很多，都对。但是他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刘萨诃呢？不一定。

你比方说上午白老先生讲过刘萨诃，关于刘萨诃的出生到圆寂这个说法，现在来讲都有好几种。有说北魏时期是刘萨诃，现在从阿育王寺的文件来看，刘萨诃的出生一下子推到东汉末年（三国就是东汉末年），这个也没有错。这就符合了，我们量那个瑞像一样是量不准的。刘萨诃在阿育王寺圆寂了，可是在酒泉又出现了。这种事情不光刘萨诃身上发生过，在达摩祖师身上也发生过，甚至鸠摩罗什身上也发生过。大家都知道鸠摩罗什是在长安的草堂寺圆寂，但是现在武威也有一个鸠摩罗什寺，鸠摩罗什塔。鸠摩罗什塔我们现在没有人掘过，但是马步芳是掘过的。他说我到要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鸠摩罗什的舌头。鸠摩罗什曾经发了一个愿：他说，如果我翻译的经典有错误的话，那么我的身体都坏掉，如果翻译的没有问题的话，我舌头要留下来。那么他的舌头就留下来了。这个舌头其实是藏在长安的草堂寺。马步芳掘开以后发现里面有一团白布缠着的类似舌头样子的东西，这是我在武威听说的。我到要看看这是不是鸠摩罗什的舌头，就一直解这白布，怎么也解不完。然后就不敢解了，又缠上去放回去了。还有我们大家都知

道，释迦佛弟子中有一位叫迦叶尊者，迦叶尊者，我们看《弥勒下生经》会知道，弥勒来的时候，迦叶尊者住的鸡足山因为迦叶尊者是释迦佛把衣钵传给他，说你等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你把衣钵传给弥勒佛，等于是过去佛到现在佛。为什么要讲这样一段，因为这里有释迦佛、迦叶佛这样一个传承，而这个传承中出现的一个有联系的人物就是刘萨诃，这点可能在座的是不知道的，我就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因为有这样一段因缘。

据记载迦叶尊者的鸡足山在印度，甚至包括普陀洛迦山也在印度。现在中国出了两个都跟普陀洛迦山有关联的，都是属于观音菩萨的道场，一个是浙江的普陀山，一个是西藏的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就是普陀洛迦的意思。这就和刘萨诃很相近，观音菩萨不仅在印度的普陀洛迦山，你什么地方对他有要求他都会出现在那里，而且名字都很接近甚至一样。迦叶尊者的鸡足山本来是在印度，但是现在云南也有一个鸡足山，而且还有一个华首门，有一些近代和古代的僧人去拜访，曾经和云南入定的迦叶尊者也感应过。那么你说迦叶尊者在印度还是在云南？两个都有，所以这个并不稀奇。在佛教里面把这个叫作“缘生法”，缘生法就是条件具足了一个果就出来了，这叫缘生缘灭。缘生缘灭显现的是什么呢？缘生缘灭显现的是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不断的在变化，表示一个动和一个有。也就是说缘生缘灭表现的是无常，而不断的缘生缘灭，从迦叶佛时期有刘萨诃，到释迦佛时期又出现刘萨诃，迦叶佛时期叫利宾菩萨，释迦佛时期他叫刘萨诃，这仍然还是一个不断重复的缘生缘灭。不断重复的缘生缘灭在佛教又叫“常”所以说无常和常是一个统一体，是不可分割的。就像我们现在讲一切有和空是统一体，是不可分割的。常和无常本来是对立的两个东西，在哲学上无常和常是不能统一的，但是佛教里从来不承认不统一的东西。无常和常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一切事物发生变化是无常，一切事物永远发生变化它又是常。刘萨诃本身就是表的这样一种

法。大家所阐述的他在农耕地区和游牧民地区结合部出现的刘萨诃现象对于人们的安慰怎么样，这都没有错，肯定没有错。恩格斯说，宗教就像鸦片。那么在以前人们对宗教进行评论的时候总喜欢引用恩格斯的这句话。但是他忽视了一点。恩格斯所处的那个年代，鸦片是作为镇痛剂，减除痛苦用的，它不是毒品。那个时候鸦片还完全没有毒品的作用，就是在人们痛苦的时候可以缓解痛苦。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人被一种欲望支配的时。比方说我见过的一个人，他说，我这一生只想要两样东西：第一是别墅，第二是名车，那是他将近二十年前。过了二十年我在见到他，他这两样连名车的一个轱辘也没有奋斗到。他这一生的福报，看来他要拥有这两样东西是拥有不上了。他拥有不上这两样东西他会烦恼，你作为他的朋友你会怎么解决他的烦恼？你可能这个方法不行，你换一个；这个技巧不行你换个技巧。总之，你是随着你的欲望不断的给他变换方法，让他继续奋斗呢，还是说用别的方法。宗教的方法是让他放弃这么强烈的欲望，有个西方哲人讲过这么一句话：劝人增加财富，不如劝人减少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能够把欲望减轻的话，他的烦恼会变轻。这就叫缓解痛苦，这就是恩格斯要讲的意思。

宗教不仅仅有这个作用，刘萨诃表的一个什么法呢？就是如何从一个杀业那么重的凡夫最后成了一个圣人。刘萨诃在敦煌壁画中把他叫作圣者刘萨诃，圣人是个什么概念呢？在《易经》里面，圣人就是“沃”。圣人下来还有一种比较优秀的人叫作贤人，贤人的特征是无私，他更多的是考虑别人而不是自己。所以我们现在用神和凡夫来定位的话，并不准确。其实应该是圣人、凡夫、贤人。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神其实还是人。我们现在说你把刘萨诃神话了，但是在文献中记载刘萨诃是怎么样呢？天生神力，神莫能测。刘萨诃的变化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神都测不了。如果把刘萨诃定位成神的话，神都测不了的角色，他还是神吗？

我们知道神我们是见过的，《圣经》里面见过神。我曾经见过基督教的人，因为我在选择信仰以前，有人动摇过我信基督教。为了我

到底信基督教还是不信基督教，我要看一看《圣经》。我把《圣经》一看，我说不能信。结果这个人问我基督教能不能信呢？我说不能信。他说：“为什么呢？”我说，你那个上帝没说清楚。我说：“我如果信的这个对象他必须要有这么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他在没有成上帝以前他是干什么的。他在没有成为上帝以前他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凡夫，也是一个具有烦恼的凡夫，一个有各种罪恶错误的凡夫，他经过反省修行最后成为上帝的话，这个上帝我信。”但是《圣经》里没有交代上帝的前因后果是怎么回事，上来就是上帝。这是第一点。这点有点质疑。第二点，我经过修行以后将来能不能和他一样平起平坐。他说那不行，上帝永远是至高无上的。那我还是不去，我说这里面有不平等啊！第三点，如果他是一个道德非常具足的人，我皈依了他，他不会中途突然没有了，突然消失了，突然死了，他没了，我怎么办？这三点我搞明白了就可以信，搞不明白我不能信的。结果说服不了我。佛陀、刘萨诃表的就是这个法。他们在成为圣人以前，跟我们是同样的，杀生造业，什么坏事都干。包括释迦佛也是的，释迦佛说我在印度的时候也是什么坏事都干。当他受什么善法、什么道德后，他开始发生变化，当他把自己的私欲克制了，这个私欲，这个我完全消失以后他成为了圣人。他克制私欲以后他就先成为贤人，他在成佛以前和我们是一样的。如果按他那么修行，我们成就以后跟他是一样的。他说，佛说一切众生都平等，一切众生按照这个路数修行，可以和释迦摩尼佛完全一致。再一个我说释迦佛表的缘生缘灭法，里面讲的常和无常，其实就给了我一个永恒的依靠。常和无常就是佛性。佛性既显现出他的常，又显现出他的无常。他的常是我们永恒的皈依，他的无常也是我们永恒的皈依。我说这个值得我去信仰。我是这么选择信仰的。

那么我在研究刘萨诃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去看的，刘萨诃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和我们一样，我们和他一样修行，完全可以成为和他一样的圣者。刘萨诃不是被神话的人物，

他就是这样一个。如果说一个人铲除了私欲，铲除了贪、嗔、痴以后，他显现的那些个事儿对圣人来讲是很平常的，但是对于凡夫来讲就叫神莫能测。所以刘萨诃的神迹其实并不神，在圣人这个角度讲本来就是这样的。这就是《道德经》里讲的自然。

我要一讲的刘萨诃的事又可以往前推，这样刘萨诃不仅仅是东汉末年的出生了，刘萨诃再往前推，就推到上一尊佛，迦叶佛时期了。佛教里的时间概念比较复杂。我们现在学的是：个、十、百、千、万、亿、兆，就到头了。但是佛教里面这个数字要比兆要大的多。他也是从个、十、百、千、万、亿、兆，在往前是阿僧祇、不可说、恒河沙，这些都是佛教的量词。这个量表示什么量？凡夫是不可知道的。你想恒河里的沙子有多少粒？凡夫不知道，但是佛知道，恒河沙在佛教量词不是最高级，最高级还更高的叫阿僧祇，叫不可说，叫阿约多。刘萨诃在记载当中，这个记载我到武威去查了一下《刘萨诃因缘记》现在在放置在法国的一个地方。武威可能是放一个影印件。但这里面关于刘萨诃的记载，比道玄的《集三宝感通录》还要多，多了一个刘萨诃显现神迹。比如说于阗国的国王，叫驴耳王，长着驴耳朵，但却是人像。这点可能在座的不可思议，但是我确实确实见过这样的人。但是我见的不是驴耳朵，是胳膊这块有猪的痕迹，就是臂膀这块全是猪鬃，其他全是人的痕迹。用我们民间的话，他上一世是猪，这世为人的话，猪的痕迹没有完全推掉，人的痕迹不圆满，这种事情我就见到过。刘萨诃就见到这么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国王，是于阗国的国王，于阗国是新疆和田的。国王生下后，是一个驴耳朵，怎么办呢？他就贴了一个告示，谁能把我的问题解决了，我要重赏他。正好刘萨诃和法显到印度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告示，他把告示就接了。他拿碗水喷了喷以后，驴耳朵消失了，耳朵又恢复正常了。这个是在法国的《刘萨诃因缘记》中记载的。还记载了在道玄《三宝感通录》记载刘萨诃预言的圣像，在87年以后再圣容寺这个地方出现了。

比方说刚才高先生讲的罗马人的事，其实是圣容寺恢复修建以来小小的插曲。但是这个插曲已经把高先生迷的神魂颠倒。其实那就是一个充满烦恼的众生，死了以后没有到了地狱，也没有到天道，在鬼道里面来回串，总想把他的一个个想法和祈求转达给能够帮助他的人，就是这么一个鬼就是了。所以高先生你千万不要被他给迷住，他不是圣人，是一个比你烦恼还要重的鬼。所以这点你要定位，你的福报要比他大多了，因为他的贪嗔痴，绝对比你重，不然不会堕到鬼道。他极力想表达他的很多愿望，你说有意义吗？给我建祠堂，让后人来纪念我。纪念你你还是个鬼呀！没用呢，你的杀业那么重，到了鬼道你还不甘心，我对他的教育就是这种教育。但是他被他的业牵着，始终放不下这么强烈的追求。这样的插曲圣容寺发生的非常多，没有什么奇怪的。

那么刘萨诃与罗马人有没有关系呢？有些事挺有意思的。我第一次和刘萨诃的结缘是80年代，80年代我当时在日本出差，出差的时候我比较喜欢旅住，我就买了一本日本讲谈社出版的《世界美术史》其中有一副壁画，其中有一副特别大。中间是圣容瑞像，旁边底下坐在边上的是刘萨诃。后来才知道这个是《刘萨诃因缘变现图》。当时人们给他定位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场面，就把他定位为《灵山修法图》。但是现在敦煌研究院把这个改过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在冥冥之中就和刘萨诃结下了因缘。到了90年代我出家的时候鬼使神差就到圣容寺了。

我在讲讲圣容寺恢复修建以后的小插曲。我不想讲的太多了，太多了像高先生一样让大家如痴如醉了。这种事情发生的太多，像李庆兰这个事情很常见。我们的圣容寺刚开始恢复的时候有一个云南来的一个人，现在知道他与圣容寺是有因缘的。2003年正是中国闹非典的时候，所有的地方动不动就封了。正好他从云南坐着火车，在河西口要下火车的时候，永昌就出现一个身上带着非典感染菌的一个病例，所以永昌把各个入口全都封了，你下了火车那都不能去。想到圣容寺没

来成，没来成最后下了车，到车站坐车到明乐，明乐有一个道场在祁连山，在那里呆了3个多月还走不了。历经千辛万苦才到了甘肃，竟然没法到圣容寺。后来在江西找了一个地方出家了，出家以后还是要到圣容寺。这次倒是来到圣容寺了。当时我们圣容寺条件很差，又是冬天下着雪。问他会不会烧炉子，他说会烧。谁知道他不会烧。半夜的时候把炉子烧满了煤，把烟筒给堵死了。煤气出来以后半夜10点多就把他熏死了。我们都不知道，到了第二天早上九点钟，整整11个小时以后，才发现他。我说怎么可能早饭也不吃，早课不上，一看在地下躺着，一摸没气儿了。我去看瞳孔散了。我就拿个被子把他抬到院子里面。我就捏他的手，开始念咒语，念的是《宝镜陀罗尼咒》。大概念了又20分钟，“噗”的吐了一口气缓过来了。睁开眼睛看了我，他不认识我。我一看终于活了。我们就完全没有送医院，因为当时圣容寺没有车，交通又不方便，路也没有修好，条件又不行，就把他抬在屋里头，继续给他念咒，给他熬点稀饭吃。四个小时以后就活过来了，就没死。我一看瞳孔又聚起来了。这是不可思议。然后他就睡着了，这一觉就睡了4、5个小时。醒来了以后，他说你快去吧释圆师父给我找来。然后就我就来了，他说：“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清清楚楚的。”我说你梦到什么？他说，我梦见一个和尚从空中来了浑身发着光，山上水库里面出来一条龙，大家都跪在那里给这个菩萨磕头。我一抬头大家都磕头，我也磕头吧！我就磕头。我就问菩萨，你是哪个菩萨？菩萨说，我是利宾菩萨，你过去烧过这个庙，所以你才会有现在这个果报。这个庙你没有因缘住，你肯定住不住。但是在这个庙你死不了。两个师父在，你死不了。我领你转一转，把记忆抹掉吧！转的什么我全忘了。他说我呆不了，我就非呆不可。我就不信我呆不了。我好好忏悔，好好念经，他就天天念地藏经。结果云南那边有人打电话来，说你出家前账目不清楚。他说他就不回去，结果人家要起诉他。回去三天以后，给我打电话说：“也不起诉我，也不要账，没我什么事了。”他说，利宾菩萨说呆不了，真是

呆不了。那个庙不是我呆的。这个也算一段小插曲。我坚信一点，这个寺庙好像是我们正在建，其实是利宾菩萨在建。刘萨诃和利宾菩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看道玄《感通录》，这对圣容瑞像，他的出现是慧达法师的预言。预言以后87年出现了。出现以后正好是北周武帝正光元年的时候。罗马人来中国的时间要早于北周，因为罗马人属于汉朝的时候。这帮罗马鬼在永昌的时间还是比较长。正好那次就碰到这个因缘。他就讲你可不知道那天，你们知道圣容寺的瑞象吗？他们说知道，天崩地裂的佛出来了。在记载上这两件事情是吻合的。但是鬼是没有时间概念的，他就说，满天都是彩虹啊！然后佛出来了。过了49天小塔出来，又过了49天大塔出来了。这是他讲的。我说奇怪，永昌这两个塔，到现在没有找到任何文字记载。一般建塔的时候或者碑铭，都要有个说法。但是这两个塔什么都没有。这两个塔已经是国家级文物了。有专家说塔的样子有点像西安的小雁塔，按照这个就把他定为唐塔。但是这个根据不是很准确的，我们当时就和定的人说，你们定的没有道理。如果说玄奘法师从印度回来时候先到的永昌，然后在到的长安，然后在到长安建道场，建大雁塔和小雁塔。长安的大雁塔、小雁塔都是玄奘法师设计的。永昌的塔应该早于长安的塔，而不是说永昌模仿长安。应该是长安模仿永昌。因为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但是从罗马的鬼说出来这两个塔的出现，我说这个一定要有文字依据才行啊。我就开始查。关于刘萨诃的预言在道宣《感通录》等典籍当中都有。但是在一个最不起眼的宋代典籍里面我查到了这么一段话。这段话大家可能不知道。宋代的文献上讲，刘萨诃预言凉州番禾县将有佛及舍利塔出现。按照这句话理解就变成刘萨诃的预言是永昌县将来不仅仅有佛像出现，还会出现塔。这是在宋代的文献里出现的。这个文献和罗马人讲的又碰上了。这个塔不是人工造的是自己出来的。有些事情可能是说不清楚的，但是自己出来这个事情我以前是碰到过的。我在圣容寺的时候，我在大塔上拿这珠子念经。

转圈念经，念着念着，从塔缝里边，咕噜就滚出一个铜钱，咕噜咕噜，滚了很远就停下来了。我天天都在绕那个塔，刚开始，就是我一低头，它从我两腿之间冒出来了，滚了一圈就停下了。我捡起来是一枚宋代的“太平通宝”这个钱是自己冒出来的。这个太奇怪了，我天天在那，眼瞅着它从塔里冒出来，捡回来了。过了几天我又去念经，一看塔前出了一个破砂锅，一个陶制的砂锅，而且还破了个边。我天天绕塔，我也没见有一个破砂锅，谁家砂锅破了，还到塔上去扔呢？这不有毛病吗？破了个角和药罐子似的。谁这个东西坏了，随手一扔不就完了吗？我就动了个念，我说这个东西说不定有说法，就把它捡回来了。捡到屋里头，往桌上一放，转一圈一看，砂锅没有了，出来一个大香炉。我说天呢！刘萨诃的事没有一个是假的全是真的。所以我就开始寻着刘萨诃的足迹，不是迦叶佛时期的道场吗？迦叶佛离现在有一亿劫，凡夫千万不要去算，我认识两个人把这个“劫”算了一下，一是黄梦杰老师，还有一个是明代刘之表的物理学家。因为佛在讲劫的时候，曾经作了一个比喻，比方说80由旬的这么一块岩石，一个人寿命特别长，拿那个布，每过一百年擦一下，直到把这么一块84平米的石头给磨净了，才算一劫。他们算来算去，算个一两千万年，一两千万年也磨不净呀！所以这一劫到底是多少，我们说不清楚，应该是至少上亿年。据我所知，从迦叶佛到释迦佛的时候，永昌那个地方是两次海底，又成为山。就是喜马拉雅地区，两次是海底，又成为山。这是迦叶佛到现在这么一个时间段。那么刘萨诃出现以后，在隋唐期他很轰动。到隋炀帝恢复庙以后，道宣律师本身是一个宰相的儿子出家的。我们现在出家人受的戒律是他从《四分律》摘出来的，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一个不是受持戒律精严的人，他说的是不靠谱的。既然你穿上衣服，你不是以戒律著称的，你的话不一定靠谱。戒律里面有一条极严的戒律叫妄语。绝对不可以说与事实不相符的语言。所以有神迹的话从道宣律师嘴里说出来，他

的可信度才能达到。其他人都不行，即便你是一个大法师也不行。因为你不是戒律上的一个顶尖人物。戒律上的顶尖人物他，他绝对不会说半个与事实不相符的话。他怎么听来的，怎么见来的他就会怎么传达。所以刘萨诃的事情必须只能有道宣律师嘴里说出来，才能够有可信度。这点，你们不知道道宣律师在我们心目中是个什么地位。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就是，他说什么肯定没错，因为他是戒律的祖先。道宣律师对这尊佛像感到很惊奇以后呢，他就到酒泉去了。但是唐朝的时候刘萨诃灭度才100多年。道宣律师就去了，但是刘萨诃的庙还在，庙里有块石碑，石碑上有三句话，十二个字，是刘萨诃临灭之前的三句话。第一句是：吾非大圣；第二句是：游化为业；第三句是：文不俱矣。三句白话就是说，我不是圣人，就是游化，其他的不用说了。道宣律师去的时候这三句话还在，而且当地的人对刘萨诃信仰非常神圣。有灾难、有病、都会跑到刘萨诃的庙里去磕头，一磕头还能捡到刘萨诃的舍利。这是道宣律师讲的。

后来道宣律师说这对神奇的佛像为什么这么神奇呀？道宣律师后来就碰到了一个因缘，我们佛教界都知道，道宣律师他持戒特别精严，他当时在终南山的敬业寺，敬业寺他当时没有寺庙，他只是一个茅棚。一下子他没有供养，没有吃的。因为他持戒精严，他没有吃的，天人就给他送饭。释迦佛曾经在经典里面讲过这样一句话，我的四众弟子，包括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就是男居士，女居士。出家的男众女众，你们安心在修行上，如果你们生活当中碰到任何困难的话，解决不了的话，如果你们过去没有别人帮助你的因缘的话，你过去只修慧不修福，没有结到众生缘，大家不肯供养你的话，我会派天人来供养你们。咱们在中国的祖师里面，在印度的记录很多，修行的时候天人给送饭来了。但中国的道宣律师是独一份，一个小童子天天给他送饭，最后说你是谁啊？他说，我是毗沙门天王的太子，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哪吒太子。哪吒只

是一个俗称，就是毗沙门天王、北方多闻天王的儿子。就是应了释迦佛的要求，他现在没有吃的，你去给他送饭去。后来道宣律师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些困惑的事情，他困惑几件事情。一个是五台山的显通寺是怎么来的？一个是仓颉造字是怎么回事。我专门为仓颉造字这个事，跑过终南山。因为他在终南山造字，字造出来以后鬼神都哭泣。这个历史都有记载。

我为什么要去找仓颉造字的遗迹，因为我们在修行过程中。大概是在90年代，九七年、九八年的时候，在佛教界出了一个潮流。就是本来大家在修行的人都在念咒语，突然出现了一种说法，说你念的咒语不是梵文的你念的那个咒语是不灵的，你念的咒语离梵文差别太大了。要想把咒语念好了，你要么学梵文，要么学藏文。那么西藏偏偏又出来一篇文章叫《论地球上的文字》说地球上的文字最高级的文字是梵文，其实所谓梵文是大梵天的文字，根本不是人间的文字，现在的印度文并不是梵文，第二种文字就是我们的藏文，离梵文最近。所以说咒语灵验的话只能这两种文字，一下子就把曾经念了几十年汉文《大悲咒》的人的信心打掉了。有那么股潮流，但是潮流并不是很大。但是很严重，大家的信心被破坏了。结果我一看《道宣律师感通录》道宣律师偏偏就问到这个问题了。他就问那个天人，他说：“仓颉造字到底是怎么回事？”天人说，仓颉造字是一个远程近接。回头你们看在《乾隆藏》等都有道宣律师的感通录。这点其实和我们中国的文化连接太紧密了。什么叫远程呢？就是现在的汉字可以追溯到迦叶佛的年代，现在的汉字是圣贤文字。迦叶佛的三会说法用的就是这个，我一下子心底就安了。结果我又开始翻经，在《千古文殊大教王》中文殊菩萨是说，你不管是什么民族，什么文化背景，你只要拿到用你们文字翻译的经也好，咒也好，你就念，没有错。因为佛陀的智慧，不是你发音准不准所能障碍住的。为了解决这个事，我就跑到终南山找仓颉庙。找到一个小村子，还真有一个仓颉庙，最后拜了半天发

现那不是，仓颉庙已经痕迹全无了。

那么刘萨诃他和另外一个人有关系，另外一个人就是周文王。周文王，你们读过列子的《穆天子传》。列子能够御风，所谓御风，其实就是一阵风过了来，跟风一样就飘走了，他已经不是一个轻功的概念了。列子写了一个《穆天子传》，里面讲穆天子受到画人的教化。道宣律师就问天人：“教化穆天子的画人是谁？”天人告诉他两个画人，一个是文殊菩萨，一个是目犍连。其实咱们现在有人考究过最早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并不是汉明帝，还要往前追，曾经追到了西域有一个叫朱屋瑛的一个居士，曾经出的第一部经叫《佛陀经》。有人把他翻译成“塔”，其实就是佛陀的意思。佛教传到中国以后最早接受佛法的是秦始皇，秦始皇当时因为天竺来的僧人化成中土人给他讲佛法，他不信，最后放弃了。现在看来，按照列子的《穆天子传》和《道宣律师的感通录》来讲，佛陀对中国现在这个地区的教化追溯到了周文王，那就比秦始皇又早了。穆天子传里面这两个画人，一个是文殊菩萨，一个是目犍连。他们把他的神识带到天上，带到昆仑山，从穆天子曾经去西王母瑶池去见了王母娘娘，其实就是文殊菩萨和目犍连把他的神识带去转了一圈。他那八匹马后来都是从华骝，白玄，所以八骏马是天马可以飞，他受到教化以后穆天子在终南山建了释迦佛时期的第一个道场，这个道场叫三会道场。迦叶佛和释迦佛他两因缘不一样，迦叶佛的时候人的寿命是两万岁，人的身高大概将近有二十米，释迦佛的时候人的寿命大概有一百岁，每一百年减一岁，迦叶佛的时候，每一百年增一岁。那个时候人的福报比我们大多了，那个时候印度的国土，也不是现在版图的样子。那时的印度一直大到我们的长安县，迦叶佛的第三次说法，他不是释迦佛的迦叶尊者那个迦叶佛，现在有些学者，现在敦煌学院出的论文集里面把他两个混淆的都有。这个千万不能错，这是两回事。迦叶佛是释迦佛的师傅，迦叶佛是释迦佛的前一尊佛，释迦佛是贤劫七佛中的第四尊佛。迦叶佛是贤劫七佛中的

第三尊佛，还有两尊佛就是白老先生考证的南京江上飘下的两尊佛，一个是维卫佛，一个是迦叶佛。维卫佛是贤劫七佛中的第一尊佛，就是拘留孙佛。迦叶佛是贤劫七佛中的第三尊佛。他这里边有一个传承，刘萨诃的传承已经是从迦叶佛到释迦佛的这么一个传承。这个传承是我们凡夫没有办法去揣测的，法界就是这样的。缘生缘灭，沧海桑田在大的变化，法界中的缘起他会不断的重复。这个以后你们现在了解的佛法，做点善事，烧个香、磕个头，你说他是迷信，一点不为过，我也认为他是迷信。但是真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们有兴趣，咱们在慢慢探讨，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就说圣容寺建立以后我们得到了很多的感应。包括高先生讲的罗马人就是那么一段。关于罗马人和圣容寺的关系太奇怪了。永昌县是从80年代才开始发掘资源的，当时的县委书记叫贾孝天，他后来调到省里当旅游局长。他是最开始发掘的，他在永昌街口上塑了两个汉朝人带着罗马人的塑像。这都叫一种缘起，你不管别人承认不承认，永昌就出现了这么一种缘起，这个很奇怪的。然后县政府就出面，当时的书记叫张书记，县长姓陆。他们就把永昌的书籍收集了一大堆，就是关于圣容寺，关于刘萨诃的传说收集了。前半部分是学者们考证佛像的论文，后半部分就是永昌的传说。永昌传说的延续不仅仅是建立在80年代了，永昌传说的延续可能世世代代就是这么传的。传的是北梁时期，武威是北梁的国都，国王叫，当时北梁时期有一个天竺僧人到中土来到武威住着。他和鸠摩罗什几乎齐名，他翻译的经很多，他也是天竺人并不是中土人。这是永昌传说，他到了北梁以后见了拘渠蒙逊，拘渠蒙逊就问他：“你是从哪来的？”他说，我是从天竺来的，从圣容寺过来的。国王就问：“你认识利宾菩萨？你是不是就是利宾菩萨”达摩又说：“我不是利宾菩萨，利宾菩萨是我的师父。”他说，那你师父怎么没来？这个在永昌的书里就有，但是在永昌圣容寺还没有恢复以前就有，在民间流传了不知道多少年了。他说，

你师父在哪儿？达摩又说，我师父在罗马的宫廷教化罗马的王族。所以才出现罗马人找圣容寺的因缘。如果说利宾菩萨化身成罗马人在罗马宫廷教化的话，罗马人找圣容寺超度他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说历史的传递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文字，像写专门写史的司马迁；一个途径是口传，有的时候口传的东西更准确、更真实。历史的传递只能是这两个途径。所以民间的传说居然把罗马人和圣容寺很早就连到一起了。当时圣容寺还没有恢复，罗马鬼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传说。所以你说怎么解释啊？

在《易经》里面是这样讲的，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做了这样一个分类。物质世界叫作“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是什么，器是物质世界。“形而上者谓之道”我们可以把他叫作精神世界。我们为什么现在这么分，是因为用哲学观点分的。过去人不是说精神世界另有一个世界，他只是用道德来完成的一种升华。用道德来完成的一种升华，我们现在哲学上把他叫作精神世界。孔子是这么讲的：“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是卑劣而低下的；形而上者谓之道‘道’是高尚的。”宗教所诠释的一些东西，应该是‘形而上’的。《道德经》里面他分德篇和道篇。在长沙马文堆出土的汉代《道德经》德篇在前，道篇在后。就是说你按照德篇完成了德篇的修行具备了以后，你可以与道相应。德篇里对人的要求，咱们现在讲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认为人就必须要往高处走，但是在《道德经》里对这个是否定的。《道德经》说，最高的善叫上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就是说，水

不和任何事物争风头，但却把一切大地都滋润了。滋润以后他却从来不表现自己，他说这叫上善。老子说国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释迦佛在讲到一个人学佛的人也应该具备三条品德：第一条品德，怜悯众生，一定要对一切众生生出怜悯心；第二条品德，少欲知足；第三条品德不恃一法，老子讲的这三条和释迦佛讲的这三条，前两条完全一样。一曰慈，慈就是怜悯、慈悲。俭就是少欲知足、勤俭。第三条是不敢为天下先，这些都是属于道的范围。就是说你在德上的修行达到一定量的时候，他会发生质变。这个质变就是刘萨诃显现出的各种神秘莫测的不可思议现象，并不奇怪。只是说我们到道、我们的德，我们的私欲太重，我执太坚固，所以我们做不到神秘莫测。如果我们的私欲没有那么强烈，我们也可以达到刘萨诃的那个程度。刘萨诃从宗教的角度讲，他诠释的是远程近接，从迦叶佛到释迦佛，佛佛传递的都是这么一个消息。一个凡夫不论你罪恶有多重，一个是忏悔。刘萨诃就是造了那么多恶，觉醒后他忏悔。他江南礼佛其实是忏悔去了，拜南京的佛，拜苏州的佛。其实是忏悔去了，因为这两尊佛非常奇怪。所以观音菩萨告诉他你拜这两尊佛特别灭罪。在忏悔当中发现的佛舍利，他是这么出来的。所以说现在《道宣律师感通录》记载的唐朝天下那么多的佛像，现在只剩下唯一的一尊了，就是圣容寺的一尊。所以说如果大家感觉到自己确实有很多需要消除的业障的话，你可以去圣容寺拜佛像，他可以让你得到清净。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敦煌研究院编辑部文博馆员 丁得天

我们做刘萨诃的研究，还需要做些什么呢？就是说还要和现实结合起来。怎么结合呢？就像我们敦煌一样，既然我们是搞文物研究的，那就需要求真、求实，把真实的东西、可靠的东西摸实。一些民间的传说呢，就按民间传说来做。刘萨诃当年的路

线就是现在“一带一路”，如果把它就是串起来就是刘萨诃——瑞像——阿育王塔的关键点。山西是刘萨诃的出生地，刘萨诃出家后先去了宁波的茂县阿育王塔，又到了南京的金陵长干寺，四十年后又来到了河西走廊，然后到了永昌，遇到了瑞像。

瑞像，在莫高窟也罢，壁画也罢，文献也罢，都生出很多瑞像。不巧的是瑞像被英国人、俄国人、法国人、日本人盗走了，今天散藏在世界各地。大家要知道，刘萨诃不是我们先研究的，当年外国人早就在研究了。博西和英国人觉得哪个好看，就把哪个拿走了，法国人觉得哪个有价值就把哪个拿走了，所以法国人拿走的可能不是最漂亮的但却是最有价值的，英国人拿走的是我们现在看起来最大的，看上去是最漂亮的一幅绢画。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绢画，高两点零四米，宽一点四米。这幅绢画的内容是什么呢？这幅绢画画的是瑞像，瑞像下面就是刘萨诃。在法国馆藏的绢画是《刘萨诃因缘记》。他们盗走的都是和刘萨诃有关的。既然我们有刘萨诃，有瑞像，有敦煌，在全世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尚丽新

番禾瑞像是刘萨诃感应出来的，番禾瑞像的身份是一个佛像，刘萨诃是高僧的一个身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把刘萨诃的身份梳理清楚。他有两重身份，一重身份是高僧、圣者上人；第二重身份又把他称为“胡师佛”“刘师佛”“观音菩萨”“苏合圣”。刘萨诃到底是僧还是人，到底那一重身份更重要。我们先看他“神”的这重身份，在论文题的39页，神的身份有三种：一个是佛，一个是观音菩萨，一个是苏合圣。我先分析了这个苏合圣。“苏合”是稽胡语蚕茧的音译。根据唐朝道宣和尚《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的记载，他在吕梁白天传教，晚上睡在一个蚕茧里面。进一步引申他应该是一个“蚕神”的身份，我猜想苏合圣不仅是蚕神，恐怕也是当地的农神。但这个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来论证。

第二种神的身份是佛。老百姓把他称为刘师佛或者胡师佛。这个在道宣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续高僧传》都有记载。说他是刘师佛或者胡师佛，这样他就成了佛。

他还有一个身份是观音菩萨的身份，在

界的敦煌，能上升到国家、能上升到世界的层面上来。我觉得包括宁波也罢，山西也罢，敦煌也罢，永昌也罢，把这些串起来分开研究，大家都不矛盾。比如永昌搞瑞像，敦煌就不需要更多地去搞，大家可以集中资料，山西做刘萨诃的文章，宁波做阿育王塔的文章。阿育王塔在明清的时候就很多，现在在福建广东的阿育王塔还很多，这些塔散在全国各地。如果三方共赢，我们就打造一个东方文化旅游线。我们敦煌的情况大家可能不了解，我们不需要人，人实在太多了。一个石窟只有五六平方米许多人涌进去看敦煌壁画，人太多了会损坏文物。我们大家各自建立起以后，对文化也罢，对旅游也罢，对研究也罢，都可以在现实中起到促进作用，大家共赢协调。这些就是今天我的建议。

最初的《冥祥记》可以看到刘萨诃冥游地狱，观音菩萨出现在地狱教化他要出家，出家以后要他去寻找圣迹，然后找阿育王塔，去礼塔拜像。后来刘萨诃就和观音画了一个等号。刘萨诃和观音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在某些称呼里他就称为观音的化身。我们从民俗信仰的角度来看，刘萨诃被神话成佛，神话成观音菩萨，神话成苏合圣并不奇怪。因为民间信仰会造很多的“神”。我现在做宝眷研究，老百姓信的神特别多，顺顺便便一个人，有点奇异的经历，这个人死后就可能成为神。也许当年刘萨诃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的人，然后他又有很多功德，在民众当中把他作为神，作为人，作为菩萨，作为苏合圣来供奉崇拜，应该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们看到的另外的记载就是番禾瑞像。番禾瑞像和刘萨诃是一个什么关系。番禾瑞像是刘萨诃经过永昌御山，预言御山山裂有像出。这个瑞像就真的出来了，出来以后瑞像的地位相当高。瑞像是佛的身份。从敦煌壁画七十二像来看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瑞像成为一个主角，尤其是七十二像南壁壁画。瑞像一共有

十四尊，瑞像的位置都是中心位置，最中心是大瑞像，瑞像都在中间和上边。十四尊瑞像在视觉上都是最佳的位置。说明瑞像的位置是绝对重要的。刘萨诃的位置出现在偏小的位置，而且刘萨诃的画像非常小。给他的榜题是“圣者刘萨诃”。刘萨诃在敦煌的壁画里，就不是道宣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续高僧传》文献里看到的苏合圣、观音菩萨化身、刘师佛、胡师佛。他是一个圣者、圣僧的一个身份。他在民间的身份是一个“神”的身份，在另外的一个社会里他的身份是圣者、圣僧的身份。这个社会应该是一个权力阶层，他把刘萨诃的地位下降了。刘萨诃是作为一个把圣象感应出来的圣僧的一个身份。圣僧和圣像他们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

○吕梁市重点办主任、学者 王书平

大家好！众所周知，在东晋十六国至北魏时期，离石出了一位高僧刘萨诃，刘萨诃生于东晋穆帝永和元年，也就是公元345年，法号慧达，并州西河离石籍胡人。他的主要功绩是为当时生活在人间地狱的胡汉百姓提供了精神抚慰，对佛教中国化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的出现顺应和满足了北方广大胡汉百姓的社会心里需求，他宏佛传教的重大价值就是塑造了平安神，免罪神，农业神，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和遏制战争，弥合人们的心灵创伤有着积极的作用。

一，刘萨诃塑造了平安神，顺应了胡汉百姓祈求和平，反对战争，寻求精神寄托的需求。五胡十六国至北魏时期，既是中国民族融合的高期，又是北方至中原最黑暗的时期。其时由于全球气候变化，中国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连年干旱，人畜难以生存，北方五胡的匈奴，鲜卑，狄，羌等部族纷纷南迁，并大量居住在晋陕交界黄河两岸地区。这些胡人与汉人比邻而居，虽然语言风俗不同，但形成了融合的态势。到了晋朝时期，由于“八王之乱”，加上国力衰退，为刘渊等部族胡人崛起创造了天赐良机。无论是当官的还

样的。圣像最主要的作用是：圣像头掉了的话，世道就乱了；圣像头安好，就是太平盛世。圣像就和政治的治乱兴衰联系在一起。所以圣像可以预示政事的治乱兴衰。圣像的作用就非常大。好多帝王都去礼拜圣像，因为与其统治密切相关，从北梁到唐代，圣像在上流社会的权力阶层极度流行。并且要利用圣像，要把圣像做一个宣传。让隋炀帝的画工画像，在全国范围供奉圣像。圣像地位的上升，伴随着刘萨诃地位的下降。在权力阶层是这样，在民间是一直保持“神”的地位。到明朝仍然有这个佛这种称呼。这就是民间社会和上流社会对同一个圣僧，不同的看法、观点。

这就是我今天主要的一个意思，我说完了。谢谢大家！

是为民的，无论是胡人还是汉人，无论是军人还是农牧人，都过着朝不保夕、生命无常的日子。狼烟战火，战争频起，动辄屠城，血流成河。特别是晋陕黄河两岸，既是战争源起地，又是胡人聚居地，更是战场杀戮地。这样的岁月长达三个多世纪，直到刘萨诃出生成长时期仍是如此。广大北方胡汉百姓从心理上反对厌恶战争，祈求和平，急需有一个精神上的庇护所。刘萨诃弘扬佛法的行为，为当时的社会塑造了一个平安神，使百姓的愿望如愿以偿，众望所归。

二，刘萨诃在宏佛传教事业中塑造了免罪神，适应了曾经参与战争杀戮的胡汉军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心理慰藉的需要。刘萨诃出生于离石，稽胡族人，家庭富豪，目不识丁，为人凶顽。他参与了五胡之乱的战争，他的性格是杀人不眨眼的，因冥游地狱而皈依佛法，他以自身的经历在黄河两岸、河西走廊讲经说法，赢得了广大百姓的尊崇爱戴。

三、刘萨诃在宏佛传教事业中塑造了农业神。那个时期战争频繁杀戮不断，但平民百姓还是需要生存的，当时的晋陕黄河两岸已经成为半农办牧区域，汉人和匈奴人的吃穿用都需

要自己种植，刘萨诃白天说法，晚上住在蚕茧里，是当时采桑养蚕的神，广受百姓的崇拜和信任，游牧人的农业化，符合北魏时期胡族汉化的要求，各地对刘萨诃无不立像膜拜，谓名胡师傅也。

刘萨诃在宏法传教事业中适应了胡汉百姓的心理危机，追求信仰的时代要求，他孤身到印度取经，途中与法显等人相遇后，以

○西北大学河西学院教授 吴浩军

大家好！我来自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我的家乡在酒泉。关于刘萨诃的研究，我是一个很偶然的机缘写了几篇文章，之后没有能够继续关注这方面的历史文献资料，考古发掘资料。因为在没有发现新的资料，对于以往大家熟知的资料，也没有新的认识，写新的文章。这次因为有这样的机缘，还是愿意到刘萨诃的故乡走一走看一看，听听各位先生们的高见，所以就抱着学习的态度来了。因为没有新的发现、新的见解，也没有必要在这里发言。承蒙会议主办方主持人的抬爱要说几句话。我简单说一下自己的感想。从这两天我翻阅这里的一些资料看，近年有一批领导好先生到刘萨诃曾经悟道、朝拜、弘法的地方不止一次，特别是在我们河西走廊也去过两次，我们甘肃、河西走廊、敦煌研究院的一些师友也过来了。这就把两地打通了联系起来了，借用佛教上的话说这个姻缘殊胜。所以我们非常高兴，再次对吕梁市的各位领导和从事刘萨诃研究的各位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正如前面的领导和专家讲的，刘萨诃作为稽胡族的人，他原来是目不识丁的。他何以成长为广有影响的高僧。这样的高僧为什么在民众中有这样长久的影响力，我们在座的山西大学的尚丽新教授写过好多文章探索都有很好的见解。这个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当时是五国乱华的时期。侵犯中原的胡人大多没有中原人良好的传统教养，处在这样一个乱世当中，社会动荡不安，暴虐杀戮的事情时有发生。民众需要有安全感，

毕生的经历推进了敦煌石窟的开凿，预言祥瑞，开通水利等，有利于时局的稳定，在佛教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刘萨诃的因缘故事符合了广大受众喜欢的方式，为民吃苦受难，得到了人们的喜爱。我们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应当进一步加深对刘萨诃文化的研究，以推动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谢谢大家！

民众需要找到心灵的净化。这时刘萨诃作为一个胡人应运而生，刘萨诃取得这样的成就才能广有影响。时光飞逝发展到今天，刘萨诃因为敦煌研究的缘故，把他的历史事迹发掘出来了。我们今天花这么大的气力研究他，举办学术研讨会，新修寺庙弘扬他的事迹，又是为什么？弘扬刘萨诃的佛教事迹能解决我们当代的什么问题？能解决我们个人的什么问题？这是我们继续要追问的。否则无论是开会也好、做研究也好、修庙也好，只不过制造了一些热闹。另外这些年我们经济发展了，精神生活需求也提高了。由对物质的追求转到对文化、对精神的追求。对这个追求的过程中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从中找出我们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可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们的观念，他们努力的方向，我觉得在今天似乎任然没有落实。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传统文化有精华、有糟粕。其中有些东西是在过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条件下产生的，是全社会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在今天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国学热的大背景下，很可能我们有时把精华抛弃了，把糟粕拿出来了。有些地方、有些场合不可否认会出现****的现象。北京大学的李明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现在国学热是一篇乌烟瘴气。我的观点是我们传统文化断链差不多有几十年了，还不是批判他的时候，应该恢复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掌握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和社会精

英知识分子，应该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

那么就佛教文化来讲也是有精华有糟粕的。佛教是博大精深的，但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的观念、哲学思想、处世态度，作为普通老百姓能够理解多少。在传播佛教文化、弘扬佛教文化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现在的经济是空前的发展了，赶英超美已经变的越来越可能了。但是我们的国民素养、我们的道德观念、我们的社会公德和西方人相比我们的差距有没有？如果有，这个差距是多大？在缩小差距的过程中，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佛教文化我们

○上海箬箬文化学会会长、教授 徐华龙

我不是一个佛教的研究者，但是我特别喜欢佛教，特别是佛教上的人物，让我很感动。我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参加会议。我过去主要是搞历史文化的，对历史上的一些东西也做了探索。我的文章不够成熟，谈到了一些想法，用到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史书记载。对刘萨诃做一些小小的看法吧。

刘萨诃这个人物非常奇特，是佛教史上一个重要人物，特别是他比玄奘到西天取经还要早 200 多年，这个我是非常震惊的。我看了一些材料，一些历史记载以后我感觉刘萨诃这个人确实是很有依据的。人们对他的憧憬确实存在，而且他是佛教史上的一个传奇。刘萨诃的存在与当时佛教的盛行有直接的关系。北朝皇帝敬重佛教，把佛教推广到中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魏晋南北朝朝代替换频繁并有多国并存的时代，政权更迭给老百姓带来生活上的苦难。使人们产生了脱离社会、逃离苦难、追求精神境界，对佛教的产生，及在这块土地上的兴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佛教在此盛行也出现了很多的佛教经书，经书的传播在历史上出现大量的金典。但是远远不够的是面临着佛教的兴盛，佛经远远不能满足佛教兴盛所产生的要求，因此人们就希望到印度，佛教的发源地取得更多的经书，来满足人们对佛教的日益

应该发扬些什么？我们应该抛弃些什么？这都是我们要继续面对的问题。否则我们很多的努力不但不能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可能还会起阻碍作用。在这里我丝毫没有否定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的思想。相反我是虔诚欢迎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儒家文化也好、佛教文化也好，在他发展传播的过程中的确有这样一些问题。现在我对这个问题刚刚有了一点点感觉，怎么解决这是还没有方案的。现在就要这样一些困惑，借这个机会提出来。跟各位领导、各位师友一起探讨。

需求。这个时候刘萨诃及佛教兴盛人士的追求使他们到了印度取经。在丝绸之路上兴盛的宗教就是佛教。我们现在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兴盛的是伊斯兰教，其实在过去的时代佛教是一统天下。丝绸之路是佛教文化交流很好的通道。佛教史上都有这方面的记载，我就不加以阐述了。取经路上不仅仅有刘萨诃这样一位或几位取经者，包括法显。都说明到印度取得佛经的不一个、两个，而是有一批这样志士把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在丝绸之路上传播。他们对佛教文化的传播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知道刘萨诃他是一个胡人，胡人身份的点拨很重要，我们现在看到他的塑像也是胡人，而不是汉人。由此我们想到少数民族对佛教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少数民族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在我们过去佛教史上很少提到这一点。少数民族对佛教的提倡是非常重要的，刘萨诃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另外，刘萨诃在史书的记载上面带有很多神话的色彩，把他作为“神”来看待的这样一个人物。是一个高僧，但是他所附加的很多内容是凡人能够承载的文化特色。所以神话在老百姓当中就有流传。他说他死后看到的一些情景，这在过去的宣传当中是忌讳的。死是很重要的一个临界，从人死后可以变为神，可以变为仙。必须要经过

“死”这样一个过程。刘萨诃死而复生还是处在一个神、灵，或者造“神”之前的一个处境，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神”的形象，或者在佛教里“佛”的形象。过去我们很少宣传跟这个有关系。往往把死而复生、死而变神，这样一个过程与我们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迷信色彩的说法，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在民间把他的过程渲染之后，再把他的作为扩大。刘萨诃死而复生的记载有人们对他的敬爱、憧憬、仰重的心理感受在里面。一个真

正伟大的人物有很大的一批人在从事这样一个事情。一个伟大的人物不是突兀出来的，他是一批杰出的人物当中的代表。包括佛教徒当中刘萨诃就是这样杰出的代表。在历史上的功绩，我们开个研讨会纪念他，其实是对他历史功绩，在佛教上功绩的肯定。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为老百姓做了很多事情，为中国文化做了很多事情。人们是不会忘记他的。刘萨诃就是佛教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开研讨会意义就在这里。简单的进行简介，谢谢大家！



山西省临县义居寺

（上接 67 页）会员入会的程序：

- （一）提交入会申请书，填写入会登记表；
- （二）经本分会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 （三）由本分会办公室发放会员证。

第十二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 （一）本分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 （二）参加本分会的各项活动和获得服务；
- （三）优先在会刊上发表文章和获得信息资料；
- （四）对本分会工作开展批评、建议和监督；
- （五）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十三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 （一）遵守本分会章程；
- （二）执行本分会决议；
- （三）维护本分会的合法权益和荣誉；
- （四）完成本分会交办的工作任务；
- （五）向本分会反映情况、问题，提供相关资料信息。

第十四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分会，

并交回会员证。

第十五条 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分会章程的行为，经本分会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予以除名。

第四章 组织机构和负责人

第十六条 本分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大会，其职权是：

- （一）制定和修改章程；
- （二）选举和改选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 （三）讨论决定本分会工作方针、目标、任务，审议本分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 （四）做出重要决定、决议，决定其它重大事项。

第十七条 会员大会须有 2/3 以上会员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会员 2/3 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十八条 会员大会每年召开一次，领导机构及成员每届任期 5 年。（未完 转下期）

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组织机构

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第一次会员大会选举通过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顾 问

薛 平 (吕梁市政府原市长助理)

名誉会长

赵 元 (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会长、吕梁学院历史文化系原主任)

会 长

白礼昌 (三晋文化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学会艺术委员会主席)

副会长

王乐东 (吕梁市鑫晖文化传媒公司董事长)

宋 毅 (原吕梁市扶贫办调研员)

高迎新 (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市文化局原版权科长)

薛虎林 (吕梁经济管理学校教师)

秘书长

薛虎林 (兼)

秘书处 薛虎林

学术处 宋 毅

交流处 高迎新

理 事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明高 (作家、孝义市文化局原局长)

牛志明 (吕梁远安房地产公司董事长)

毛福昌 (柳林鑫飞煤焦集团董事长)

- | | |
|--------------------|----------------------------|
| 王书平（吕梁市重点办主任） | 张小萍（吕梁学院历史系副主任） |
| 冯智明（原离石区政法委副书记） | 张犬照（吕梁市碛口风景区管理常务副局长、临县副县长） |
| 李 新（离石区政协副主席） | 林建强（临县人大原副主任） |
| 李小明（吕梁日报社副主编） | 陈富平（中阳县桃园水泥集团董事长） |
| 闫小明（兴县晋绥耐火材料公司董事长） | 高万成（吕梁市建安公司工程处） |
| 李立国（吕梁市新民焦电公司董事长） | 秦清平（临县工艺美术大师） |
| 刘守文（吕梁学院中文系主任） | 曹建军（柳林汇丰煤焦集团董事长） |
| 任泽明（临县民企董事长） | 曹哲源（石楼县文物局局长） |
| 刘继平（柳林森泽煤铝公司董事长） | 寂 慧（临县义居寺监院） |
| 刘荣国（市纪委原常委） | 韩少伟（吕梁新天地商旅集团营销中心总监） |
| 李海光（临县教体局原副局长） | 释光净（柳林华严寺住持） |
| 刘晓宏（黄河大唢呐公司总经理） | 释宣一（吕梁市佛教协会会长） |
| 李婷婷（吕梁学院历史系副主任） | 董瑞鸿（吕梁市环保局原调研员） |
| 刘潇珂（北京影视公司总经理） | 蒲 苇（吕梁市华宇广告公司总经理） |
| 刘黎明（吕梁市物价局原局长） | |
| 张子玉（离石泰化集团董事长） | |

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章程

（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第一次会员大会通过）

前 言

刘萨诃，法号慧达，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生于并州西河离石县（今吕梁市离石区）的著名佛教圣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赴印度取经（早于唐玄奘 230 年），并最早归国弘扬佛教的大德高僧，在佛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性人物，也是吕梁籍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为了纪念刘萨诃的历史功绩，挖掘和继承弘扬他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我市热心于研究开发刘

萨诃文化的有识之士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了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分会定名为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以下简称本分会），是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的分支机构。

第二条 本分会是刘萨诃文化研究工作者和刘萨诃文化业余爱好者的群众性文化类学术团体。

第三条 本分会的宗旨是，坚持正确的舆

论导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开展学术研究、交流和宣传活动，深入挖掘刘萨诃在历史文化上的贡献，弘扬其不畏艰险、勇于创新、艰苦奋斗、造福人类的奉献精神，带动吕梁及相关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及经济的大发展。

第四条 本分会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和政府各项法规、法令，在业务主管单位中共吕梁市委宣传部、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的指导和市民政局社团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下，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

第五条 本分会的会址设在吕梁市滨河南东路鑫田写字楼。

第二章 主要任务

第六条 本分会的主要任务是：

(一) 组织专题研究。对刘萨诃的生平、经历、主要事迹、佛学思想、历史贡献等方面进行深入挖掘探讨；对其主持开凿的洞窟、绘画遗迹及记载其事迹的文物图籍、金石碑刻开展阐释考证；对有关轶事传闻资料进行收集整理。

(二) 开展学术交流。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与国内外刘萨诃研究团体及相关专家学者加强沟通联系、外出考察学习、建立刘萨诃学术资料及相关专家学者的信息库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活动，不断提升刘萨诃研究和学术交流的水平和层次。

(三) 制作影视书刊。加强同相关传媒制作发行单位合作，通过组织撰写、制作、出版、发行电影、电视剧、传记、小说、传奇等方式，对刘萨诃的动人事迹、历史贡献等进行广泛宣传，大力弘扬其奉献精神，努力扩大刘萨诃在国内外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

(四) 修缮纪念场所。要动员社会各界捐助善款，在保护好刘萨诃现有文物遗迹的基础上，在其家乡及其它留有遗迹的场所庙堂，修缮和扩建具有标志性的纪念碑塔、塑像，配套建设相应的旅游设施，以刘萨诃为切入点，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带动地方旅游业及相关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当地群众增收。

(五) 创办会刊网站。创办《刘萨诃文化研究》的内部不定期会刊及研究资料，设立刘萨诃文化研究网站，不断扩大刘萨诃学术交流和宣传推介活动的多种媒体阵地，构筑收集、整理、丰富和传播刘萨诃文化的各类平台并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

第三章 会员

第七条 加入本分会的会员分为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

团体会员为各县（市、区）及县以下具有法人资格的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村级基层组织。上述各类组织也可以设立分会的方式参加本分会，本分会也一并视为团体会员。

第八条 团体会员申请加入本分会的条件：

(一) 拥护本分会章程，热心于发展刘萨诃文化事业；

(二) 与刘萨诃历史遗迹或佛教场所有一定关联；

(三) 愿意向本分会提供赞助、捐赠或缴纳会费。

第九条 设立分会的条件：

(一) 拥护本分会章程；

(二) 本组织内有热心于发展刘萨诃文化事业、并有相当的文化素质和研究能力的志愿者5人以上；

(三) 与刘萨诃历史遗迹或佛教场所有一定关联；

(四) 制定并实施了发展刘萨诃文化的具体规划设想或撰写发表了相关文章或各类作品；

(五) 愿意向本分会提供赞助或缴纳会费。

第十条 个人会员申请加入本分会的条件：

(一) 拥护本分会章程，热心于发展刘萨诃文化事业；

(二) 具有一定文化素养，能够开展相关的研究和交流活动；

(三) 积极参与本分会开展的各项活动；

(四) 自愿对本分会提供力所能及的赞助和捐助。

第十一条 团体会员及个人(下转 64 页)

刘萨诃学术研讨座谈会暨《圣僧慧达行迹研究》首发式 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第一次会员大会



薛平向光明日报社常大林颁发聘任证书



薛平向山西大学尚丽新颁发聘任证书



《圣僧慧达行迹研究》作者、考古专家白礼昌发言
左起：赵元、白礼昌、高迎新、薛虎林



甘肃省永昌县圣容寺主持释德圆法师发言



敦煌研究院丁得天介绍莫高窟刘萨诃壁画研究成果



刘萨诃学术研讨座谈会会场



刘萨诃学术交流座谈会暨吕梁市古代文化研究会刘萨诃分会会员大会全体参会人员合影

本版摄影/张瑞华



义居寺慧达舍利塔院



义居寺依山傍水，
湫水河顺流而下

本版摄影：张瑞华